

855  
440.19

# 夢的終點

● 陳芳明 / 著



BM 0205921

聯合文叢  
150

夢的終點



198502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 目次

## 第一輯▼蹀躞

夢的終點(自序).....	7
相逢有樂町.....	15
在植滿荆棘的夢土.....	22
我的母土與母親.....	34
離台十五年祭.....	42
聚散.....	51
歷史失憶症.....	58
國家傾塌的年代.....	62
青春的閘門.....	66





### 第二輯▼葳蕤

江湖十年，孤燈一盞·····	79
曾經發生在洛杉磯·····	88
我的台灣史啟蒙導師·史明先生·····	99
葉老·····	114
寒風裡過澳底·····	121
邊界外的怒潮·····	127
無花的墓園·····	136
島上最前線·····	143
屬於台灣的驕傲·····	151
涉渡·····	159

### 第三輯▼悱惻

內山書店·····	167
魯迅故居·····	175
異鄉夜談·····	184
望向田野另一端·····	193
死·····	199
失去的山水亭·····	206
一位精神盟友的復活·····	211
微雨松江路·····	222
尋找謝雪紅的蹤跡·····	230



## 夢的終點 （自序）

陳芳明

革命的夢，串連著我三十歲時期的年華。那樣的夢，在遠離台灣數千里之外的一個城市釀造並孕育。因為有夢，跨入盛年之後的意志燃燒得特別熾熱，而情感也沸騰得格外滾燙。縱然是離鄉背井，縱然是埋名隱姓，爲了追求這一個夢，我於青春無悔。燒得火紅的夢，撐起生命中一段義無反顧的歷程。而今回首眺望，那場激情的夢，果然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夢。

猶記得最初到達洛杉磯那個陽光城市的心情，悲憤與徬徨佔據了我那時期的胸懷。見證了八〇年代台灣社會的政局逆轉，見證了熟識的朋友因爲政治信仰而被捕，我不免是抱持杞憂之心。那時的精神狀態，幾乎可以在南美詩人聶魯達詩中找到印證。在流放生涯中維繫著無可斷裂的熱情，無非是聶魯達的典型詩風。我也企圖在悲觀的情緒裡，尋找著戰鬥的力量。我不斷提醒自己：當朋友被剝奪發言權時，是不是應該在獄外爲他們發出聲音？當故鄉

的土地陷入冰涼的季節時，是不是應該以文字書寫使它感到溫暖？

投入海外政治運動，於我而言，無疑是具備了實際行動的革命。這自然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來看。到達洛杉磯之前，我對於政治的認識可謂混沌無智。但是，開始主持一份異議性的刊物之後，我必須放棄學院式，甚至是學究式的靜態思考，而學習以運動的觀點來注視台灣社會。我曾經熟悉的考據與訓詁的學術紀律，已完全被活潑生動的政治觀察所取代。這種思想上的轉變，對我不能不說是富有高度的革命性。

然而，我並不只是觀察政治而已，並且還進一步嘗試撰寫政論。這種書寫方式，全然迥異於往昔的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文學之所以迷人，主要在於它帶來無窮的想像，而這些想像無需經過實證。即使是屬於虛無縹緲的虛構世界，在文學領域裡不僅能夠存在，同時還真實無比。政治評論的撰寫，固然也需要想像，但那種思維方式並不能脫離客觀的現實。過於空茫浮泛的政論，不是暴露幼稚，便是淪為迂腐。

在洛杉磯時期，我的思考變得非常實際，甚至可以說實際得讓我遠離了文學領域，也疏離了我的歷史研究。為了從事革命，我寧可顛覆過去所嚮往的學術志業，並改變從前所耽溺的文學狂想。我全神專注於台灣的政情發展，不放過任何巨大震盪或細微波動。在生命歷程的每一階段，從未像我在洛杉磯時期那樣對政治的關心是何等虔誠。我把革命的夢看得很高；在內心的神龕裡，它被供奉在無上的地位。凡是對革命有利的事，我都樂於去履行實踐。

我甚至同意鄧小平所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是在那段時期，我開始閱讀左派的書籍。這可能才是我思想上與性格上的最大改造吧。在反共的台灣接受體制教育的知識份子，幾乎都是一面倒傾向極右的保守的思考。一旦接觸馬克思或社會主義的字眼，便立即聯想到充滿毒素與罪惡的事物。我第一次撫摩北京人民出版社的《資本論》時，也油然而產生不潔不德的感覺。台灣反共教育之成功，竟然深化至此。抱著戰慄的心情，我在艱澀難懂的翻譯文字中，推敲左派思想所構築起來的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而有著正義與公理的美好世界。這等於是在我的夢的基礎之上，又打造了另一個憧憬。我的革命，變得更為雄辯有力。因為，我再也不只是關心被捕的獄中的朋友，再也不只是為了反對專制的政府組織；我還要更進一步改造現狀，使台灣朝向一個具有人格尊嚴的開放社會。

要實踐這樣的夢，我也開始在不同的城市之間旅行，只為傳達革命的理念。至少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前，我很少在公開場合演說。猶記得第一次發表演講，是在一九八二年冬天的芝加哥。在大會堂的一群同鄉之前，我使用生硬的母語陳述我還不太熟悉的政治見解。那一次演講，我全然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對當時的聽眾，恐怕也是一場災難吧。從漠然的神情與稀落的掌聲，我強烈感受到同鄉的情緒簡直與芝加哥的寒夜一樣冰冷。但是，從那次之後，我就不斷參加巡迴演講。從美國西岸到東岸，從中西部到南方，都有我倉皇奔波的飛行紀錄。

有一年冬天，在愛荷華州的晚上甫下飛機時，一場殘酷且邪惡的暴風雪已在等待。來接機的學生小心翼翼驅車，載著我趕赴一場校園裡的演講。比預定到達的時間嚴重落後了兩個

小時，我以為會場一定空無一人。我從未想到進入演講廳時，竟然還有二十餘位學生在等候。他們說，愛荷華從來沒有經歷如此淒厲的風雪。但是，這群來自台灣的學生，選擇在那樣冰涼而陌生的小鎮給我極其熱情的歡迎。我不會庸俗地說這就是革命情感；不過，在寂寞的異鄉旅路上，因為有這樣奇妙的相逢，才不致感到寂寞。我總是假想這個地球上是不是只剩下我一個人孤獨地堅持革命的旗幟？離開家鄉是恁般遙遠，忽然在荒涼的小鎮或是浮華的都會不期遇到一些溫暖的回應，我才確知自己不是孤獨的。

難道我樂於在異國的土地上流浪嗎？難道我期待的革命可以在台灣之外的版圖上製造嗎？沒有人生來就是浮游的動物，我自己也從來沒有計畫要在美國久留。只是情不自禁捲入政治運動風潮之後，我才發現要追逐一個革命的夢，竟必須付出昂貴的代價。原來我已被列為思想犯，原來我的返鄉道路已被切斷。覺悟到這樣的事實時，我正擁抱著難以紓解的沉重鄉愁。在文字裡，在演說裡，我以高亢的情緒描繪著台灣的黑夜與黎明，卻無法排遣望鄉時的鬱悶。

革命的火苗，在我跨過三十歲的時候，引燃於內心看不見的深處。在政治運動的圈子裡，我使用一個筆名馳騁在海外的不同宗派之間。我相信革命，也全心為它辯護。也是同樣的這個夢，攜我越過四十歲的門檻。被時間押著走進中年的階段，我竟然還以浪漫情懷守住一個夢，不能不說是生命裡彌足珍惜的經驗。我曾經自稱是左派革命青年，自稱是政治運動旗手，現在回想起來自然覺得庸俗無比。但是，想到內心的火苗竟然能持續十五年以上時

光，這項成就我不能不引以為豪。畢竟我有足夠的勇氣反抗一個政府，也有足夠的意志涉入政治運動，更有足夠的熱情重建國家認同。雖說十餘年的光陰，對個人生命而言，毋寧是相當漫長；不過，對整個台灣歷史來說，卻是稍縱即逝。我在時代產生大轉彎的時刻，捨棄學院生涯，躍身於前途未卜的革命行動，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暗藏著下賭注的意味。許多人在當時認為台灣的民主政治已經輸掉了，但是我願意押注，以我的青春生命全部押下去，並且相信一定會贏。押寶的結果，歷史已為我證明是正確的。

如果那時不敢投入政治運動，我很清楚歷史不可能再給我第二次機會。我不是隔岸觀火的那種人，我更不是那種枯等、枯守，以致枯萎的那種人。三十歲的我，就是火種；要燃燒，就必須玉石俱焚。我放棄學位，放棄友誼，放棄國家；三十歲以前的記憶，即使歸於灰燼也在所不惜。我是燒得那樣徹底，燒得片甲不留，以致在一九八九年第一次回到台灣時，沒有多少舊識能夠辨認我的從前。我不僅背叛政府體制，並且也背叛自己的生命。我的背叛，使許多舊友感到害怕，甚至不敢也不願來相認。於此，我從未覺得遺憾。既然已經選擇跟著歷史前進，我想割捨的事件就免不了會發生，縱然那是何等感傷的事。

九〇年代初期終於回到台灣時，我告訴自己，那樣的夢似乎已經抵達終點。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於我是一個崇高的理想，只不過它距離台灣的土地極為遙遠。然而，夢即使特別遙遠，我還是讓它存留在記憶中最尊貴的角色。我牢牢記著在不同旅途上，聽到風的咆哮，海的呼喚。我也牢牢記著在陌生城市相逢的面容，他們有的已經遠逝，有的消失在北美洲不



第1輯  
蹀躞

知名的地方，有的相忘於江湖。作為夢的見證，我不會輕易任其淡化。他們見證了我的青春與熱情，我的意志與戰鬥。那個時代再也不可能回來，我的生命再也不可能回復；只因爲有夢，我於青春無悔。夢即是美，美即是夢。啓開記憶的窗口時，我會再一次讓夢繼續燃燒，燒得放膽且放肆，燒得輝煌而燦爛，燒得夕陽無限好。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 相逢有樂町

在有樂町，我與我父親的時代不期而遇，然後又交錯而過。

這是一個長久以來就熟悉的地名，是東京市內的一個車站。山手線的電車在此靠站時，我看到了站名，竟猝然湧起一股無可名狀的愁意。我想起了父親在戰後初期的身影，還有他那時代的蕭條、寂寥與苦悶。有樂町，這個名字出現在父親常常低唱的一首歌裡。每當酒後，父親就以沈悶的聲音唱起叫做〈相逢有樂町〉的日本歌。我並不了解歌詞的意義，但隱約可以感覺到父親是在撫慰自己的傷口，在傾瀉一股難以壓抑的情緒。我從未認真去理解他的心情，他的世界彷彿與我是隔離的。憶起父親孤獨坐在夜晚的後院淺斟低酌，偶爾便吟著日本歌謠，那份情景至今仍然使我感到心痛。

有樂町，於我是不快樂的。看到了站名，好像車廂又帶我穿過了時光隧道，回到蒼白的、青悒的一九五〇年代。〈相逢有樂町〉的歌聲，恍惚中又在深夜的何處悠然傳來。午夜

的車聲，敲打著靜了的、甜睡著的東京市街。有樂町車站外的街燈，輕染著一份淒迷，也夾雜著一份召喚。年輕時代的父親，是不是也懷抱著愁情，走過同樣的街燈之下？

長大以後，我才知道（相逢有樂町），是一首戀愛中男人的情歌。歌詞甜美，也帶著憂鬱。起首的兩句便是：

如果等你的話，

雨就下了……

經過有樂町時，正值午夜。車窗外並沒有雨水，吹進來的是沁涼的、微濕的夜風。我可以看見車前伸長的鐵軌。在遠處燈光的投射下，閃爍著兩條平行的、烏亮的鐵軌。倘若我與父親在有樂町相逢，他會把年輕時代的心情告訴我嗎？而我，能夠理解他的時代與他的世界嗎？

父親，是我最早的「日本接觸」。他是在殖民地時代受教育的，談話中，台語與日語交互使用。對孩子管教，他總是毫不遲疑以鞭子毒打；喝斥的聲音，儼然在指揮軍隊一般。如果這可以稱爲我的「日本經驗」，那實在是慢的，而且也近乎恐懼。然而，父親也有他感性的一面。他酷嗜帶孩子遠行，以旅途中之所見來增加我的知識與常識。我之所以能夠較其他兒時的同伴有更多的旅行經驗，純然是父親帶給我的。

我並不清楚，父親對日本是否懷有眷戀？對於世事政治，他絕口不談。他的時代，無疑是充滿窒息、找不到出口的年代。像所有戰後的台灣男子一樣，都賣命工作，不捨晝夜。深夜裡，偶有查戶口的事件，全家都陷於驚怖的空氣中。戰慄的、無聲的空氣，恍然凝住。在白天，父親卻又好像安然無事，他只是埋首討生活。爲了維持一絲做人的尊嚴，父親每天都辛勤不懈。他與他的那一代，大約都是這樣謹慎、苦鬥而存活下來的吧。在忙碌的日子裡，父親很少從容與孩子談過話。多少年來，我一直不知道他是否眷戀著日本？

飛行到日本，我多少是帶了一點心願，希望在這個國度找到父親從前的影子。他從前所看到的、意識到的日本，想必與我經驗的全然不同了。只是，我總是覺得在他身上嗅到日本的味道，那不單單是他使用的語言，而是另有一種介於粗獷與拘謹之間的氣質。這次的日本之旅，我終於在一些日本男人身上，看到了類似父親身上特有的那股氣質。如果說，那是父親對日本的眷戀所流露出來的，倒不如說殖民地教育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跡。

車過有樂町，我不能不想起父親的時代，想起他經歷過的戰爭，想起時代的轉換爲他帶來的不安。他未曾提起過少年時的抱負。歷史的狂流，挾沙泥俱下，如果他年輕時有過任何夢想，也一定是被沖刷得無影無蹤了。他不曾在孩子面前頹喪過；只是他暗地裡的喟歎與感傷，我是聽見過的。他年輕過，當然也像我我在青年時期立下過誓願的。那麼戰火攜來的離亂，以及離亂後的怔忡惶惑，恐怕不是我這一代容易去設想的吧。僅僅爲了這一點，我就不能不心痛地憶起他在後院獨酌的背影。他背對著家人，背對著遠逝的時代，單獨咀嚼著夢想



幻滅後的苦澀、挫折、傷害。

戰爭結束後不久，他從避難的台南搬回高雄，把全家安頓在一個叫三塊厝的地方。我不甚了然於父親是如何掙扎過來的。後來，只聽過母親閒談起，他賣過舊貨，擺過麵攤，又嘗試過碾米廠，最後改行從事電氣買賣。我初識人事時，他已經在經營一間小小的電氣商店。三塊厝，距離高雄火車站不遠，父親就在三民國小之前租一幢陳舊的二樓木屋。他偶爾牽著我的手，走到鐵道旁，與我一起觀望火車的北上南下。有時，火車過後，他會容許我蹲在枕木上，堆積小石塊。那往往是傍晚時分，高雄的山浸入一片暮色。父親坐在鐵道旁的田埂上，看我細心把石塊一一疊起，然後又推倒，重新堆積。他沈默的時候居多，直到夜色把他的身軀漆成一團黑影。

我想，他的內心是不快樂的吧。他從事商場事業之後，發現語言對他竟是一大羈絆，甚至閱讀報紙也頗為吃力。他參加公家機關的工程投標，總是爲了自己破碎的北京話而感到難以表達自己的想法。然而，他仍堅持去學習他不熟悉的語言。直到現在，他說的北京話還是殘缺不全。不過，我認爲已是卓然有成了。

也許是在外面商場遭遇了語言的困難，所以他一回到家就偏愛聆聽日本歌謠吧。我是在舊式電唱機傳出的平面歌聲中長大的。每想及一九五〇年代，那種硬質唱片播放出來的旋律，仍然會在我的心室裡回響。直到六〇年代，這樣的音樂仍然還未進入立體的階段。從美空雲雀，到小林旭、石原裕次郎，父親似乎都是喜歡聽的。這些歌手所唱的，無非是在發抒

戰後日本社會的憧憬、期許、落寞與幻滅。歌頌著愛情，歌頌著生命，也唱出男性的哀愁與振作。這可能才是父親較爲熟悉的語言吧，也可能只有這樣的歌才能唱出父親的心情吧。

我被送去受教育之後，接受的價值觀念，可以說與父親的世界扞格不入；甚至可以說，我是被教育來敵視父親的那個時代。我走入了一個讓父親完全感到陌生的天地，一個與他的時代完全疏離、隔閡的天地。當我開始到達塑造人格的年齡時，對於自己早年曾經有過的「日本接觸」，竟產生一種厭煩，一種幾乎是近於輕視的態度。對於他穿越過的扭曲變形的時代，我並沒有學習到絲毫的寬容與諒解。我從書籍知識學來的，從課室黑板上獲得的，便是如何使用貶損的字眼來譴責他的時代。我學會了指控，指控他們那一代是穿著殖民者的服飾，說著殖民者的語言。在他面前，我仍馴服如常。但是，在內心深處，我其實是與他決裂的。唱著〈相逢有樂町〉的父親的背影，恐怕並未察覺他的孩子已經距離他越來越遠了。

我與父親之間的時代斷層，並非只是語言上的，同時也還包括政治、社會、文化、思想上的種種差距。對於我的所學，他顯然沒有發生過興趣。他更不追問，我的知識是不是實用的。在商場風塵裡打滾的他，於六〇年代創造他生命中一段意氣煥發的時光。在那一個時期，我很少看到他陷入落寞的情緒裡。然而，也正好是在那段時間裡，我長大成成人，同時初步建立了我自以爲是新的、充滿期許的世界。父親與我，從此分別鎖在各自的時代思考裡。他並不在意，孩子是不是尊重他的觀念想法。他的孩子用一種矯揉的語言表達意見時，他看來也是那麼無所謂。直到我離家出國，父親與我似乎從來沒有好好坐下來促膝長談。我的離



鄉背井，等於是徹底與他的時代決裂了。

到我真正能去思考父親的時代，以及時代投射在他命運裡的陰影時，我已在他鄉浪跡多年了。那時，我翻閱著戰後初期的報紙。在那泛黃、漸趨模糊的鉛字裡，我窺見父親所處社會的魅惑與詭譎。那是一個混沌的、狂亂的時代，又是一個再生的、活力的社會。我終於領悟到，父親的時代是由開放與保守的兩極社會所構成。他見證到一個高壓的、閉鎖的殖民政權驟然崩壞，也目睹了一股要求秩序重建的意願正在興起。就在朝向建立一個莊嚴社會的道路上，他發現一個帶有敵意的、猜疑的價值體系也逐步形成。對抗的緊張情緒，瀰漫著他所賴以生存的島上。他自以為是樂觀進取的道路，次第變成灰黯、無望的旅程，直到一九四七年的一場流血事件發生過後，父親才確定戰爭之後所給予的許諾，都完全落空了。

他對自己產生了懷疑，但是又找不到答案。在新舊時代的交接過程中，在兩種文化激盪的夾縫裡，父親純然屬於迷失的一代。他保持高度沈默，與其說是出於恐懼，倒不如說是帶了一份無言的抗議。他日後把自己揣進一個隱密的內心世界，也是種因於那次事件的衝擊吧。只有從這樣的觀點去透視，才能夠解釋當年查戶口時父親的驚惶心情。也只有這樣去理解，我才能夠體會父親在一九五〇年代獨酌時的深沈苦悶。果真如此，父親在酒後低唱著日本的歌謠，就不能視為對日本的眷戀，而應該是受傷的靈魂暗處傳出的呻吟吧。

父親來到異鄉與我重聚時，他的前額已有些傾塌，而步履也顯現了蹣跚。看著父親稀疏的白髮，還有他鬆動脫落的牙齒，使我難以想像他縱橫商場時的豪情。他衰弱的身軀，不能不使我聯想到一九五〇年代時的他。他迢迢千里來看我，終於也沒有把他的心事說出。坐在湖岸的樓頭，他定定望著波光；那種身姿，一如他年輕時攜我望著北上鐵道的情景。經過這麼多年之後，我彷彿已能夠揣摩他的心境。然而，也僅止於揣摩而已。

他活在一個所有出口都被封閉的時代，包括他靈魂的井口。他的掙扎與奮鬥，都表現在為了生活而奔波的行動之中。他的無言，足夠反映他的內心。我為自己當年所持的輕蔑，感到無比遺憾，也無比痛心。未能代他發抒心聲，就已值得自譴了；我竟還站在他的傷口落井下石。倘若他知道，內心是不是感到抽痛呢？

在有樂町，我與父親的時代不期而遇，然後又交錯而過。我飛抵了日本，方知我早期的「日本接觸」，實在只是表面的，是虛構的。然而，我終於還是沒有跨越時代的界限，去瞭解父親的悲愁。歷史的齒輪，無情地把他的世界輾平，輾得支離破碎，終至無聲無息。

路過有樂町，正值午夜。我總覺得〈相逢有樂町〉的歌聲，在東京的什麼地方悠然揚起，向著天上，向著人間。

——原載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當代〉月刊

## 在植滿荊棘的夢土

### 島狀的夢

阡陌縱橫，是我的記憶。像攤開手中的掌紋，我攤開揣在心懷裡那張陳舊的地圖。細讀地圖上的紋路，無論是實線或虛線，我可感知，條條都緊緊繫著我愛戀過的那塊土地。從田間的小路，到城市的曲巷，都投射著我的身影與心影。我珍惜著每一道交叉的線，也愛撫著每一條摺疊的路。我攜著自己回到熟知的曲折巷口，穿過每一條曾經徘徊難捨的道路。千迴百轉的巷與路，像極推理小說中的每根線索，彼此都相互牽連，往往最後都沒有結局。我反反覆覆走遍了地圖上的紋路，終於都找不到出口。總是在這樣的時刻，我焦急地驚醒。和著全身的冷汗，驚醒在地球另一面的一張異鄉的床上。

那時，我就推窗而起，迎進北美最遲最涼的深夜微風。湧滿室內的，是惆悵，是抽痛，是一聲拉長的輕嘆。然後，我會勸誘自己寧靜躺下，再度攤開阡陌縱橫的記憶。我的夢，總是呈島狀，稍帶綠色，幻游於北半球的星空。

### 左營 一九五〇

我看見我再度從低矮的屋簷下走過，那是兩排裸露著粗糙紅磚的平房，中間穿過一條濕霉的、溢臭的小路。母親常常禁止我走這條巷道；背地裡，我還是選擇走這條捷徑，一條通往學校最短距離的道路。我熟悉從學校到家門路上的每一個轉角，每一件事物，每一張面孔，只有這條巷道，對我總是陌生的。

每當春雨過後，路面更加泥濘不堪。我常可看見衣著簡單的婦女坐在那黑暗的門內。她們的臉，往往模糊得難以辨識。有時，幾張面孔認清了，但數天後便無端消失，然後又換來新人。有一次，看到門裡坐著一位同學的姐姐。她向我搖手招呼，露出親善的微笑。那天回到家裡，告訴母親我在路上之所見。她知道我又走過那條禁止的道路，先是責備，又倏然而止。我彷彿聽見母親在廚房低聲咀咒：「夭壽啊，那樣年輕的女孩，也送到那種地方。」在整個平靜的童年，我從未去探究「那種地方」到底是什麼地方？只記得我繼續往返於那條難以見到陽光的小巷，直到小學畢業。長大以後，我始悟然，原來那種地方就是人們傳說中的私娼寮，而同學的姐姐竟是被送去當雛妓。那時，我並不理解，那張親善笑容的背後，暗藏了怎樣淒涼的心。

我到小城北端的一家中學去讀書後，再也沒有回去過那條泥濘的窄巷。然而，隨著年齡的成長，春雨裡那張微笑的小臉，卻越來越擴張，幾乎盤踞了我青少年的心胸。曾經有一段時光，家鄉小鎮的後街，似乎不斷伸長，迤邐深入我慘綠的年代。倘然，當時就已經知道人間的傷痛與損害存在於那小巷暗處，我的心智會不會加速早熟？我的童年是不是還保持平靜？我並不知道答案。然而巷內的微笑，逐漸成爲我認識人間幽暗面的一個起點。

初識那張笑容後暗藏的悲愁，生命彷彿蒙上一層陰翳。在中學時代，對於美的、寧靜的事物，我竟學習到如何不去迷信。從而，對於教科書中的記載，我也慢慢不去相信。我開始怠惰、逃學，盡情閱讀學校以外的書籍。我並不反叛，只是消極抵抗。我的生活一如其他平凡的學子，在晨曦中騎腳踏車上學，又在黃昏裡騎腳踏車回家，沿著那擠滿菜販、小攤的大路回家。在填鴨式的惡補陰影之下，永遠是那塵塵惶惶，又那麼愁雲慘霧。但是，我並不相信學校的教育，我寧可以眼睛去觀察、去目擊。如果，生命裡有所謂啓蒙的話，後街的那張同學姐姐的笑容，應該可算是我人生滋味的一次鞭擊吧。

如今，在我淡了的、逝去的記憶中，家鄉仍是一個美麗的小城。那一排圍繞著墨綠山崗的朽舊城牆，那一抹投射在蓮池潭的半屏山倒影，那一群星光般的街巷燈火，總是在適當的時候回到我的記憶。我和著淚水，以著數倍的愛去擁抱這些山光水色，要把最美的部分烙印在我的生命。但是，我記得最清晰的，還是春雨裡那一份無奈、無助、無語的笑意。那畢竟是我人生道路上，悲哀的最初原型；那原型，塑於一九五〇年代的末期。

## 花蓮 一九六〇

我在島上最遙遠的旅行，完成於服預官役的一九六九。在那短短的一年，我走過島嶼的東岸，然後又被調至台中清泉崗，高雄阿蓮鄉，終於在新竹湖口退役。行伍生活，使我有機會鍛鍊自己的意志，也使我第一次有機會看過島上土地的粗獷肌膚。

在大學時代，我總覺得我的島嶼是屬於女性的。從嘉南平原北上，蜿蜒的火車領著我越過亞洲最動人的稻田。無論是春耕以後綻放的碧綠，或是秋收之前鋪陳的金黃，嘉南平原的姿色總是使我無法抵抗。從恆春綿延到濁水溪，每一寸顏色，永遠帶著柔美的魅力。車窗外，是我飛翔的想像，是我堅持的認同，是我穩定的信仰。

若是從台北盆地出發到宜蘭平原，島嶼的女性美，仍然持續伸展著。火車穿過富饒的北部稻田時，曲線柔滑的山稜，點點發亮的波光，常常猝不及防湧入車窗。這一塊甜美的土地，隱藏了島上子民多少的滿足與寄託。沒有人相信，我們的先人是如何結伴從西部平原越山過來。這一片廣漠的水田，埋葬許多島嶼的雄心壯志，埋葬無數無名的奮鬥人物與事跡，也埋葬了在歷史逆流中不少沉沒的哀痛與挫折。每次在噶瑪蘭平原的去和來，我常懷一種異樣的感激。我同時也帶著另一份情，去愛戀平原上永遠訴說不清的魅力。遠處農人辛勤工作的背影，村莊聚落銜接不斷的屋瓦，田園盡頭迎風搖曳的樹林，都具備了女性的寧靜與安詳。於今，這些已都成爲我的內心風景。最美的山河，往往最能觸痛我的記憶，痛徹我的心



骨，久久不能停止。

發現島嶼粗獷的一面，已是到達花蓮以後的事了。彷彿台灣的男性壯美，都齊集在濱海的花蓮。嶙峋的山峰，乾枯河床的鵝卵石，海岸的岩石與峭壁，全然異於西部平原的秀麗。那年，我被編入一支陸軍部隊，駐在一個接近山地的村莊，叫做嘉里灣（原住民讀成「卡萊灣」）。看山，是我在花蓮養成的一種習慣。那裡的山，到處都留下大自然的刀痕，看來像極朱銘的木雕。有些山壁，看來似乎經過斤斧的斜劈，石質的紋路朝同一方向奔走，構成一個巨幅的藝術傑作。花蓮的山巒，並非靜止，而是動態的。山稜線的起伏，岩壁間的光線，峽谷交錯的構圖，都暗示了冥冥中的一隻巨手在安排擺佈。從不同的角度的觀察，隱約可以感覺群山也在移動。每當回首，總是赫然看見一幅全新的山河。

最令我刻骨難忘的景象，便是初秋河床上猖獗滋長的蘆葦。蔓草亂飛的河岸背面，就是滿畝纍纍的鵝卵石。每次行軍休息時，坐在河床上，望著乾涸了的河道遠遠消失在山腳，高聳的山頭，鎖住了整條大河。我幾乎可以想像它激流充沛時的盛況。自山裡湧出的河水，細心洗淨河床每一顆圓石，巨細靡遺，那一定是在初春花開的時節。

然而，我喜愛的是，亂石的潔白與蘆葦的灰白相互交映的秋天。我的島嶼，也有蒼茫的時刻，我常常獨自走到河床中央，讓暮色襲來，整個大地也圍攏過來，攫住一顆脆弱的心。在漸漸昏暗的野地，一邊是矗立而起的山壁，另一邊是悠長平緩的河道，似乎空氣裡正釀造一股欲泣的寂寞。就在那最脆弱的刹那，看見燈光自山間，自河岸，稀稀疏疏次第燃起。憑

藉著一盞盞的燈火，頓時又在內心深處找到溫暖的依靠。啊，野性的花蓮，這時又流露了它柔情的一面。

自囚在島嶼東岸的時期，加深了我對台灣的眷戀。然而，我並不知道，六〇年代的末期，正是台灣開始跨出門檻，迎向動盪的年代。一九六九年，我離開花蓮。那年，人類第一次登陸月球成功，猶記得太空人阿姆斯壯的豪語：「踏上月球，於我是一小步，於人類則是一大步。」也同樣在那年，台灣的少棒隊在美國獲得冠軍。我的心情，全然靜止。那冠軍，並沒有使台灣在國際上跨出任何一步。

## 台北 一九七〇

台北，是一個傷心城。黃凡的小說，已為我們下了最準確的定義。台北之令人傷心，是因為在那裡，往往可以在最快的時間裡，獲得最壞的消息。釣魚台失去了，退出聯合國了，與日本斷交了，尼克森在上海發表公報了，能源發生危機了，都在七〇年代初期，一次又一次傳來消息。那時，每天出門，都可以看見滿街的旗幟。彷彿旗子掛得越多，信心就越雄厚。一場急雨過後，所有的旗幟立即變色。不久，那些充滿信心的旗，都堆棄在路旁的廊下。台北，真是一個令人傷心透了的城。

走到台大校園，每天都出現新的標語、海報與口號。我懷著一顆忐忑的心，急急走過椰子樹下。有人在那裡靜坐，也有人專注讀書。那些海報，五顏六色，似乎沒有一張與這些莘

莘學子有關。到了研究室，總有一群人聚首議論。每個人神色凝重，無論是慷慨激昂，或是摩拳擦掌，整個時局並不隨著他們的意志而有所轉變。

越戰疊疊高升，孟加拉在一夜之間宣佈獨立。亞洲的南緣，繼續陷入戰火。只有動盪中的台灣，最為平靜。所有的電視報紙，仍然選擇最美好的故事來報導，諸如尼克森的女兒結婚，台灣少棒又贏得世界冠軍。台灣外面的世界，都塗上一層玫瑰的顏色。我把自己關在研究室裡，不讓任何陽光進來。對於政治，我有一種莫名的恐懼。

整個台灣都很平靜，只有台大校園不平靜。然後，又聽說有人出門示威，甚至還有割腕自殺以示抗議的事件發生。整個台灣都很平靜，只有台北城不平靜。這是一個徹底令人傷心的城市。我把自己鎖在古典的書籍裡，翻閱每一頁泛黃的線裝書。偶爾，發現一隻游動的蠹蟲，從第一卷貫穿到第三卷。就在「春王正月」那一行的尾處捕獲，我立即予以就地正法。泛黃的紙頁上，留下一絲銀色的漬汁。台北，這時離我最遙遠。

在暮靄裡走出校園，文學院的燈火一片輝煌。在這個動亂的時代，能夠安身立命，無疑是一種幸福。走出校園圍牆，我才算回到人間。只有在學校外面，才能看到真正的社會改革者。他們辦雜誌，冒著隨時被逮捕的危險，發表一些在當時看來極為震撼的文字。我會拿來閱讀，但不與任何人討論。就在接觸那些文字之後，我的心湖釀起了風暴。那些文字裡，有著最熱切的心，卻只爲了表達最低的願望。他們要求的改革，並不給予絲毫幸福的許諾，而是希望如何穩住台灣這一艘逆風的船，重新找到它的方向。

不久，我遇到了一位改革者。那時，他剛訪美歸來，對於台灣內外的形勢，瞭若指掌。坐在臨沂街的一間公寓裡，他闡釋自己的見解，對時局也頗有微詞。然而，他並不責備，也不出任何惡語。在那次單獨的見面裡，我第一次感受到改革的希望。他邀我協助編輯那份頗受矚目的雜誌。我的恐懼，使我立即回絕。他對我似乎有些失望，但仍然以一些鼓勵的話安慰我。

對他，我心存感激。我生命裡，第一次自覺要去瞭解政治，應該是在那次與這些改革者見面之後的事吧。後來，改革者參加選舉，如一般人所預期的，他被安排落選。他的失敗，刺激了我許多思考。然而，我與他失去聯絡。一九七七年，他當選。一九七九年，他入獄，這都是我離開台灣以後的事了。

每次想到他，我就看到七〇年代初期的我的自私。我到現在仍不能理解，爲什麼自己會有那麼多勇氣，把整個世界鎖在研究室的外面。曾經有過幾次，我企圖戳破知識的繭，希望介入社會，希望把學問化爲行動。我卻又能夠適時找到千萬個理由爲自己辯護，最後又選擇最恰當的藉口，驅使自己回到書房。知識份子的脆弱與無力，恰如其分出現在我的身上。在台大文學院的一個窗口裡，暗藏了一顆蒼白的心，一股毫無羞愧的自私，還有一些青澀的、萎頓的思想。縱然我激動過，悔恨過，直到離開島嶼前，我終於還是扮演了一個背叛台灣的知識份子，一個可恥的、無用的書生。



## 謝春德 一九八〇

倘然說，我是離開台灣之後，才開始瞭解台灣的，這並不是過分的說法。一九七四年，我選擇到北美的一個學校讀書。到達學校的第二天，我便把自己關在圖書館。這次，我把自己安置在那一排陳列有關台灣歷史藏書的書架之前。有生以來，我第一次從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我訝異於自己對島嶼歷史的無知，更訝異於對自己身處社會的不解。猶記得每次從圖書館出來，我的心情幾乎是跌跌撞撞的。

那種在內心裡對自己的譴責，遠遠超過我從前所遭受的任何詬罵。每當無以釋懷，便只有驅車到海邊，凝望西沉的夕陽，也注視著在我心中升起的島。那是一片美好的海岸，風平浪靜時，總會航行數艘寫意的帆船。每到秋風急起時，海水換成墨藍的顏色，翻起的浪花，狂暴敲擊著岸邊的岩石。停車在那海岸，我強烈想起台灣，想起另一片美好的沙灘。

靜靜坐在車裡，眺望陌生的秋天。我的記憶，便阡陌縱橫一般，在天地之間傾瀉張開。我重新複習每一條走過的路，回想每一位我遇過的人，咀嚼每一件做過的事。記憶，有時非常神奇，十餘年、二十餘年遺忘的人物，總會不經意在思考中湧現。生命裡，有多少破碎的心，多少幻化的夢，都在記憶裡一一補綴。

然而，我總是有這樣的感覺，離開家鄉不歸，就等於在家鄉死去了。遠隔著一個茫茫的海岸，我好像在眺望我的前生。從一九七四年，我便消失在島上，消失得不存一隻影子。所有的熱戀，已經冷卻；所有的火焰，皆已成灰。我之於台灣，不僅僅是缺席而已。我已難以揣測，一九七四年以後的台灣，究竟換成了怎樣的容貌。事實上，我記憶中的台灣，也已風化得殘缺不全。

我確知，島上的子民仍然具備了堅毅的心，仍然爲了改造一個更好的明天而辛勞工作。遠在地球的另一面，我也聽到島嶼重又喚醒的信息。就在我翹首佇望的時候，我遇見了謝春德。

我看見他背著相機向我走來。寬闊的衣袖，在風中搖動，像極我每一位熟悉的人物。他以厚實的手掌緊握著我，毫無矯飾，毫無隔閡。他告訴我，他最近攝影的系列作品，是以台灣的土地、居民爲中心，時間是從一九七四年，迄於現在。他的談話，使我怦然心動。因爲，他攝影作品的時間，正是我在台灣全然死去的空檔時期。

謝春德誠然是一位性情中人。他頗知我的懷鄉之情，返台之後，立即航寄他的重要作品供我觀覽。翻閱他的每一幀相片時，我彷彿可以聽到我的心跳，好像在細數相片中的每一寸時光。

紅瓦綠野的鄉村，細雨斜風的小路，斑駁陳舊的農屋，並沒有因我的逝去而消失。記憶裡的土地，仍然生生不息。謝春德忠實記錄了土地求生的意志。在濕霧裡，在陽光下，在陰雨中，到處都充滿了生機。他的鏡頭，並不選擇「純美」。台灣的純美，表現在泥濘的道路，表現在裸露的紅磚，表現在亂石的野地。我遺忘的許多景物，因他的作品而再現。如果

我的島嶼，足夠被讚許為「美麗島」，那一定不是青翠的清林、蒼鬱的高山而已。島上居民淌下的每一滴汗，貫注的每一分心力，才使我的土地更加美麗的吧。

在我死去的日子裡，雍容自在的祖母，坦然無畏的村婦，結實碩壯的青年，持續表現他們不卑不亢的生命與尊嚴。他們之所以勇敢不懼，因為他們都與土地牢牢結合。作品裡顯現的面容背後，並非沒有敗壞的、傷害的事。然而，以堅毅來克服脆弱，以勇氣來替代畏懼，以勤勞來驅走懈怠，不就是台灣子民的天然性格嗎？

謝春德留下這些作品，是值得感謝的。自一九七四年以降，我們的土地經歷了多少風霜，島上的居民又遭受了多少打擊。我們往往只注意到重大的事件，總是疏忽了大時代裡的小人物，以及他們的心情與表情。透過謝春德的鏡頭，我們窺見了時代裡細微的一面。台灣的不可輕悔，不就在每一幀相片中恰當表現出來嗎？

我偏愛謝春德的作品，因為他不濫情，不濫用人道主義。他不會使用冰冷的照相機去關心下層人物，更不會利用別人的痛苦來提升自己的熱心腸。他的相片不說信，不說望，不說愛。他的作品，只說真。真實地把台灣的土地與居民表現出來，便是他最大的完成。

翻閱他的作品，我聯想到一九五〇年代春雨裡的那張笑容，也想到一九六〇年代花蓮海邊的燈火，又想到一九七〇年代一位台灣書生的愚妄與自私。這些是我個人永遠的影像。相對於謝春德的作品，我的世界之狹隘，是多麼不堪聞問。藉他的鏡頭，來讓我的影像曝光，

讓我的胸懷更加寬闊。僅此一點，就值得稱頌的了。在那植滿荆棘的夢土，我看到了真實。為此，我對謝春德充滿了感謝。

一九八七年九月 聖荷西

——〈自立早報〉一九八八年一月廿七、廿八日

## 我的母土與母親

### 台灣的每個時代，都是流亡時代

存留在我內心的台灣形象，具有痛楚與勇毅的雙重象徵。我總是看到歷史之鞭揚起，擊打在遍體鱗傷的島嶼。但是，我也常常看到，我的母土在風雨中巍然站立起來，抵抗時代的逆流與狂流。體認台灣歷史的性格越深刻，痛楚與勇毅的形象就越清晰。這雙重的象徵，已成為我思想上、意志上的精神原型。

這樣的歷史形象，是我在異鄉被迫流亡時僅有的懷抱。離開台灣之後，我才更加感受那塊使我輾轉不安的島嶼，是充滿母性、充滿溫暖的土地，十餘年來，我熟識的、或不期而遇的、或已經去世的許多朋友，都同我一樣懷著痛楚的心情望鄉，望向那生命的最初原點。在地球的每個角落，無論是多麼偏遠、多麼荒涼，使他們能夠戰鬥下去的唯一支柱，便是故鄉

之思、土地之愛。黯淡的生命裡，若是還存有一絲光芒，台灣就是那光源。

在歷史上，台灣的每個時代，都是流亡的時代。多少人爲了付出台灣之愛，而遭到凌辱、監禁，也遭到流刑、放逐。在島內、在域外，精神上的流亡其實是一致的。縱然肉體沒有受到牢獄之苦，仍有不計其數的知識份子，他們的言論、思想還是受到放逐。留在台灣、葬在台灣吳濁流與楊逵，流落在中國，埋葬在中國的江文也與蘇新，終其一生，都沒有親眼見到自己的作品在故鄉完整浮現。

吳濁流撰寫的《台灣連翹》，在他生前從未譯成中文出版。他甚至基於政治理由的考慮，在全稿完成後，囑咐必須在十年之內不能發表。楊逵遺留的書簡與殘稿，也都在他告別人間後，才出土見到陽光。吳老與楊老的文學作品，其命運之淒涼，又與放逐何異。江文也的音樂作品，在他有生之年，都在島上受到監禁。直到去年，他的作品才被宣告解禁，然而，他已聽不到自己的音樂在故土悠然升起。蘇新的歷史著作，至今仍然在島嶼外面流傳，卻從來沒有機會回歸台灣。有多少年輕一代，知道他的作品？他的名字，其實已在時光的激流裡，被沖刷得無影無蹤。蘇新去世時，緊緊擁抱台灣之夢；但是，他並不知道，故鄉已經全然遺忘了他。

回歸，並不是肉體回到故土而已，倘然思想、文字、言論不能在土地上復活，那麼流亡者永遠就繼續流亡下去。我所認識的台灣民主運動前驅者郭雨新先生，他比許多海外的流亡者還幸運，最後能夠埋骨於故鄉的青山。然而，他生前的夢與理想，仍然還受到扭曲、誤解



與侮辱。對於這一悽愴、冤曲的靈魂，總是使我常懷傷感。他的奮鬥、他的志業，還未受到肯定，還在歷史的潮流外浮沉。

### 我可憐的母親，陷於莫名的恐懼中

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放逐生涯，是介入海外台灣人的政治運動之後。一九八〇年夏天，爲了聲援美麗島受難人士及其家屬與同志，我決定離開校園，參加《美麗島》在美國的復刊工作。那是我生命裡最艱苦的一段生活，但也是我最感到刻骨銘心的一段經驗。

在一幢朽舊、斑駁、簡陋的木屋裡，我度過整整四年的時光，我總是假想，我的文字可以帶給失去自由的朋友一些溫暖。在許多寒冷的黑夜，當我埋首書寫時，浮現在我腦海裡的，不只是那些已識、未識的朋友，我常想起台灣的歷史命運。加諸於受難者身上的鐵窗手銬，正是承受戒具枷鎖的台灣象徵。他們的受難，只不過是因爲思想、言論不能見容於當權者。他們的罪惡，也只不過發抒了台灣社會的心聲。然而，台灣歷史不都是以手銬與腳鐐寫成的嗎？

到現在，偶爾還會有人問我，爲了介入這段政治活動而耽誤了學位，難道不感到後悔？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如果說，我從來沒有爲這個問題掙扎過，那是不誠實的。我的內心確實發生過糾纏，而且久久難以釋懷。不過，在公義受到扭曲之際，在朋友的命運遭到摧殘時，甚至連祖母、女孩都必須賠上性命時，我必須承認，學位對我已不是次要的事了。我決定自我囚禁時，深知並不能改變一切既成的事實。然而，我更清楚的是，在那段近乎絕望的日子裡，我如果不爲獄中的朋友做一點什麼，我這一輩子就會感到後悔，我會爲自己在那段時期裡得到學位感到可恥。

歷史潮流湧來時，是要逃避，是要迎接，完全在於一念之差。在那四年艱苦的歲月中，我的體重急遽減輕，右手風濕也加速惡化。不過，我總是以自己的處境拿來與獄中的朋友比較，也以林家血案的悲劇拿來提醒自己。我畢竟是島嶼命運的逃亡者，我是幸運的。

我的逃亡變成流亡，是漸漸形成的。我發現，我寄回台灣的信件開始受到檢查扣押。我打回台灣的電話，也出現監聽干擾的跡象。我的稿件往往不知所終，如果被刊登的話，還有使雜誌受到停刊查扣。不久，又獲得消息，我的朋友、親戚、家人也陸續受到思想警察的訪談。最後，我護照的簽證被取消，返鄉的道路被切斷。

我從來沒有意識到，我從事的是一件拚命的事業。當權力人物不辭辛勞對我進行構築工事之際，我還以爲隨時可以回到家鄉。等到我警覺到權力者對我懷有高度敵意時，在我家鄉的發言權已幾乎被剝奪淨盡了。

那四年，是我在台灣埋名隱姓的時光。但是，使我耿耿於懷的，卻是家人的無端受到騷擾。他們都是善良的、不知如何傷害別人的尋常百姓。他們定期完糧納稅，奉公守法，竟只因爲我發出異議，而必須被連累受驚。他們並不清楚，遠在海外的我，究竟犯下如何的滔天大罪，何至於安全人員會登門拜訪？我可憐的母親，陷於莫名的恐懼中。

爲了瞭解我在海外的作爲，我的父母特地迢迢千里來探望，那是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已  
有六年沒有見到她，當她從機艙走出時，我的血液全然凝住。母親彷彿是走出時光隧道，變  
得淒涼蒼老。父親也已經是一個步履艱難的老人。我的胸膛，緊緊繃著一股強烈的罪惡感。  
我奔上前去，擁住他們，卻說不出一句話。

### 「答應我，做一個平凡的人」

母親仍然是一副什麼事都不會發生過的模樣。她到家裡後，不提任何問題，只是與我的  
兩個孩子宜謙、宜羣講台語。我是多麼希望她能引出話題，好讓我有解釋的機會。但是，她  
只是話家常，告訴我家鄉左營舊城前的那口水井仍然無恙，土地公廟不久就要遷到新址。她  
說那麼多話，與其說是爲了避開敏感話題，倒不如說是爲了讓我重溫昔日舊夢，她頗知我的  
思鄉與望鄉，她知道我已被放逐在外，但她對於這些，全然不發一語。

我的父親終於還是問起了我。在一個午後，母親還在睡覺，父親選擇與我獨談。父親  
說：「安全人員曾經提到，你是《美麗島週報》的總編輯，是真的嗎？」他的語氣裡，混合  
著責備、好奇的情緒。

我沒有正面答覆他，而只是說：「你想，可能嗎？」

父親又說：「你在海外所做所爲，必須自己負責。不過，不要做得太過分，而影響台灣  
家人。」

我知道，我必須答覆這個問題。我說，我會爲自己說過的每一句話、寫過的每一個字負  
責。然後，我告訴父親：「如果你生在我的時代，也一定會走我同樣的道路。你們那個時代  
沒有解決的問題，當然必由我們的時代來解決。」

父親聽我解釋後，完全沉默了。我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傷了他。望著他稀疏的灰髮，  
我想像他青年時代的勤勞苦幹。他對我有過巨大的期許，當他知道我的工作後，是否感到幻  
滅，這是我不知道的，從那次對談以後，直到他回去那天，父親沒有再提任何問題。我常常  
看見他坐在窗前沉思，我總是走過去，坐下來，嘗試與他談話，但終於都沒有成功。

母親卻是更加沉默，是否父親已告訴她我們的對談，我不知道。送他們到機場時，母親  
在車上也沒有說一句話。我扶著她走到機門，母親突然轉身過來，眼睛已噙滿淚水，然後她  
說得很緩慢：「答應我，做一個平凡的人。」母親帶著淚眼望著我，見我點頭之後，便立即  
又轉身走進機艙甬道，與父親往前直走，再也沒有回頭。

我忘不了她漸走漸遠的身影。她一定是以爲，她的孩子在從事驚天動地的工作。她說那  
樣的話時，彷彿已經失去了我，希望我能浪子回頭。母親並沒有錯，她與所有台灣人的母親  
沒有兩樣，要自己的孩子安身立命，做一個平凡的人物。

然而，母親並不知道，她的孩子是最平凡的。我所追求的，也是所有台灣人最平凡的  
夢，讓公義回到人間，讓溫暖回到島嶼。僅僅是這樣的追求，就使一個平凡的孩子變得不平  
凡，這不就是時代的錯誤嗎？我可憐的母親，仍陷於莫名的恐懼中。

## 對親情與鄉情的折磨，是醜惡的暴力

我的母親，能夠瞭解我的所思所想，還是最近這一兩年的事。因為，她漸漸能夠獲讀我的文字，也漸漸發現與我同樣想法的人，在台灣常常可以遇見。父親則更能表現對我的體諒，去年他來看我時，已經能夠暢懷與我討論台灣的政局。

我並不尋求他們百分之百的支持，但至少希望他們不必再為我的言行感到慌亂緊張。在他們身上，還是保存了台灣人純樸、無爭的氣質。在內心深處，恐怕還殘存一份難以言喻的恐懼吧。

每思及此，我就想起台灣的痛楚。我總是看見歷史之鞭揚起，狠狠擊打在遍體鱗傷的島嶼。我母親的恐懼，毋寧是歷史殘留下來的鞭痕。只要我放逐的生活沒有結束，母親就會覺得失去的孩子仍然沒有回到她身邊。那一份恐懼，也必然繼續咬噬著她。

倘然我的母親是焦慮不安的，那麼整個島嶼也是輾轉不安的，因為流落在地球四方的，還有不計其數台灣的孩子，正在從事肉體上、精神上的流亡。在島上，也還有人在從事思想上的流亡。

我並不認為，放逐生涯可以化為光榮的印記；它其實是台灣歷史上的恥辱傷痕。在這個時代裡，即使只剩下一個不能回歸的人民，那麼這樣的政權就是不義的統治者。對親情、鄉情的折磨，是一種醜惡的暴力，也是一種變態的人性。當權者可能因此而稱快，但絕對不會

因此而得勝。

痛楚與勇毅，是我的母親與母土的雙重象徵，也是全體台灣人的精神原型。在北美、在歐洲、在南美、在非洲，都有台灣子弟懷抱這樣的心情在望鄉，望向那生命中的最初原點。他們的台灣之愛，是無可輕侮的。由於那樣的愛，我的母土台灣又會站起來，抵抗時代的激流與逆流。

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

——〈首都早報〉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 離台十五年祭

1

唯北美深夜殘存的星光，能夠反射我此刻返台前的心情。十五年了，那些星辰必然知道，每當深夜，總有一顆不眠的心，守著窗口，朝向台灣瞭望。同樣的星光，見證我跨越三十歲，也看到我涉渡過四十歲。那些閃爍的光芒，映照過我是如何從壯年邁向中年，也映照過我如何在折磨中掙扎，在困頓中突破。

不眠的眼睛，其實是不碎的意志在堅持。有時，我覺得自己彷彿是監禁在遠方的困獸。我沉吟，我怒吼，卻只能坐視檻外的一切變化。獸一般的我，能夠堅持活下去，大約就只是憑藉一己的意志。然而，有時又覺得自己不必然是在困居，而是一匹在荒野走動的獸，全然喪失了巢穴的怪物。遠方的雷聲與風暴，只依賴一顆脆弱的心在承擔。這樣幾近衰竭的心，

終於沒有被擊敗。我走過漫無邊際的道路，但我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那過程，緩慢而痛苦。然而，最重要的，也就是那過程把我軟弱的心力與意志鍛鍊成粗壯的柱子。

十五年，絕對不是短暫的旅程。不僅是我的生命徹底受到改造，我的土地也更是發生了劇變。但儘管變化與改造有多巨大，我深信，我和我的土地都在尋找命運的答案。

人生的道路，有迂迴曲折，也有小路捷徑。我選擇我走過的遠程，從來並不後悔。美國詩人佛洛斯特有一首詩是〈未曾選擇的道路〉，最後兩行說：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這恐怕是我十餘年來最好的寫照。擺在生命前的兩條道路，一是草木茂盛，綠蔭湧路，一是荒草野徑，人煙稀疏。當道路經過抉擇之後，就不容再回頭了。無論我們如何推想另一條沒有踏上的道路，旅行的經驗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一旦我走上踽踽獨行的荒徑，那就是不歸路，人生已全然兩樣。

我選擇人跡較少的旅途，像野獸般在曠野走動，只不過是爲了使生命更有意義。那樣的選擇，是因爲我拒絕接受被扭曲的人性，也拒絕吸收被歪曲的知識。

## 2

我關切的台灣，這十五年來主要有兩個重點，那就是人格與國格的問題。有人權，國有主權。喪失了這兩樣東西，大約就喪失了生命的意義。

在海外的台灣人，最能感受台灣在國際上的孤立與羞辱。一九七四年冬，第一次驅車從西雅圖北上加拿大溫哥華時，就深深為自己是一個沒有國際人格的公民而覺得痛苦萬分。當我被加拿大海關人員阻擋之際，我佇立南望橫跨美加邊界的白色國門建築，竟產生一種莫名的悲哀。眼看許多手持不同護照的外籍人士順利進入國境時，我是唯一被留置於關口的人，只因爲我的護照不被承認。

我最後獲准進入加拿大，並不是我的護照，而是我的學生身分。我的朋友遠從西雅圖攜來一份我的學生證明書；憑藉那份文件，我才得以跨進加拿大，我深深感受到，一紙學生證明書竟然遠勝過一份官方的護照。這樣的國格，其實就是我人格的一部分。我在遠方的邊界上遭到阻撓，豈非也就是台灣受到污辱、貶損？我可以想像，在這個地球上，凡有關口的地方，也必然常常出現受到阻難、受到盤問、受到奚落的台灣人吧。在我整個年少時期，國家與國格的問題，從未在我思考中發生困擾。然而，就在我即將跨向壯年之際，這個問題竟然開始痛苦纏繞我。內心裡，國家認同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的交戰。我不能不對過去的所學所思，產生巨大的懷疑。

一方面，台灣教育體制塑造了我的中國人格；另一方面，這樣的人格在島嶼以外地區受到強烈的嘲弄與貶損。從我踏出台灣的國門那一刻開始，就已有一股力量驅使我去探索台灣的歷史性格與歷史方向。那股力量，其實是一種壓力。七〇年代初期，台灣社會同時遭逢內政與外交的巨變。身處在那種時代的台灣青年，倘然還稍存一些政治意識，必然都會感到台灣社會體質的虛弱。我乘桴於海，便是爲了尋找一些歷史的藥方吧。

只是，我從未想到，探索的歷程會爲我帶來無比的震撼。首先，我發現了台灣歷史教育的欺罔，一位在歷史研究工作上擔任學徒的台灣人，竟然不清楚什麼是五四運動，竟然無知於何謂二二八事件。在台灣的俄國史教科書上，找不到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在中國現代史上找不到中共的成立及其思想背景。至於台灣史，則被置放在最偏遠的地方。

其次，我到海外後，便開始瞭望中國。最初，我深信釣魚台運動刊物的一些宣傳，也迷信毛澤東所說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在大中國沙文主義的蒙蔽下，我竟然以爲，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文化史上最偉大的精神改造。對於中國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雙面旗幟，我奉爲至高無上的思想象徵。從毛語錄、毛口號到毛式民謠，種種政治標語，佔據我很大的生活空間。

認識中國越深入，內心的恐懼感就越膨脹。當批林批孔運動發起之後，中國十億人口竟然都能有志一同討論孔子與儒家思想，並且還把這樣的討論與林彪的奪權銜接起來。我不能不深陷於迷惑，一個在黑龍江的工人小組，居然還可以解剖儒家思想體系，同時還藉此進行

政治上的權力鬥爭。整個龐大的中國，沸騰於各種震耳欲聾的噪音裡。當我的情緒冷卻下來時，我清晰看見，這樣喧鬧的中國，其實只是一個無聲的中國。響徹雲霄的政治口號，只不過是在反映中國大地的死寂。十億人口的頭腦，只接受一位獨裁者的指揮；十億張嘴巴，也只跟隨一位統治者在合唱。這種恐怖景象，常使我在夢中冒出冷汗。

赫胥黎在其科幻小說《美麗新世界》的扉頁就說，在過去，人類都積極追求烏托邦的實現；在未來，人類則必須努力避免使烏托邦誕生。他的意思是說，人類科技的進步，使得統治機器的結構更趨精密完備，甚至人民的言行與思考都可以受到監視與檢查。赫胥黎所說的話，其實不是預言，而是一個活生生的現實。中共統治者所構思的烏托邦，早已在中國的土壤上降臨。對於酷嗜權慾的獨裁者來說，一個充滿喜樂的人間天堂畢竟宣告誕生了。

面對這樣的中國，我自是感到幻滅，而回望我的台灣，內心也充滿了焦慮與痛苦。一個巨大的聲音在拷問我：國家是什麼？你的國家在那裡？那懸疑的問題，果真不斷鞭笞我、啃蝕我、咬噬我。

在美加邊境上，我遇到有生以來的第一場雪。望著那一座莊嚴的國門，我沉浸在一片苦悶之中。雪花一片一片落在美國與加拿大的國界線上，也沉默無聲落在我內心的曠野，我全身冰涼，僵立在茫茫的雪地。那座國門的上方鑲著幾個英文字：CHILDREN OF THE COMMON MOTHER（共同母親的孩子）。我知道，母親指的是英國，孩子則是指美加兩國。然而，我的母親是誰？我又是誰的孩子？朝著亞洲的方向佇望，我看不見什麼，也聽不

見什麼。

### 3

揣在我胸懷裡的，是台灣的形象，那是我僅存的希望。我懷念的台灣，不再是煙霧迷濛的咖啡屋，不再是流淌約翰·藍儂與巴布·狄倫的台北街頭，而毋寧是在歷史上受害、受創的島嶼。

整個六〇年代的末期與七〇年代初期，我關在自己的閣樓，進行精確的文字剖析。爲了一首現代詩，我可以廢寢忘食去咀嚼並反芻詩中的神秘世界。坐在台北的樓頭，俯望台北重慶南路與漢口街，我看到的是繁華中帶著雜亂的社會。我並不知道，就在重慶南路的不遠處，就是二二八事件時人群抗議的公賣局所在地。我更不知道，爲了這樣小小的社會，已有無數台灣知識份子，懷著理想死去。

七〇年代開始的草根性民主運動，其實並沒有搖醒我的天地。我仍然愚昧地揮汗翻閱中國古典的書籍，仍然專心在探索宋代中國王朝的興亡。在歷史工作上，我朝向中國；在文學工作上，我面向西方。在日常生活裡，我則浸淫在搖滾樂與鄉村歌曲。台灣，就這樣被監禁在我的思考之外。在台灣，經歷了各種挫折與愛恨；然而，存在於這種情感的深處，全然沒有絲毫台灣人格的影子。

我的台灣人格的浮現，是在自己的國格遭到嚴厲挑戰時才有的。直到我認真窺探島嶼歷



史之後，我才發現，過往的時代裡，我的先人就已在為塑造莊嚴的台灣人格而努力，而獻身，而流血。自十八世紀初期以降，就已出現許多可歌可泣的歷史人物，他們充滿了使命感，只不過是要奪回一些人的尊嚴。

遠在海外，我陸續續續獲知，原來與我同一時代的知識份子，早已涉入歷史的洪流。自二二八事件以後，多少暗暗的死，多少默默的失蹤，在社會的各個角落發生又消滅。在白色恐怖的震撼之下，沒有人敢於留下任何文字。倘然有所謂歷史記錄的話，那絕對不是人名與事蹟，而只是一些監獄的編號，一些擦拭不淨的血跡，以及一些模糊不清的容顏。台灣人的受害史，就是這樣寫成的。使歷史能夠銜接起來的，是刺刀的陰影，是鐵絲網的斷柱，是長廊中回響的手銬與腳鐐。但是，也就在刺刀、鐵絲網、手銬腳鐐的背面，我望見了台灣人民堅強的意志，還有那死而不滅的戰鬥精神。台灣人格的悲壯與雄偉，就在權力人物的蒙蔽與洗刷中，巍然站立起來。

使我徹底從知識的象牙塔覺醒過來，是一九七九年發生的美麗島事件。台灣民主運動揭示的公義與和平，都在這個事件裡鎮暴部隊發射的瓦斯彈硝煙中化為烏有。我熟識的作家、朋友與政治運動者，受到莫名的污讟、指控，並監禁。在淒厲的風聲中，最殘酷的、最難以讓我接受的消息，便是一位祖母與一對雙胞胎女孩的喪生。冷冷的匕首，狠狠劃過我的土地，也剖開了我自私的胸膛。汨汨的血液，自二二八事件的時代噴湧下來，無止無休，直到我的時代。

我想到的是魯迅寫下的詩句：「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我只能以僅有的勇氣，去正視那些刺刀、鐵絲網與手銬腳鐐。台灣人格倘然必須是經由如此痛苦的道路才能塑造，我想我不能再畏怯下去了。

## 4

台灣人格與台灣國格，成為我跨入中年前後的最大思考，不能解決這兩個問題，我的焦慮就不可能靜止。在十年前，我寫下第一篇政論開始，就覺悟到自己已不能站在政治運動的邊緣。我更覺悟到，一旦我捲入政治運動，我至少有十年不能返鄉。

我越來越覺得，政治不是生死的問題，而是牽涉到是非問題，以各種理由來搪塞而拒絕參與政治，那是生命本能的恐懼。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生死就不是最重要的事了。一個知識份子，在必須判斷是非時，就沒有權利可以保持沉默。

我只是不願保持沉默，所以我選擇了長遠曲折的道路。我走過的政治歷程，其實是洗滌我靈魂的一段過程。在緩慢的時光裡，讓我看穿了聲名、地位、酬庸。十五年的時間，足夠使我的過去次第埋葬。從前的我，畢竟已經沉澱，沉澱在我生命怒潮的底部。我既埋葬了它，我就不會再把它挖掘出來。

北美深夜殘存的星光，便是我這段歷程的見證。這次返台，我知道這是遠航的一個終

止，也將是另一次揚帆啓程的再出發。我已確認了後半生的方位，台灣的莊嚴人格與台灣的偉大國格，將是我無盡的追求。

一九八九年六月廿八日返台前夕 聖荷西

——《自由時代週刊》一九八九年七月二日

## 聚散

年輕時代的寫詩朋友，曾經聚集在龍族詩社的旗幟下；經過長久的別離之後，又會合在台北盆地的一個小小餐室裡。距離當初擬議組社的日子，整整有二十年。原班人馬相約見面時，詩社的名字早已煙消雲散，而共同的記憶也顯得支離破碎了。

辨識每一張面容，我彷彿在解讀一首繁複的詩。步入中年的這群詩人，有的髮上已是微霜初降，有的額前劃過時間的刀痕，當年意氣飛揚的神采，如今都化爲沉潛成熟的氣質。如果生命是一首詩的話，那麼最初的一首單純的詩，經過了改寫與重組，並且融入新的形式與技巧，最後就呈現了全新的面貌。個人的生命可能是如此，但詩社的命運似乎並不這樣發展。龍族詩社集結過七〇年代初期一群青年人的夢想，大家一起經營構築，自我期許要爲台灣新詩開闢全新的紀元。如今回想起來，那時所耗費的心血，也只是築起一座小小的墓室。

詩社成立於一九七〇年，正是台灣社會開始要進入轉折的時期。當時詩壇上被公認的幾



冊重要詩集都剛建構完成，這包括余光中的《在冷戰的年代》與洛夫的《外外集》等。如果要瞭解七〇年代以前台灣新詩發展的成績，大約可以在這幾冊詩集中找到一些答案。龍族詩社的結合，並非是由於社會變動的刺激而促成的，而是由於一群嗜詩的青年爲了相互切磋，並且也是爲了在精神上相互取暖而集結在一起。如果還有一些歷史使命感可言，那也只是對六〇年代的晦澀詩風的一種反動。

龍族詩社的命名，雖然帶有中華民族主義的色彩，但是對於當時的青年人來說，仍不甚瞭解民族主義之爲何物。要在這個命名上尋出一些莊嚴意義的話，也無非是從體制教育所獲知的「中國的光榮與屈辱」之類的概念。這種從龍的形象去推演出來的想像，乃是台灣書生長期受教的一個自然的反應，絕對不是在現實中所得到的具體經驗。因此，龍族這個名字，虛構的成分居多；既然那是虛構的，那麼企圖要在這個名上猜測這群年輕詩人的創作精神，必然是徒勞無功的了。

林煥彰、施善繼連袂來找我籌組詩社時，我內心懷有一種莫名的興奮。因爲，在大學時期我背誦那麼多苦澀的現代詩作品，固然是心悅誠服的，不過也有一些是出於虛榮的心理。當現代詩普遍遭到排斥咒詛之際，做爲文藝青年的我，竟然能夠甘之若飴，竟然有獨到的眼光去接受並欣賞，在朋輩之中，我自然成爲極爲稀有的動物。基於這樣的好奇心與虛榮心，我細讀了無數的新詩。恰恰也是讀過那麼多的作品，我也漸漸體會到現代詩人的虛偽與矯情。從大學三年級開始，我嘗試寫了一些詩評；透過這樣的自我訓練，我發現了晦澀作品的

部分真相。所謂真相，也無非是一些騙局，一些迷陣，一些障眼法而已。被引導如許之久，終於才瞭解有些道路是沒有出口的。這樣的覺悟，使我感到憤怒。後來我寫出的一些稍嫌苛責的評論，大多是屬於被激怒之後的產物。

我之欣然加入詩社，沒有其他更高的期許，只不過是希望糾集更多年輕朋友來揭露現代詩的真相罷了。如果這可以稱爲批判精神的話，我並非是詩社成員中唯一這樣想的人。龍族詩社的歷史影像若有值得懷念之處，大約就是因爲成員中都具備了批判的精神。

不過，龍族詩社的歷史影像，在今天似乎被過分膨脹了。冷靜回顧的話，龍族的地位之所以受到高估，主要是因爲它所處的時代背景。詩社誕生時，台灣在國際上正面臨政治與經濟的雙重打擊。在政治方面，台灣在國際上的日漸孤立，已是無可挽回的命運。那幾年中，降旗歸國的消息可謂不絕如縷。在經濟方面，台灣正遭逢戰後以來最大的石油危機的衝擊。對於台灣社會的發展，這無疑是一個歷史轉捩點。當台灣進入動盪的時期，從前許多公認爲永恆不變的信仰與價值，都紛紛在這段期間發生了動搖。龍族詩社成立於這個關鍵時期，自然就受到特別注意。

爲什麼詩社不會出現在六〇年代晚期，或七〇年代中期，而竟恰好與時代的轉捩點相互契合？這可能是一個歷史的偶然吧。因爲，詩社的成員大多在戰爭結束的前後出生，到了九七〇年時，他們的年齡正好都跨入了二、三十歲，這是思考開始臻於成熟的年齡。如果說，這樣的少壯詩人對於社會的脈動毫無感覺的話，是很不正確的。目睹台灣政治經濟逐漸

暴露病態現象時，年輕的心畢竟還是會產生憤怒的。只是那種憤怒是相當內斂的，從來沒有具體表現於行動之中。

我加入詩社時，剛服役結束歸來，並且開始研究宋代中國的歷史。在知識上，我朝向遙遠的中國；在經驗上，我自囚於學校的圍牆之內；因此我必須坦白承認，當時的台灣社會其實是被監禁在我的思考之外。或者可以說得更徹底一點，我的內心並未存在過台灣的現實。後來我總是自我調侃，我是不折不扣的「超現實主義者」。

「敲我們自己的鑼，打我們自己的鼓，舞我們自己的龍」，這段詩社宣言，是由施善繼寫下來的。每一位詩社成員都接受了這個宣言，而且引以為豪，都認為這是一種自我期許。現在仔細分析起來的話，這個宣言其實並沒有可以辨識的方向，而只不過是表現詩社要建立個性的一種企圖而已。然而，爲了這個小小的企圖，龍族詩社奮鬥了四年餘的時光。

倘然要評估詩社的功過，就只能侷限在批判精神方面來看。對於六〇年代以降的晦澀詩風，龍族內部曾經有過廣泛的討論。成員都堅持必須使用大衆化語言，以矯正現代詩運動所挾帶而來的虛浮風氣。這種批判，純粹是對現代詩的一種厭倦，而並不是要配合當時政治經濟的變化。龍族詩社後來出版的《現代詩評論專號》，可以說是對現代詩的一次徹底反省。如果龍族曾經達到一些成就的話，大概也就是帶動現代詩的批判而已。任何誇大龍族地位的評價，都是不切實際的。

現代詩曾經引導我走完少年時期，龍族詩社則是讓我成長並成熟的一個轉接站。在最徬徨的日子裡，詩社的聚會曾經使我克服精神上的苦悶。我在一九七四年離開台灣後，龍族詩社繼續發行了三期便宣告結束了。遠在海外，獲知龍族解散的消息時，我多少有些感傷。因爲，我知道，這樣的解散等於是埋葬我的少壯歲月；我更知道，有一天龍族的朋友重聚時，再也可能找回當初的面貌了。

在海外的最初幾年，我仍與林煥彰、施善繼維持書信往返。最後，就像沉沒在遠洋的漁船，我失去了消息。使我消失的原因，當然是由於我思想的轉變。現代詩的欺罔，曾經使我年少的心憤懣不已。我到異域之後，發現現代詩的騙局尙屬事小；我終於發現最大的欺罔，其實是存在於台灣的政治體制與教育體制。我的整個思想釀起的風暴，強烈襲擊了我的生命。詩固然不能拯救我，文學也不能拯救我，我接受過的一切價值觀念更不能拯救我。

我的再出發，是從埋名隱姓開始的。我毅然背叛了從前對詩的信仰，也背叛了所謂的國家認同。當我被視爲思想犯時，我已經涉入了很長一段時間的自我放逐了。只是我的背叛並沒有減低我對龍族詩社的懷念。在流亡挫折之際，有時也會拾起留在身邊的幾冊《龍族詩刊》，細讀與我一起成長的友件的詩作。那些作品自然是稚嫩的，史料的价值遠勝過文學的价值。我珍惜這些殘留的詩刊，至少那裡面還記錄了我與龍族的一些情誼，以及一些奮鬥掙扎的影子。

這份眷戀，隨著我流亡道路的拉長而加深。我常常假想，設若有一天龍族朋友重逢，會不會有人提議恢復詩刊？這樣的問題存在我心中已經很久了。直到龍族成員在台北盆地的一

個小小餐室聚會時，我才確知，亡逝的日子已經不再回來，復刊的事更是絕口不提，因為大家離開詩已經非常遙遠了。

圍坐在餐桌時，我仔細解讀每一張面容，就好像在捧讀一首剛剛完成的詩。在別離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故事發生；唯一相同的，便是大家都改變了對詩的看法。這些朋友中，真正還在寫詩的，恐怕只剩下林煥彰、施善繼與蕭蕭，其他的成員像辛牧、喬林、林佛兒、景翔、黃榮村已很少創作了。

那天的重聚，還有幾位缺席者，包括高信疆、陳伯豪、劉玲、林忠彥。縱然如此，對於這樣的相聚我還是充滿感激的。經過長達十五年的別離，每個人走過的道路已經非常分歧，有的走向左翼，有的中間偏左，有的堅持極右路線。即使大家嗜詩如昔，也絕對不可能有恢復詩社的念頭，因為意識形態就不可能把龍族拉攏在一起。正因為我知道意識形態是如此分歧，我才更加感激這樣的重逢。龍族詩社再也不會再有相聚的時候了吧。

龍族詩社的支離破碎，基本上是台灣社會尋找出路的一個反映。當歷史的塵埃尚未落定之際，許多曾經有過的結合，都注定要分裂的。動盪的社會，必然會改造每個人的命運。在改造的過程中，有些理想遭到埋葬，有些則還會再生。龍族詩社之成為墓室，應該是一個必然吧。

一九八九年七月廿五日晚上，我請每位出席者留下他們的簽名。這樣的儀式，當然是龍族詩社的告別式。我的內心是感傷的，但是，我接受這樣的事實。走出餐室時，台北的星光在街道的盡頭。

一九九〇年八月廿五日 聖荷西

——《新地文學》第四期，一九九〇年十月五日



## 歷史失憶症

時間激流的沖刷，苦旱苦雨的侵蝕，終於使蘇花公路上的其中一段通道被人遺忘了。這段遭人捨棄的荒徑，沿著山壁迤邐南行。斷崖、斷石、斷層切割了懸崖上的公路，也切割了曾經有過的輝煌歷史。然而，遺忘了的，並不意味就是不存在的；被野草掩沒的，也並不表示從此就消失了。我到達時，依然可以感知它莊嚴的、雄辯的存在。

七月五日，我與陳永興、黃明川、林惺嶽前往探訪宜蘭花蓮交界的海岸，同行的還有我的兒子宜謙。黃明川拍攝他的影片《從西部來的人》時，就是取景於這個山海會師的懸崖。在他的引領下，我們發現了一片全然陌生的天地。蒼芒早已佔據了斑駁的斷裂的路面，累累頑石從山腰直瀉而下，切斷舊有的公路，投入深不可測的海水。浩瀚的太平洋波濤，則以乘勝追擊之勢，憤然拍打著崖下的岩石。

我們穿過峭壁時，正值艷陽的下午。荒廢的、幽暗的岩洞。使我恍然感受到山的沉默，沉默得近乎絕情而冷酷。不過，使我感到更為薄情的，則是人類的健忘。這段通往清水斷崖的道路，在我童年時期就已是眾人議論的傳說。我曾在小小的心房釀造過一個願望，便是期盼有一天要親自探訪這段斷崖的究竟。我知道，這一條峭壁公路的魅力，不僅在於它狹窄的路面充滿了危疑驚險，而且在於它佔據了台灣最為動人的海岸。

先是山石崩塌，緊接著是風雨的襲擊，屬於蘇花公路最令人驚心動魄的通道果然就損毀了，迫使人們不能不放棄它。從宜蘭到花蓮的車輪，如今都奔馳於雙向通行的新路，再也沒有人記得這條懸崖公路的興亡。當我能夠實現幼年時代的心願時，我已經跨過中年。憧憬的、嚮往的野性公路，也變成了不堪問問的歷史。

佇立在傾斜的山巔，俯望慷慨無私的蔚藍海岸，彷彿覺得每一片湧起的浪，都是那麼專注而用心。滔滔的濤聲，似在歡呼，又在喟嘆。不絕的衝擊，陣陣打在我的胸臆，那是時間的力量，也是歷史的力量吧。在洗刷的過程中，一位台灣少年成長了，離鄉了，蒼老了，從前的許多壯志與願望也跟著淪亡了。就像這條公路的傾塌，我的心境也曾經發生過一場小小的興亡。

我對台灣的愛戀，是相當遲晚的了。這幾乎是戰後成長起來的一代的共同特徵：從小就被教育如何遠走他鄉，如何移情別戀。對於自己的土地，往往保持著一種傲慢的疏離感。在異鄉，我遇見太多這樣的台灣知識份子，他們有志於征服整個世界，卻未嘗關注過自己的家鄉。他們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卻不會做過台灣的全島旅行。天涯海角，對他們來說，反而

是接近的；腳下的土壤，則是遙遠的，無足眷顧的。

對於土地，既已如此薄情，那麼對於歷史就更加健忘了。我出生於一九四七年，一個可以紀念的年代。在人類史上，這是充滿了生機的一年。當歐戰與太平洋戰爭結束時，世界歷史的死亡時期也告一段落。地球的每一個角落都開始迎接生命的新紀元；復原的復原，重建的重建，戰後的嬰兒潮也就在這個時期適時誕生。嬰兒潮，在西方，稱為 Baby Boomer，在日本，叫做「團塊の世代」。二十世紀的人類，從來沒有一個時候像戰後初期那樣，見證一個欣欣向榮時代的到來。

台灣的一九四七年，卻是逆著世界史的潮流發展的。當東方與西方的社會都在期待新世代之際，台灣反而是面臨了大規模的屠殺。戴著祖國面具的軍隊，從北到南，展開了台灣史上前所未有的殺人滅口的行動。在紅色血泊與白色恐怖的巨網之下，當年的知識份子，暫且都毫無例外產生了畏懼感，從而對於他們所目擊的事實也不敢提起。這種逃避的行為，遠遠可以稱之為「歷史失憶症」，他們忽然不知如何議論自己所經歷的歷史。他們的沉默，遠遠超過蘇花公路上的山洞。淪亡的一代，屬於死寂、幽暗，不能辨識方向。

失語症的一代，並沒有把他們的歷史經驗傳給戰後的新生代。我出生時，就已經患了「歷史失憶症」。一個沒有歷史記憶的世代，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向他們的前行代學習。在漫長的記憶空白的歷史中，我自以為是屬於滿懷著幸福甜蜜的一代。我被牽引離開自己的土地，偏離自己的歷史軌跡，賤視自己的先人經驗。

當我知道如何回顧時，我已身在千里之外的他鄉。在一次圖書館的偶然探訪中，我窺見了泛黃的歷史的一頁。那些事實是陳舊的、不堪問問的，於我則是全新的天地。我驚駭於原來台灣歷史竟然是充滿如此可怖的經驗，在圖書館幽靜的角落，傳出我心井深處的呻吟與喘息。

我始驚醒，被淹沒的，並不表示就是消失，被遺忘的，也並不等於就是不存在。在我整個成長的歷史上，所謂新生，只不過是歷史的假面；所謂國家認同，原來是虛構的意識。我的心房，像極從山腰直奔而下的岩石，在一夜之間全然崩潰。

從那時起，我開始尋找台灣人的記憶。我痛切感到，台灣人是一個善於健忘的民族。歷史的失語症與失憶症，使台灣社會發生了斷層。走在被捨棄的懸崖公路上，這樣的感受特別強烈。我嘗試記取受教以來的每一個陷阱與叉路；時間過於久遠了，我並不完全能夠釐清。

然而，我知道，把毀壞了的記憶重新拾回，是困難的，卻是必須做的。

坐在頑石上，眺望整個太平洋的白浪迢迢向台灣奔來。最壯觀、最雄偉的浪，直撲我的心胸。我等待那蠻橫的一擊，徹底把我從失憶症裡催醒。

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 台北

——《自立晚報》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一日

## 國家傾塌的年代

太平洋戰爭期間，父親的國籍是日本人，戰爭結束後，他的國籍突然改變成中國人。從來沒有一個世代像他的那樣，全然不清楚自己是屬於戰勝國，還是戰敗國。在政權交替的縫隙中，父親的心情陷落於「降伏」與「光復」的漩渦裡。在日語裡，光復（*Kofuku*）與降伏（*Kotaku*）的發音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對於父親的那個世代來說，這兩個名詞所代表的意義是極其複雜的。

父親的年少歲月，可以說是與太平洋戰爭相始終，日本軍隊在中國與南洋戰場傳來捷報時，台灣都城市的街頭總是有學童被驅使去遊行慶祝。蒙蔽於皇民化運動下的台灣人，似乎也感染了一些勝利的氣氛。不久，前線便陸續傳來日軍節節敗退的消息，台灣社會也隨著籠罩在苦悶的陰影之下。一九四五年日本人宣告投降時，台灣人顯然也嚐到了戰敗的滋味。至少，台灣人的許多子弟在南洋、中國都分擔了失敗的責任，並且受到奚落、嘲弄與羞辱。

南京政府派遣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抵達台北接收時，宣佈十月廿五日是「光復節」。台灣人忽然從戰敗國的身分，一躍而成爲戰勝國。父親的那一世代的朋友，有不少人頗欣喜於這樣的轉變。他們心悅誠服地接受「國語教育」。這時候的國語，不再是戰敗國的日語，而是戰勝國的中國語。父親認真而熱心去學習新的國語，希望自己能夠上升成爲中國人。

然而，歡騰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多久。他們所受的待遇，竟然是屬於戰敗國的身分。父親發現，南京政府來到台灣完全是顯露征服者的姿態。行政長官公署領導下的貪污腐化尚且不論，那些公務員、教師、警察對待台灣人的態度，非常露骨地表現了無限的鄙夷與歧視。與日本殖民地政府的統治相較之下，國民黨還更加粗暴而野蠻。父親再也分不清什麼是光復與降伏，他那世代的屈辱與挫折，最後都總結於二二八事件的屠殺血泊之中。

如果，父親對日本統治懷有絲毫眷戀之情的話，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心境。我甚至還覺得，他無需爲了那份眷戀而感到歉疚，或有任何罪惡感。隨著年齡的成長，我才知道父親那世代的台灣人，有許多人根本沒有國家觀念。對他們來說，國家並不存在；即使存在的話，那也只是壓迫的機器而已。談到國家時，他們變得非常犬儒。特別是說到國號與國旗時，在他們眼裡，那簡直是猥褻的同義詞。聽到國歌時，他們總是帶著曖昧的笑容，彷彿聽到了一段不堪聞問的流言。

我一直不能理解他們的想法。直到我在海外開始回望台灣時，父親的心情似乎都轉嫁到我身上了。最初我能體會那樣的心情時，我感到極度惶恐，總是覺得自己的體內存放了不潔



的、背德的東西。曾經有過很長的一段時間，我的情緒相當不快。不久，我覺悟到必須去探求台灣歷史。在摸索中才漸漸發現，父親懷有那樣的心情是正常的，也是正確的。

我真正能夠為父親的立場設想時，我自己的國家認同也已經倒塌了。戰後以來，台灣人從來沒有嚐到光復的滋味，而毋寧是一種變相的降伏。在海外，對國家本質的認識，是非常刻骨銘心的。特別是聽到一些朋友的護照被取消的事情，我更深切感受到，國家是用來欺侮人民的。

所有依附於國家而衍生出來的光榮、偉大、壯烈、忠貞等等的字眼，看來是多麼可恥。有生以來第一次被拒絕取得回台簽證時，我不能不告訴自己，我是沒有國家的。國家是因為獲得人民的承認，才能證明它的存在；如今，卻是國家拒絕承認人民的存在。這種邏輯的顛倒錯亂，豈非自始就發生於台灣戰後的初期。在失去國籍的那個時刻，我才真正理解了父親世代所受屈辱與挫折的意義。

沒有國家觀念的人，並不等於是無政府主義者，在他們心裡，事實上對於國家有一種飢渴的欲望。他們所追求的國家，不是接受外在的灌輸；相反的，在其腦海深處早已存在著他們所構思的理想國。自父親以降的世代，台灣人始終堅定不懈地在做這種無盡的追求。爲了這樣的理想國，台灣人付出了血汗、青春與性命。

每到十月，總是有學童被驅使去遊行慶祝，無論慶祝的是國慶日或是光復節，都不能不使人聯想到太平洋戰爭期間的皇民化運動。激情、興奮的氣氛，曾經也一度瀰漫於島上的每

一角落。然而，皇民化運動終究還是失敗了，國家終於還是淪亡了。父親世代的悲愁，也遷延續到我的世代。我不相信，國家被拿來做爲迫害的工具能夠橫行多久。讓我相信的是，台灣人所經歷的屈辱與挫折，最後會有擦拭的一天。人的尊嚴回到島上時，台灣才會有真正的光復節吧。

——〈自立晚報〉一九九一年十月廿四日

## 青春的閘門

左營車站，是我青春的閘門，穿過欄柵，登上北行列車，歲月從此不再回頭。……

1

小小車站的月台，投射著飽滿的七月晨陽。我無語環顧這個車站，彷彿我從前未曾來過，彷彿這只是我迢遙旅途上的又一個驛站。我看見乘客坐著、站著、佇候著，一個比一個疏遠而淡漠，男的女的看來是如此陌生，那氣氛真的像是在遠方偶然路過的一個車站。但不是車站外的湖光山色卻又是我熟悉的，甚至微濕的空氣在接觸肌膚時，也是那般熟悉。這不是我的家鄉吧，這不會不是曾經使我發生過單戀、初戀、失戀的左營吧。

十八歲時，我也同樣站在這個小小車站的月台，豐饒的晨陽照射在我有著過分自信的臉頰。等待著從高雄出發的北上列車，我就要告別這囚禁我整個少年時代的小鎮。離開家鄉北

上求學，對我是—充滿挑戰的探險。許多心靈的憧憬與夢想，都寄託在這次北上的旅程。我要揮別的，是混亂、迷失、頹廢的青春時期。我並不知道北上的列車將引導我走向怎樣的世界，但能夠確知的是，我的生命就要跨入另一個階段；而這樣的階段，與我整個高中時代的迷惘與困惑將全然不同。我更加確信的是，再回到自己的家鄉時，我再也找不到青春期的情感與思維了。帶著一份揚眉的雄心，也帶著一份淡淡的感傷，我告別了我的十八歲，與那寧靜保守的左營。

那時的左營車站，仍然保存了日據時代遺留下來的木造建築，矮矮的屋簷、古樸的方格玻璃窗，還有那灰色泛白的屋瓦，都沾染了深邃無比的記憶。我愛極這個蒼老的車站，它沒有誇張的飛簷，沒有華麗的裝飾；但是它穩重謙遜的構造，卻成了我夢的殿堂。走過那低低的通道，我就可迎向遠方，經過這樣多年之後，我還是可以強烈感受到當時離鄉的心情。站在月台上，我眺望著消失在半屏山下的鐵道盡頭，道旁綿延的稻葉隨風搖動，好像高舉的手勢在揮舞。天地從來沒有那樣遼闊過，胸懷的志氣也從來沒有那樣崇高過。我耽溺於幻想著地平線另一端的世界。對於我沉淪了的青春日子，我不免投以輕蔑與鄙夷。左營車站，是我青春的閘門，穿過欄柵，登上北行的列車，歲月從此不再回頭。

2

那是怎樣的青春啊。



我又看到自己陷溺在一片光亮而又處處暗藏漩渦的激流；我不斷掙扎，朝著岸邊奮力泅泳，卻總是發現下沉比上升的時候還多。我也看到左營那小鎮像極一個囚房，時間消逝得緩慢且近乎凝滯。心靈上常常羅列著一排枷鎖，監禁我的思想，封閉我的情感。如果青春是屬於活潑、開朗、歡笑的歲月，那麼，那只是存在於他人的生命裡；至少在我的經驗，那反而是試煉、折磨、煎熬的歷程。

青春的歷程，始於我開始接近文學。也許可以倒過來說，我的文學歷程是與青春一起開始的。在隱喻、象徵、影射的文字裡，我嘗試探索學校圍牆以外的想像與現實。我伸出了觸鬚，窺秘似地去瞭解成人的世界。長篇小說與短篇故事所塑造出來的生命，使我嚮往，也使我畏懼。那是一個遼寬、飄渺的未知天地，多少巫魅與詭異在冥冥中引導。我蜷縮在自己的書房，出入於無數陌生的領土，依賴著文字所拼出的地圖。然後，好像害了病，開始出現一種未曾有過的焦慮與飢渴。我最初以為那只是一種短暫的症狀，至少，那只是無聲無息地襲來，又無言無語離去。漸漸的，那感覺像蛀蟲停留在體內，每到孤獨時刻就張口咬噬。有一天，我突然告訴自己，是不是我也長大人了？

成人就是一株病蟲害植物嗎？整個青春期都一直存在這樣的問題。隨著這個問題而來的，便是在腦際出現了混沌的、模糊狀態的意念，那大概是一種接近愛情之類的欲望吧，尤其是涉獵一些庸俗的愛情小說之後，那樣的欲望慢慢獲得確切的定義。我逐步擴充自己的感覺，先是翻譯小說，繼而新詩，只是我找不到出口。

是詩使我第一次感覺到情緒的淨化與昇華。在分行、斷句、節奏的藝術裡，我好像發現了另一塊精神版圖。早已忘記最初是怎樣接近詩的，依稀還記得在情緒緊繃於體內之際，自然就會捧讀詩作，在詩的意象與結構間做各種飛翔式的聯想。然而，詩的救贖力量是那樣微小，何況在那樣青澀的年齡，能夠理解詩的內容畢竟非常有限。

浩瀚的、巨大的欲望終於吞噬了我。帶著犯罪的心情，我開始對女性有了奇異的幻想。在淳樸、保守的小鎮，男女之防想來是多麼森嚴，彷彿有一道無形的鐵絲網相互隔離著。隔著禁區，我學會了窺伺、暗慕。體內不時有莫名的情緒在騷動，有時是斜風細雨，有時是驚濤駭浪；但無論如何，內心總是不能平靜。我強烈覺得自己流著的血液是那麼猙獰而邪惡，即使用盡辦法來壓抑、隱忍，仍然難以洗刷不潔的意念。

那無疑是濕霉不堪的日子，隔著毛玻璃凝視傾瀉不止的春雨，多麼希望沛然降落的雨水，也能流過我的血管，把雜亂斑駁的欲望一併沖走。一切的努力都歸於惘然，沒有什麼可以拯救我。在一個春夜，伴隨著驟雨的喧嘩，我頓然瞭解了什麼是自瀆，什麼是性，什麼是沉淪之愛。奧秘的夜，化為一片舌頭，舔拭了我一身的冷汗。我好像經歷了一場噩夢，夜夜都在逃亡，與其說我的內心是一盆爐火，倒不如說是一座冰窖還來得恰當。我不能不感到血液是凍結著的，當背德的欲望暗自升起時。

有一匹看不見的獸在追趕，越過漫長的曠野，躍過峭陡的深淵，我不止不休向前奔跑。那匹獸，可以命名為恐懼，也可以命名為罪惡。每當那追逐告一段落，喘息未定之餘，便有

嚴厲的苛責從胸中的谷底汨汨冒出。我躲在暗室的一角，雙手蒙臉，畏光、畏寒、畏罪。黑夜何其遲緩，我等待著所有的汗都在蒸發，等待著盤踞在腦海的噩夢能自動撤走。

在自瀆與救贖之間，我的意志是一條拉得緊緊的繩索。我深怕那意志會突然斷裂，跌入狂亂的遐思之中。我繼續搜尋文學作品，如果嗜詩的習慣後來會變成我生命的一部分，那麼最初的出發大概是從這段迷失的時期開始的吧。我嘗試使用各種方式來拯救自己，讓體內的原始衝動能夠降低到最平靜的狀態；而讀詩是其中一條管道，是急湍中偶然湧現一塊浮木，我緊緊抓住，企圖使自己不致滅頂。那當然是極其可笑的自我拯救方式，可笑得不曾產生絲毫扶持的力量。我只不過是冀求在腐蝕的日子裡尋找一些希望的光與影。

## 3

動搖了的心，就這樣在生活中浮浮沉沉。青春，果然是一株患了病蟲害的植物嗎？下降的心靈，依舊持續下降。我的生理與心理，依舊沒有一天健全過。殘缺的生命，構成了青春期的風景。我慢慢荒廢學校的課業，我的死滅是我的存在。徬徨、猶豫、怔忡，寫滿了我的胸臆。那是多麼令人窒息的時光，我強烈渴望有人伸出援手，協助我回到原來完整的自我。

終於，從遠方傳來了關切的聲音，一九六四年，我高二下學期，開始與一位從未謀面的女學生通信。苦悶的日子有了變化，我突然振作起來。在來往的信箋中，我討論著有限的文學知識，使用著生澀的語言討論詩的創造，甚至還很哲學地討論生命。那時還未滿十八歲

啊，蹲坐在幽暗井底的我，似乎發現了一絲光芒。循著那光，我找到了出口。

她住在豐原，暑假過後，就要北上讀銘傳商專。在她纖秀的筆跡裡，我揣想著她居住的小鎮。豐原，我是知道的，縱貫鐵路進入山區之前的一個山城。那曾是我小徑路過的車站，如今卻對我的情感產生了意義。我想像著，從火車窗口看到那山城櫛比的紅磚灰瓦，看到鐵路兩旁的彎曲田埂小道，也好像看到她騎車迎風穿過樹林。我揣測著，她有密密的黑髮，短短的，六〇年代流行的赫本式頭髮。她也愛好文學，所以我寧可設想她有一顆開朗的心，友善、愛笑、親切。這些都描繪在我的沉思中，並且也都寫進信箋寄給了她。

時間是在等待中逝去的。我等待她長長的信，等待她細說自己的夢想與抱負。隨著連續不斷的對談，她寄來了相片。她真的如我預期的，有著赫本式的髮型，也有著明媚照人的笑容。對於自己有如此精確的猜測，我反而感到訝異。我自然是喜悅的，許多平面的文字，竟然都化成立體的、可觸的具象。有什麼還有比這樣的感受更能衝擊我？生命隱然流淌著顫慄的旋律，有輕微的歌聲在脈搏中躍動；如果那就是世人所傳說的初戀，我確實是全心接納了那樣的感覺。

「我要給你電話，感到驚奇嗎？」在一封信裡，她在最後附了這樣的問題。在那樣的年代，長途電話是極其嚴肅而嚴重的事。我相信她也同樣對我深深期待著，期待能聽到我的聲音。日子越來越接近約定的通話時間，我變得惴惴不安，彷彿等待一場審判。我以為會與她說許多話，把壓抑在內心裡秘密都釋放出來。但是，從鈴聲響起，到電話掛上，我居然說



不出多少話。電話的另一端，也傳來沉默的寧靜。我很著急，她也焦慮著；一場等待已久的長途電話，就在彼此的緊張情緒中燃燒淨盡。事後，兩人趕快寫信致歉，雖說是原諒對方，其實是寬恕自己，也恰恰是經歷這樣無語的對話，兩顆惶惑的心靈似乎要比以前更加靠近了。

“All for the Love of a Girl”，這樣一首歌，讓我從盛夏唱到晚秋。那時，我也學習聆聽西洋歌曲，也全力去蒐集熱門音樂的唱片。在信裡，我告訴她一些歌手的音色與風格，以及歌聲所引發我產生的情緒回應。我第一次體會到，青春不是病蟲害植物，而是晴空萬里的藍天。再也沒有什麼可以使我憂愁的了。望著白雲劃過長空，雀鳥低飛過稻田，我不再無端傷感。我確信，自己已經向那位容易受傷的少年揮別了。

一九六四年冬天，距離考大學僅剩半年，我決定到台北與她見面。涼風微微從半屏山那邊襲來，我坐在靜靜的蓮池潭邊凝望。漣漪起伏的潭水彷彿是在告訴我，幸福就暗藏在山的另一邊。我也在內心告訴自己，多情的台北盆地想必也張臂迎接著我。秋季消失得特別緩慢，冬天也移動得似乎停滯。直到有一天寒假終於來了，這是動身啓程的時刻。

站在左營車站的月台上，我懷著豐碩的心情等待北上的列車。青春歲月，應該是像那孔武有力的蒸汽機車，無畏地、雄辯地向前奔馳。坐在車廂裡，我發現火車的速度竟然與我的心跳成正比。車子經過豐原時，我特地利用停站的短暫時間在月台上走了一趟，證明到了我心儀少女的家鄉。暮靄的山城，處處飄著炊煙，如此安詳的景象，使我加倍愛戀著這個小

鎮。如果她還住在這裡，我深信，她家屋頂的炊煙一定會向我招手。

到達台北的第二天夜晚，我在約定的公園入口處與她見面。遠遠看見她走過低垂的樹枝下。她走得從容而自信，與我原先預期她會向我飛奔而來，完全兩樣。我確定那就是她的身影，縱然這是通信將近一年來的第一次見面。我細緻地觀賞她的姿態，那是我生命中的女子，是攜我走過多少苦悶日子的甜美少女。我以無比的感動看她向我走來，血裡滲透著紅色、藍色的頌歌。她果然是帶著微笑走來，落落大方，不同於家鄉的女子。

我緊緊握住她的手，這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觸撫到異性的肌膚。溫熱的、滑膩的纖手，悠然掀開我生命中的新的一頁。我想我是尋到了完整的自己，無數殘缺的時光都在見面的剎那獲得補償。我知道她知道我的心情，我確信她確信這是兩人共同的信約。

然而，她握了手，便立刻抽走，若無其事地。我愕然站在那裡，許多預備好的語言，我悉數壓抑在喉底。她說：「這樣的見面，真好。但是，我們不要再見面了。」我更駭異，久久說不出話。彷彿有一顆巨大的殞星，狠狠墜落在我的胸坎。那樣多的期待，那樣深切的關懷，頓然化為虛無。她靜靜地，並且帶著微笑：「我應該先告訴你的，在你北上之前，我已有了男友，他是醫學院的學生。」她的語氣，似乎特別強調醫學院。經過那樣漫長的期盼，經過那樣長途的旅行，我得到的答案竟然是如此寒冷的宣判。只是無法讓我想像的，她以笑容說出了她的欺罔與冷酷。我從未預見到，幸福竟是這般屈辱而殘忍，竟是這般的血肉模糊。



我已不曾記得是如何與她告別的，猶如我不知道是如何離開台北的。唯一留在印象裡最深刻的，便是南下經過豐原時，我掩面啜泣，不敢張望。青春，不再是無畏而雄辯，而應當是屬於墮落、腐蝕的生命。曾經以為已經重拾了健康的體魄，現在才了然那只不過是幻覺與錯覺。顛覆地回到了左營，我再次淪落在畏光、畏寒、畏罪的日子。

冬雨悽慘降下，擊打在毛玻璃上的聲音，暗帶了一股嘲弄。寒風在窗外猖獗吹過，傳送隱隱的訕笑。緊鎖在房間裡，我變成了沒有語言、沒有思想的生物。我是蟄伏在陰暗角落的變形蟲，毫無知覺地啃食自己的骨肉。蒼白的、病態的十七歲，遺留下千瘡百孔的記憶。

## 4

在海外流亡十餘年後，第一次回到左營，我已然過了中年。打開那年蜷曲抱首的房間，一種強烈的傷痛轟然襲擊了我。坐在床邊，我沉浸於砒霜敷在傷口那般的回憶中。

一九六五年春天來了以後，我以整整四個月的時間，溫習了高中三年全部的課業。每天清晨，天還未亮，雞鳴便催醒了我。起床、梳洗、開窗，我很快站在陽台上，困頓地記誦英文造句時，我可以看到巍峨的大武山頂峰的稜線。那是中央山脈的餘波，通過了大武山群，崢嶸的山巒便在南台灣平息下來。太陽從東岸升起，把大武山壯碩、穩重的身影染成一片墨藍。等到第一絲陽光投射在嘉南平原，那高聳的山嶺便全然隱身了。在大學聯考前，我的日子便是這樣開始的。

我不清楚自己為什麼會突然振作起來？在家裡被認為是一位敗北的、無藥可救的少年，一夜之間擺脫了閉鎖的心靈，那毋寧是一種奇蹟。事實上，我是在逃避那創傷事件。如果繼續囚禁在死寂的暗室，我就必須面對自己，必須單獨承擔傷口的全部痛楚；而那不是我的年齡所能勝任的。那年的唯一解脫之道，便是強迫自己投入枯燥的課業背誦裡。如果那也能視為救贖，現在回想起來，其實只不過是錯誤的安排。命運的跡線，是多麼不容解釋。

中年的我，靜坐在青春年代的房間裡。那書桌，那木椅，以及那抽屜裡的課本，都埋藏著曾經有過的掙扎與試煉。無情的時光，攜走了無數不可思議的人與事，卻為我留下清晰的苦與痛。我不敢去推想，設若當年我容許自己沉淪下去，容許自己接受挫敗的事實，容許自己任憑內心的蛀蟲咬噬撕裂，……我真的不敢去推想。

一九六五年夏天，正滿十八歲，我被錄取於北部的大學。提著行囊，我穿過左營車站低矮的屋簷，望著從高雄出發的北上列車緩緩進站。我向送行的父母揮手告別，頻頻回首。看見車站外的馬路上，我年少的身影好像也在那刻走過。熱淚湧上我的眼睛，我知道，甜美的、戕害的時光就要消逝。我追悼的是，一顆脆弱、淒苦的年少生命。穿過車站的欄柵，登上北行的列車，青春的關門從此不再為我開啓。

——《自立晚報》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二日、十三日

第2輯  
葳蕤

門口，會感到一種莫名的恐懼，彷彿我不知該往何處飛去，像一隻在印泥中

飛舞的蝴蝶，在黑暗中，尋找著那一點光亮，那一點光亮，是那扇窗，是那

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

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

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

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

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

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

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

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

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

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

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

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

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扇窗，是那

## 江湖十年，孤燈一盞 ——我所認識的彭明敏先生

### 一位性情中人

彭明敏先生拒絕返台的消息傳來時，對我產生極大的衝擊。我所認識的彭明敏，不是在掌聲中受到喝采的政治人物，也不是孤立於書齋裡的學術工作者，而是充滿情感的知識份子。他是我到海外後最早的政治意識啓蒙者，多年來我總覺得與他維持一份無可言喻的情誼，那種情誼介於師友之間。每次與他見面都很短暫，但是他的言行都對我有一些啓示作用。

我頗知他的望鄉心情非常急切，對於台灣發生的事情，瞭若指掌。我也知道他一直在等待回鄉的恰當時機。像他這樣的性情中人，在聽到能夠回台的消息時，絕對不可能無動於衷。長年的離鄉背井，必定對故土產生一種焦渴，甚至是一種焦慮的情緒。時間拉得越長，

孤燈  
一盞



家鄉的誘惑力就越強烈，而他的抵抗力也就會越脆弱。

對於這次拒絕回鄉，我不相信他沒有在內心掙扎過。他回到台灣，並不是要接受英雄式的歡呼，而只不過是想瞭解台灣社會的變化。在情感上，他自然也需故鄉溫情的滋潤，就像乾旱千里的田野，需要一場甘霖的降臨。

然而，他終於還是拒絕回來。這種以理智與意志來克服脆弱心情的行動，絕非常人能夠做到。在人格尊嚴與感情解放之間，他必須做一抉擇。當他受到國是會議的邀請時，這可能是二十年來流亡中能夠返鄉的最佳時機；一方面他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提出他長年孕育的政治理念，一方面又可以在心靈上得到慰藉。對於任何一位受到放逐的政治運動者，他不會錯過這樣的機會。然而，就在各方矚目之際，他反而提出一個冷靜的問題：這次回去是否能對台灣民主化做出實質的貢獻？

這種自我審問，避開國民黨對他通緝的事實，把回鄉的問題提升到更高的層次，無疑是一種感情的淨化過濾。他的行動既抗議了一個不義體制，又維護了一己的人格，這樣的境界非常不容易達到。如果是尋常人士遇到類似的情況，恐怕已表現出憤懣之情。

### 一九七五年的初識

我是在一九七四年到達西雅圖的。那時海外政治運動的三分天下已大致底定，亦即親國民黨的革新保台派、親中共的統一派，以及主張自主自立的台獨運動。我初到海外，仍然是

一個文藝青年，完全無知於台灣的社會現實。但是，在讀過一些雜誌與書籍之後，我的國家認同開始發生動搖，從而三十歲以前所建立起來的價值也開始瓦解。就在那時候，我第一次認識了彭明敏先生。

對於他的名字，我自是熟悉的。在我最初接觸的政治文學中，他所寫的英文書籍《自由的滋味》，是使我感動的讀物之一。在那以前，我對台灣充滿了鄙夷，甚至有過一段時間，我還會拒絕說我自己的母語。我不敢承認自己是台灣人，我血管所流的台灣人的血液也使我感到自卑。彭先生的書，第一次讓我拾回台灣人的信心。讀過了他的書，我希望能夠與他認識。

一九七五年初冬，他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演講。介紹我與他認識的是鄭紹良。鄭當時甫卸任台灣獨立聯盟主席的職務，回到華大完成他的博士論文。鄭是海外台灣政治運動中，少數對文學具有高度興趣的領導者。他常常到我打工的圖書館閱讀，我們成爲摯交，到今天我仍然以兄長之禮待他。彭先生在那時候希望多瞭解年輕一代的想法，因此鄭爲我引見。

回想那時要與彭先生秘密見面，現在頗覺可笑，但在一九七五年卻是一件嚴重的事。鄭安排在一位同鄉的住宅見面，爲了保護我日後返台的安全，我們約定這次是秘密的聚會，只由我與彭先生單獨會談。彭先生由鄭驅車前往，我則乘坐公共汽車，經過兩次轉車才到達這位特定同鄉的家。這種曲折的安排，無非反映了當年白色恐怖之一斑。

彭先生準時抵達，他看來是多麼莊重儒雅。我注意到他的左手袖子放在口袋裡。他在回

憶錄裡提過，在戰爭期間留學日本長崎，在一次炸彈爆炸時失去了左臂。如果初識的人沒讀過他的書，恐怕不會察覺到他的左手有問題。

從對談裡，可以感覺到他的急切想知道台灣的近況。他是一九七〇年逃離台灣的，所以我和他見面時，距離他最初的逃亡才只五年。他所關切的並非只停留於政治層面，他對我的所學，以及我所從事的文學工作，也表示很大的興趣。我仍記得他問我是否要回到台灣，我說是的。他又問我如果回到台灣最想做什麼？我說辦一份文學刊物。於是，我們討論了設想中文學雜誌的內容與方向，最後還想到要為雜誌命名。我說，文學刊物的命名若含有「台灣」字眼，一定會受到官方嫉視。他提醒我，做事不必那麼教條，只要命名為「新文學」即可。在那次談話中，我發現到他的性格是開朗的，他的思考是靈活的。

雖是第一次見面，我內心就已感知他蘊藏的熱情。後來他又前往西雅圖好幾次，每次都不忘與我聯繫見面，足證他對待年輕人是鄭重其事的。到今天，我仍然沒有忘記他提議的「新文學」刊物。如果有一天我有足夠能力創辦一份刊物的話，我想我還是會以彭先生的建議來命名。

### 一位自由主義者

彭先生是一位徹底的自由主義者。瞭解他越深，就越能感受到他對一切束縛、羈絆的厭惡。他反對政府對人民的干預，他反對制度化的思考方式。這種自由主義的精神，見諸於他的文字，也行諸於他的實踐。

自由主義傳統在台灣的存續，一直是曲折而艱難的。在極權政治體制的指導下，台灣知識份子大多聽命於思想鞭子的指揮。但是，在高壓下的社會底層，卻始終存在著一股反抗的力量。這股力量在知識分子中的延續，便是自由主義精神的浮現。早期的《自由中國》與《公論報》，分別代表了大陸籍與台灣本土讀書人的反對據點，經過六〇年代《文星》的出現，兩股省籍不同的力量逐漸整合起來。彭明敏便是在這個時期，融入了雷震與李萬居所建立起來的自由主義傳統；他與李敖的訂交，也是在這段時期開始的。

從雷震、殷海光的政治遭遇，就可預知彭明敏、李敖等自由主義者在日後的命運。這些來龍去脈，彭先生在《自由的滋味》裡有著清晰的交代。如果他沒有寫出這本書，後人恐怕難以理解台灣知識份子在六〇年代的奮鬥情況。《自由的滋味》雖是個人的回憶，但它其實是整個時代的記錄。可惜的是，當時這本書是以英文寫成，而且又只在海外流傳，對台灣本土並沒有產生直接的衝擊。

我一直有個心願要把這本書翻譯成漢文，但苦無機會著手進行。一九八〇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許信良力邀我加入《美麗島》在海外復刊的行列。經過一番掙扎與考慮之後，我決定南下洛杉磯辦報。當時，我的心情極為沉重，不過，我認為台灣陷於一片寂靜之際，在海外的關心者應該發出聲音。做為一位手無寸鐵的書生，我能夠做的，便是以文字介入政治運動。這樣的決定，我知道，將改變此後我的思考方式，我的學術生涯也將告一段落。



就在主編《美麗島》期間，我決定把《自由的滋味》譯出連載。做這項翻譯的是，我的內人瑞穗。每次她譯成之後，我稍作修改。後來，《自由的滋味》以專書出版時，彭先生在序中提到此書的翻譯，是由「陳仲林」鼓勵促成，由「林美惠」執筆翻譯，指的便是我與內人。陳仲林，是我在洛杉磯時期使用的諸多筆名之一；而林美惠，也是內人臨時取名的。

正如我所預期的，《自由的滋味》開始連載之後，就立刻在海外產生回應。不過，這並不意味翻譯的工作很順利，因為在雜誌社內部仍然有聲音反對連載。這種反對聲音，牽涉到海外政治運動的派系恩怨，也關聯到政治主張與理念的分歧。反對者站在「革命」的立場，認為彭先生的自由主義色彩，是妥協的，甚至是「反革命」的。這種意見，非常能夠反映高雄美麗島事件後海外台灣人的心情。在很大的程度上，海外台灣人反抗國民黨的情緒極其高漲，「革命」的語言頗受歡迎。在這種氣氛下，《自由的滋味》的翻譯工作幾乎受到中斷。

但是，我認為必須繼續連載。因為，每一時期每一階段的政治背景是不同的，從而反對運動所表現出來的性格也是不同的。彭先生所處的時空，全然不同於一九八〇年代的政治氣候。他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時，正是國民黨在台統治的極盛時期。任何有關政治改革的主張，即使是最溫和的要求，都有可能受到逮捕、監禁。這與海闊天空的八〇年代海外政治運動，不可同日而語。以後來出現的客觀環境為標準來批判前人，絕對是不公平的。

台灣反對運動的傳統之所以沒有建立起來，往往是因為每位運動者都自認是歷史的開創者。所有的歷史，都必須從每位批判者的身上重新出發。這種切割歷史、斷裂歷史的運動方

式，乃是反對力量不能累積、不能成長的最大原因。我重視的是歷史的傳承與力量的延續，我也認為早期先驅者的經驗對後人是有幫助的。因此，在爭辯中，我仍然堅持把《自由的滋味》譯載完畢。

### 孤獨而堅強的靈魂

在洛杉磯時，也常有機會與彭先生見面。到現在，我仍覺得他是一位重視感情的人。在表面上，他看來冷靜、孤傲，但是他的內心是熱切的。

一九八二年春天，他曾經來我公寓的家過夜。第二天早上，我們坐在餐桌前談話，陽光靜靜照在他的臉上，他述說十餘年來流亡的一些心情。他說，住在堪薩斯州的那段時期，常常必須一個人單獨解決起伏的情緒，克服脆弱的心靈。每當苦悶時，他總是驅車到湖邊，獨自坐在車裡面對廣漠的天地。他那樣說時，神情黯然。

在群眾面前，他的形象是堅強的；但是，很多人都遺忘他也是血肉之軀。群眾對他的要求是勇往直前，是無可動搖的，卻從未考慮到他也有受傷的心靈，更有家思與鄉思。在回憶錄裡，他提到要逃離台灣的前夜，並沒有向家人告別，而只是為自己的兒子與女兒量身高，以便日後能夠揣摩他們生長的情況。每次讀到這裡，我總有一陣刺痛感，經過那次談話，我第一次發現自己是多麼接近他的心靈。

另一次使我感到難忘的場合，便是一九八三年夏天，他的兒子從台灣來美與他相見。這



是一九七〇年他離家後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孩子，那種複雜的心情，自非外人所能想像。經過長久的別離，孩子已不是他當年量過身高的孩子，客觀環境也完全兩樣。在一次台灣同鄉的歡迎會上，我看到彭先生以凝注的眼神望向他兒子。這次相聚的背後，想必蘊藏了多少心酸。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節制重逢時的憂喜情緒，我只知他的望鄉之情未嘗稍減。

離開洛杉磯以後，我與彭先生的聯絡變得斷斷續續。不久，他從隱居的奧勒崗州前往華府擔任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會長，學者型的彭先生，自然不適合錯綜複雜的海外政治環境。在派系糾纏中，他的苦悶更加深沉了。在擔任會長三年之後，我就聽到他辭職的消息。那時，我似乎預見此後的彭先生會更加沉默了。

今年三月，我聽說他公開支持李登輝先生出任總統，頗覺訝異。我所訝異者，是做為一位自由主義者，應該與權力人物保持距離，在台灣還沒有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體制之前，由任何人來擔任總統都是一樣的。所以，聽到他的公開聲明，我內心懷疑他不是動搖了早期的信念。他畢竟是我政治意識的最早啓蒙者，在反對不公不義體制的立場上，他曾經引導過我。

可是到了六月，他卻又公開拒絕國是會議的邀請，我才發現，我對他的懷疑是錯誤的，他仍然堅守著原則。我當然也能夠體會到他的矛盾衝突，他長年的望鄉，便是一直在等待回鄉的時機，可是他又不能在損害個人尊嚴的情況下，來換取心靈上的慰藉。在流亡二十年後，他情感的掙扎，思考的對決，必定非常激烈。他最後還是選擇留在海外，留在最偏遠的

異鄉。

《自由的滋味》出版時，我曾經為這本書寫了如下的字句：「他從學院投入社會，又從台灣流亡海外，這一條曲折的軌跡，是個人生命的擴張，也是鄉土歷史的縮影。」如今，我依舊相信，他的心路歷程，仍然是台灣命運的頓挫過程。當年與他一起流亡的人士，已陸續回到台灣，他還是獨自承擔最孤獨的天地，仍然反芻最苦澀的滋味。二十年江湖，並沒有摧折了他。寫下這篇懷念他的文字時，我正重拾故土的溫情。想起我對他有過的苛責，內心益覺不安。我遙望天涯，恍惚見到一盞孤燈，兀自燃燒……

——《台灣春秋》一九九〇年八月號

## 曾經發生在洛杉磯

——與許信良在《美麗島週報》時期

那個年代，彷彿兵馬倥傯，彷彿遙不可測，彷彿整個歷史都無法挽回。隔著海岸，傳來許多逮捕的消息，包括了熟識的、未識的朋友。然後又傳來了駭人的血案，政治肅殺的氣氛籠罩島上的人心。然後是台灣陷落在出奇的死寂之中，可敬的心靈與高貴的思想都被監禁在高牆鐵窗裡。那是一九七九年冬天與一九八〇年春天交會的時刻，如果這個世界還有所謂絕望的話，那個年代的心情與感覺，大約就屬於那種狀態。

也就在那無可拯救的年代裡，有一群人凝聚共同的意志，從北美的陽光城市發出聲音，朝向海上的孤島回應。那股聲音自然是衰弱的，好像是對著星羅棋布的夜空拍出血號，希冀能夠從某一個星球傳來對答。可能台灣的歷史已全部輸掉了，但是，在異域結合起來的意志，只不過是想證明台灣並不會死去。總有一天，島上的某一個角落會回覆信號吧。在洛杉磯出版的《美麗島週報》，便是憑藉共同意志，在地球另一端所發出的聲音。

歷史其實並沒有輸掉，台灣也並沒有歸於死寂。十年之後，島嶼的命運終於又開始翻新了。現在回望洛杉磯時期的日子，忍不住有無盡的喟嘆。我常常想起黑澤明所拍攝的電影《紅鬍子》。在影片裡，我感動於一群農婦對著生命呼喚的鏡頭。有一位窮苦人家的小孩，因吞食老鼠藥而生命瀕臨危急時，鄰居的婦人都對著深邃的水井呼喊。日本人似乎相信，水井是銜接了地獄的道路；只要不斷俯向井底吶喊死者的名字，那麼走在通往冥間道路上的迷失靈魂就會被催醒。在黑澤明的電影裡，那位昏厥的小孩，終於被喚醒了。那是不是因為他的名字受到叫喊的結果？恐怕沒有人敢於斷言。不過，集體意志所凝結起來的力量，想必是相當巨大的吧。

在一九七九年冬天發生的大逮捕之後，天涯海角的台灣人傳出了無數吶喊的聲音。《美麗島週報》也在那段時期參加呼喚的行列，對著茫茫的海洋，對著歷史的深井。沒有人能夠測知，這樣的聲音是不是發生了作用？然而，台灣的微細一線命運畢竟又出現了生機，那麼緩慢，卻又那麼篤定。我無法避免這樣去聯想，在北美的一個陽光城市，我們像極停留在宇宙中流亡的行星上，朝著自己的母土傳送信息。在廣漠無邊的天地，最後傳回了一絲光，一聲信號，從沉淪的、寂靜的故鄉。在時代轉折的關口，我開始學習如何與台灣對話。漸漸見證了台灣從昏迷中甦醒，從絕望中尋回力量，我內心不禁翻滾著一股怒濤似的興奮。

這樣的記憶，在生命旅程裡是一個難以磨滅的烙印；而這個烙印，與許信良的名字是無法分割的。



第一次見到許信良時，美麗島事件才發生過不久。他到華盛頓大學的校園演講，解說台灣民主運動的崛起與頓挫。他的見解、論點與策略，全然不同於在海外從事政治運動的領導者。我從來沒有預料過，在那次見面後，我會南下洛杉磯與他一起辦報。那時，眼見許多知識份子陸續入獄，我如果還自私地關在校園裡讀書，我會感到很可恥。對於那些未曾謀識的落難者，我尚且懷著低沉的情緒，則許信良在那時候的心情，顯然還更加挫折。那些被迫入獄的運動者，曾經都是他並肩作戰的夥伴。他自然比任何人還更能體會什麼是切膚之痛，什麼是共同命運的連帶感。

許信良是屬於運動型的政治人物。他有觀點、有視野、有策略、有理論基礎；即使在最為艱難的條件下，他總是能夠保持活潑的運動觀。我到達洛杉磯時，是在一九八〇年初夏。許信良已經集合了一群海外的運動者，包括了左翼與右翼路線者。這是一群近乎激情的理想主義者，只是爲了受難中的島嶼，從北美各地來到洛杉磯集合。

對於初次涉入政治的我，這次經驗是很新鮮的。從前耽溺於學術研究的思考方式，顯然與政治運動的思考扞格不入。處在這樣的環境裡，我必須徹底改造過去許多思考上的脾性。在改造過程中，許信良的一些論點往往能夠啓發我。他與傳統書生最大不同的地方，便是他把政治、經濟、社會當做動態的有機體。當他分析時，完全不做平面的、局部的、靜態的考量；而毋寧是立體的、全面的、動態的解剖。傳統的觀察者，喜歡引經據典，喜歡闊談原則，喜歡把一種事件約縮成一個簡單的原理。他們抱持冷靜的，甚至是冷酷的客觀態度，好

整以暇地進行從容的狹隘格局的研究。知識分子討論「運動」或「革命」時，都停留在文字層面上的意義。如果好不容易寫成一篇批判性、激烈性的文章，就覺得是完成了一次革命。在接觸了許信良後，這種讓我習以爲常的「沙龍革命」，立刻就被顛覆了。我第一次以專注的心情觀察台灣政治發展，可以說始自洛杉磯《美麗島週報》的時期。教條的、學術性的迂腐觀點，我次第予以捨棄。當自己的思想開始進行改造時，過去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以及情感態度，也跟著發生巨大的變化。

週報創刊初期，每位成員都充滿了悲憤。我從來沒有想到，海外台灣知識份子對故鄉政治的關切，是如此保持高度熱情。我更沒想到，留學生投入政治運動的力量，超過想像中的人數還要多。面對這種蓬勃的景象，我深深相信台灣是不可能死去的，每位參與者身上所放射出來的熱力，似乎意味著島嶼生命的脈搏仍然跳動得非常劇烈。具備了這種旺盛的信心，我益加覺得自己選擇南遷洛杉磯的決定是正確的。

然而，週報內部的相互傷害，也不是沒有發生。許信良結合左、右翼運動者的企圖，事實上是他嘗試建立海外聯合陣線的一種努力。不過，他似乎過高估計了海外政治運動的力量。當左、右翼路線都還未具備實力時，當每位運動者都還沒有建立健全的策略觀點時，聯合陣線是很難營造起來的。果然就在報紙創辦不久，矛盾衝突便相繼浮現。就像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政治團體那樣，在內部意見產生分歧時，沒有人具備足夠的能力從事溝通與協調。緊跟著彼此鬥爭之後，政治團體最後都不能不宣告分裂。《美麗島週報》之所以重蹈了歷史



覆轍，乃是海外政治體質的一個反射。當一批批參與者陸續離去時，我的心幾乎變成冰涼。我猜想，許信良在那時也必定有無比的挫折吧。特別是他的長年戰友陳婉真也終告決裂時，對他更是沉重的打擊。對於這段記憶，每當想起，我的心情是不快的、鬱悶的。

我當初會下決心參加辦報，並非是爲了參加政治組織，而是爲了使挫敗的民主運動在海外有所振作，爲了使不能發言的朋友能夠傳出心聲。當報社成員分散時，我才知道政治運動並不是依賴主觀願望就可造成的。然而，在許多民主運動者入獄之際，我深切感到自己必須以意志堅持戰鬥下去。自我囚禁是我對自己的一個許諾，我沒有理由爲了抽象的路線問題或意識形態問題，放棄我所選擇的戰鬥位置。所謂路線與意識形態，不是純粹使用文字理論來堆砌的；必須是真正付諸行動，才能夠產生具體的意義。

因此，許信良在分裂事件發生後，決心維持出刊報紙時，我也決定留下來。那是一九八一年初夏的事，整個報社僅剩下四個人，即許信良、陳昭南、阿娥與我。這是報社最困難的時期，但也是作戰意志最爲堅定的時候。就在這段期間，我的思想真正起了變化。我的中國史研究轉換成台灣史研究，中國文學的摸索改變成台灣文學的探討；同樣的，我的學術關心也衍化成爲政治觀察。我每週至少撰寫兩篇政論的習慣，便是在這個時期培養起來的。

政論的寫作，是我開發自己思辨能力的新嘗試。不能不承認的一個事實是，許信良是引導我走向政論道路的最大助力。他談論政治，不捨晝夜。幾乎每天踏入辦公室，就會立刻坐下來反覆討論當天自台灣傳來的消息。他熟悉國民黨決策者的政治背景與心理狀態，也熟悉國民黨內部的運作方式；更重要的，他對整個台灣反對運動瞭若指掌。通常是我提供消息與事實給他，然後在各種事件之間，他能夠分析出相互的關係。根據他的判斷與結論，我寫好一篇文章。週報的幾篇社論，大都是那樣寫成的。他的研判非常精確，很少有失誤的時候。由於有他的提示與啓發，我學習到如何去認識當權者的統治本質，也學習到如何揭開統治者的神秘面紗。

對統治者權力結構的解剖，絕對不是著迷於宮廷政治的權謀。相反的，這是爲了瞭解統治者如何使用權力來攫取利益，並如何使用權力來剝奪人民的基本權益。要解除神話，就必須先拆除神殿。在海外，有一種潔癖主義者的論調是這樣的，國民黨的問題應由國民黨解決，台灣人無需耗神給予分析評論。這種書生之見，無非是根源於徹底的反體制精神。其立場固然值得嘉許，但是脫離現實的劣根性也儼然可見。當統治者的權力鬥爭已經干涉到人民的生活時，那已變成社會無可劃分的問題。逃避這樣的問題，便是逃避現實。

然而，政論的最高目標，並非止於卸下權力人物的面具而已，更爲重要的是，在於提升反對運動的境界。長期觀察台灣政治的發展，是爲了維繫人心對自己土地的關切。同時，在政局起伏的過程中，政論的探索也無非是在尋找反對運動的策略與突破點。許信良在這段時期的運動，便是站在弱小者的立場從事聯合陣線的建立。他的弱小者立場，與他早期社會主義的信念是息息相關的。海外左翼運動者，往往過於讀死書或死讀書，開口閉口，言必稱馬列。但是真正運用在實際運動上時，反而束手無策。他們分辨不出什麼是敵我矛盾與社會內

部矛盾，也區別不出什麼是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甚至他們也混淆不清什麼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在囫圇吞食教條理論之後，終於使他們忘記自己是搖擺性格特別強烈的書生。許信良的左翼思想之接觸密切，與他留學英國的經驗有關。不過，他完全沒有抱殘守缺，而毋寧是從運動經驗中豐富並修正他的理論。他深深相信，沒有民族的解放，就不可能有民主的解放；當台灣社會還停留在殖民地體制的階段時，沒有一個單獨的階級是可以獲得解放的。這也是他服膺台灣民族、台灣獨立、台灣革命等等信念的主要原因。

許信良後來會與史明成立台灣民族民主革命同盟，便是基於客觀的台灣民族的事實存在，以及主觀的聯合陣線的策略原則。以我當時的觀察，許信良與史明的合作，是很正確的做法。事實上，許信良在私下非常欽服史明的毅力；對於史明所寫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更是熟讀不厭。這個同盟後來之所以失敗，許信良應該負起較大的責任。他是那種粗枝大葉、不拘小節的人；不像史明那樣認真執著，那樣辛勞嚴肅。這種性格上的相異，遠遠超過意識形態與運動理論上的分歧。對於這個問題，我自然不能不對許信良有所責備。

在洛杉磯近四年的期間，我與許信良常常有意見上的爭執。但是每次辯論之後，我會發現彼此的情誼反而更為深厚。他那寬宏大量的性格，一直是我欣賞的。在辦公室、在餐廳、在私人聚會，他很少不談政治的；只要觸及政治話題，他便不止不休。對於政治人物的長短，他絕對不會議論。他重視的，是整個運動，而不是個人；他強調的，是格局的開展，而不是派系紛爭。一個介入政治運動的人物，往往會招來掌聲與拳聲；許信良亦不例外。不

過，在各種噪音中，他始終保持清醒的思考。特別是面對惡意的批判聲音時，他也是淡然處之。在理論上做枝節的爭論，並不能使運動前進。一些左翼書生，善於在空泛的道德上、原則上做文字意義的考證。在一句話或一篇文字裡，進行細部的釘釘補註，企圖在步伐一致的所謂批判工作裡，建立他們假想中的崇高精神。耽溺於這樣的文字遊戲，完全與許信良的性恪扞格不合。對於許信良，這樣的抨擊批判根本不能構成傷害。

那段時期，報社常常陷於嚴重的財政困難之中，現在回想起來，無疑是一場噩夢。能夠那樣維持下去，乃是憑藉了一股意志。我與他總是去廉價的墨西哥餐廳解決吃飯問題。在那幽暗、簡陋的飯店裡，陽光很難照射進去。我們選擇坐在窗口，使用的語言與西班牙話正好構成鮮明對比。那裡常常有走唱的墨裔歌手，吟哦著熱情而帶有悲戚的情歌，許信良不免會自我解嘲：「從來沒有想到我們會落魄到這種地步。」回望那些日子，真的是充滿了流亡的情緒。有時，他會在深夜裡來我所租的公寓。我們在精神上都很苦悶寂寞，夜裡的長談也許可以相互慰藉吧。他每次離開時，洛杉磯已陷於使人發慌的寧靜裡。我目送他的背影，直到他那輛陳舊的老車發動引擎後，我才關門熄燈。就在那樣的時刻，我才仔細體會了他意志上所受的考驗，以及他長期所表現的抵抗精神。如果是在台灣，他一定能夠發揮他的運動策略。只有在島上，他才能找到戰場。流亡在異鄉，他唯一可做的，便是磨鍊自己的心志，等待最佳的時機。



一九八三年冬天，我離開洛杉磯，許信良仍然繼續他的戰鬥，仍然保持對台灣政局的密切觀察。他在一九八五年提出「建黨回台」的主張時，立即引起海外政治運動者的非議。有一種指控，認為他是「變色龍」，宣稱他的行動是走體制內的路線；這樣的回台，等於是背離了革命者的立場。那種高昂的批判揭露了一個事實，在海外主張革命的運動者，原來都是一決心停留在海外的。只要守住海外，便是反體制的；他們從來未曾估計到，建黨本身就是一種革命性的反體制行動。戰後四十餘年來，從來沒有一個反對黨能夠建立。在國民黨的既存體制之外另起爐灶，便是劃時代的歷史事件。遠在島內建黨之前，許信良就以具體的行動實踐這樣的理念。對那些批判者來說，他們認為許信良只是說說而已，只是標新立異而已。他們未曾預料，許信良竟然是真正去做了。

當年指控許信良是「變色龍」的英勇批判者，最後反而都證明他是正確的。在許信良返台之後，許多批判者都尾隨他後面回去了。最投機的性格，非常完整地表現在這些所謂左派的書生身上。他們利用許信良及台灣民主運動者所開創的局面，安然回到台灣。誰是變色龍，已是不辯自明。許信良在被監禁之後，又全力投入政治運動時，左派書生仍然還是從容保持業餘玩票的性格，仍然還流露冷嘲熱諷的態度。這是我所見過最輕鬆也最舒服的左翼運動者。

許信良是在一九八九年九月以乘桴於海的方式回到台灣；在此之前，他已經有三次闖關失敗的紀錄。直到他登陸台灣時，已足足耗費了他三年的努力。在他嘗試返鄉的期間，我能夠做的也只是文字的支援工作而已。我當然是祝禱他順利回台的，因為只要成功的話，無論是在獄內或是獄外，他一定能夠找到作戰的武器與對抗的目標。「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舉起整個地球」，這是物理學上的名言，卻也能恰當運用在許信良的運動觀上。只要給他一個據點，他就可以繼續造勢，繼續勇往直前。

一九九〇年夏天，我回台去列席旁聽國是會議。到達會場時，我看到許信良坐在會場中間。他明亮的前額閃閃發光，我就知道他的戰鬥士氣一定非常旺盛。在洛杉磯時期，每當他在用腦思考時，他的前額就會反射類似的閃光，那往往是這意志力量臻於顛峰的狀態。我看見他在會中斥喝國民黨的官員，那種意氣風發的姿態，全然不同於海外落魄的模樣。十年的長期流亡，顯然沒有損壞他的鬥志於萬一。想到當年困守在異鄉的一幢朽舊木屋裡，淪落在墨西哥餐館的苦悶時光，與今日的情況相比，簡直有恍如隔世的感覺。

許信良樂觀戰鬥態度，對我過去十年介入政治運動具有無限啓發的作用。我挫折過也絕望過，但最後都克服了。這種自我克服的經驗，可以說是在洛杉磯時期學習的。我曾經覺得歷史輸掉了，一生輸掉了，卻因為有許信良堅持戰鬥下去的榜樣，我終於沒有輸掉自我。他的政治生涯劇烈起伏，卻從未動搖過他的信心。對於他走過的道路，他很少眷戀回顧；對於道路上的障礙，他也很少引以為憂；對任何抨擊，他更是不以為意。我見證了他單獨承受苦悶的時光，也見證了他復出再起的日子。當他稱我為「永恆的戰友」時，我知道他仍然對我



有所期許，而且也希望我加入他戰鬥的行列。那份激勵鼓舞之情，那份熱愛同志之誼，都會經發生在洛杉磯。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三 聖荷西

——〈自立早報〉一九九二年一月四日、五日

## 我的台灣史啟蒙導師：史明先生

1

史明先生所著《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在一九八〇年秋天開始發行於海外。那時，我正處於思想最苦悶的階段；不僅對自己過去所學的知識產生了懷疑，而且對深植在內心的國家認同發生了動搖。在歷史研究領域逐漸荒廢之際，厚厚的史明巨著適時到達我手中，那種喜悅之情，至今仍然可以感受得到。

遠在一九七四年初履北美時，在一位長輩的書架上看到日文版的《台灣人四百年史》。那樣的書名，於我自是生疏異常。所謂生疏，實不難瞭解。當時，我的整個視野都全然投向中國歷史的研究，並不能注意台灣史的內容。更重要的是，我並不認為台灣史是應該單獨存在的；我甚至還在暗自質問，台灣有歷史嗎？站在那位長輩的書房裡，我只是無謂地把那冊

日文版抽下來翻閱。扉頁上是橫寫的書法，歪歪斜斜，跡近拙樸：「台灣人四百年史」。我又翻過一頁，才發現是日本知名文學家武者小路篤實的題字。

出於好奇心的驅使，我細細讀了日文版的序言。自求學以來，我第一次看到「台灣民族」、「台灣意識」這樣的字眼。看到這些名詞時，內心產生極大的震撼，有如雷霆萬鈞一般。對台灣史一無所知的我而言，那些名詞簡直是不潔、不德的同義詞。惶惶然，我將那冊日文版放回書架，心中充滿困惑與慌亂，久久不能釋懷。那時，我未曾覺悟到，存留在我思想上的震撼，其實是我價值觀念逐步崩塌的一個開端。

對中國的嚮往與崇敬，曾經盤踞過相當漫長的時間，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更不能否認的是，我蔑視台灣的一切；凡涉及台灣的歷史、語言、文學，我都認為不符合中國的規格。這樣的偏見支配了我的思考，只要是不符中國的，我自然便會予以排斥。因此，第一次接觸史明的日文著作時，一股無可壓抑的抗拒感油然而生。

在三十歲以前，我是典型的台灣歷史的文盲。真正覺悟到必須認識台灣史時，我舊有的思考與情感早已粉碎成爲一堆瓦礫。身處廢墟之際，我捧讀第一冊有關島嶼的歷史是連雅堂的《台灣通史》。這冊史書僅能做爲初步瞭解的素材，畢竟不能滿足我的知識追求。何況那是一冊以中國傳統帝王史觀的立場所寫出的作品，無論是編纂方式或歷史解釋，全然沒有脫離衰老的鎖國心態。我對《台灣通史》一書，當然是感到疲憊異常。在中國史學中糾纏了那麼長久的日子之後，尋找到的第一冊台灣史，竟然也還是籠罩在封建史學的陰影下，那對我

自是很大的嘲弄。

使我獲得鳥瞰式的視野，始自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那時我已離開學校，南下到洛杉磯辦報。因坐在那陽光城市裡，反而覺得台灣距離我特別接近；因爲，在那裡每天可以接收到有關家鄉政情的信息。我夜以繼日地解析源源傳來的消息，使用著學院以外的思考方式來觀察政治。不過，我深切知道，剖析政治變化固然是投入民主運動時的必備條件；只是我也知道，政治並不能完全解決台灣的問題。倘然對台灣的歷史演變茫然無知，就不可能認識不公不義之所以長久存在於台灣社會的原因。什麼是台灣人？什麼是台灣社會的形成原因？什麼是台灣殖民統治的歷史性格？我更進一步自問，台灣的出路在那裡？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時，幾乎就等於是逼我走入思想改造與人格改造的過程。我的大中國主義是漸次崩壞的，隨之而來的是巨大的困惑：爲什麼在中國內部的四川人、江蘇人或其他省分的人，無需面臨台灣人所遭遇的問題；卻只有台灣人在每一個時代都必須提出來審問自己？自受教以來，「台灣人就是中國人」的命題，突然變成虛無的、空幻的標籤。

我不能不重估大學時代以來所吸收的歷史知識，也不能不重新考察我所熟悉的台灣社會。在對自己進行全面整頓時，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協助我尋獲一些答案。他的書，集中在最近四百年的歷史發展過程，解釋台灣社會的形成背景及其性格。歷史上的台灣人是如何出現的？書中有極其清晰的敘述鋪陳。近代的台灣命運之所以會不同於中國的最主要的原因，由於兩個社會分別展開不同的歷史經驗。當中國社會還處於封閉的帝王統治的封建時

代，台灣社會早已捲入世界歷史的洪流，而淪為亞洲的一塊殖民地。帝國主義的入侵，以及殖民體制的建立，使台灣被迫朝向與中國歷史背道而馳的路途前進。沒有台灣的政治條件，沒有台灣的社會結構，沒有台灣的經濟基礎，就不可能有偏頗的、畸形的體制存在。這些條件結構、基礎的出現，乃是經過長期的緩慢累積。

史明的歷史解釋鋪陳得非常透徹，台灣人意識的誕生，一是由於客觀的殖民體制的壓迫，一是出於主觀的台灣人民的反抗。外在環境是如此的艱難，在淌血流汗開拓荒地之餘，漢人移民被迫必須拿起武器與殖民統治者進行戰鬥。這是很重要的歷史基礎，因為漢人移民對自己中國的原鄉是「棄守」的，對台灣新闢的土地則是全力「防守」的。

當人民的生命與土地的命運緊密結合在一起時，一種強烈的認同意識便篤定出現。史明的書指出，台灣人、台灣意識、台灣民族等等概念，乃是在壓迫與反抗的雙重經驗中逐步凝結起來的。移民浪潮可能有先後之分，但是一旦投入台灣社會的改造過程之後，自然就會與台灣的命運銜接起來。我不能否認，通過史明的文字，我第一次探索了島嶼歷史的起伏消長；也是經由他的作品，我第一次認識到什麼是台灣的左翼史觀。

左翼運動的傳承，在台灣遭遇到兩次大規模的肅清。一次是一九二〇年代與三〇年代之交的日警大逮捕，一次是一九五〇年代國民黨反共政策下的大整肅。歷經這先後兩次的政治性鎮壓，左翼運動的發展可說已到了凋零不堪的地步，戰後成長起來的台灣青年，對台灣史不僅茫然無知，對於左翼的台灣史更是無從窺探。如果沒有閱讀史明的著作，我恐怕無法啓

開這一個領域的門徑。一九八〇年，我以整個冬天的時間閱讀《台灣人四百年史》。讀完全書時，我的思考方向幾乎就確立了。我日後會全心涉入台灣左翼運動的研究，毫無疑問的，閱讀史明的書是一個出發點。

## 2

我從來沒有預期到會與史明見面。一九八一年初夏，他到北美旅行的訪問，那是他自一九五二年流亡於日本後第一次離境的。持著沒有國籍的居留證，他訪美的第一個城市，就是洛杉磯。坐在《美麗島週報》的編輯室，我注視著長桌另一端的他。

他披著銀灰色的稍長的髮，衣著是藍色泛白的牛仔褲與夾克，那年他六十三歲。我那時對他所懷的心情，是尊敬中帶有幾分畏懼。他看來比實際的年齡還健壯，眼睛炯炯有神，面頰的肌肉充滿了男性的線條。我之對他心存尊敬，是能夠理解的。因為，不久前才讀過他的新著，至少熟悉他的史識與史觀；我頗為折服於他組織史料的能力，以及他對史實的透視與解析。至於我會對他產生畏懼，就顯然無法說清楚。是不是由於自己長期浸淫在中國史研究中，反而疏遠了台灣史，我感到特別心虛？或者是，我已長久習慣於右翼思考的方式，對於左翼理論，非常生疏；如今在他面前，我似乎一時無法合理化自己所接受過的史學訓練。

存有那種敬與畏的奇異心理，現在想來自是幼稚得很。不過，當時我確實有很多問題想向他請教，只是不知道如何恰當提出。在那次聚會中，他使用福佬話與北京話混雜表達一些



政治見解。圍坐在編輯室的一些年輕朋友，非常訝異於他的談話方式，後來大家才知道，他在青年時期曾遠赴中國參加中共的游擊隊。

史明的心路歷程，對我確實有啟發作用。他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在那個時代，凡是反對殖民地統治的知識份子，都必然會選擇社會主義的思想做為政治信仰。他會走上左翼運動的道路，便是從留學時期開始的。一九四二年大學畢業時，太平洋戰爭已經如火如荼進行了一年之久。基於反對日本殖民者的帝國主義戰爭，他決定奔向中國參加抗日運動，也正因為他有中共經驗，使他深切瞭解國民黨與共產黨對台灣問題與台灣人所持的態度。

一九四六年，國共內戰臻於高潮之際，台灣青年開始受到國民黨徵召，投入華北的戰場。有不計其數的台灣兵，被迫捲入一場違背他們自主意願的戰爭。他們受到驅使，遠赴華北前線，如果不是戰死，便是棄械投降。台灣兵變成中共的戰俘後，立刻再被迫穿上中共的制服，又被趕到戰場與國民黨軍隊對抗。當時在中共游擊隊裡參加戰鬥的史明，親眼看到了夾在時代縫隙中台灣人的悲劇命運。他漸漸醒悟，國共內戰與台灣人絲毫沒有關係，卻必須為雙方的權力鬥爭服役效勞。他基於同胞之情，遂向中共領導人建議，有一天國民黨軍隊將會逃亡到台灣，因此，對待台灣兵戰俘，不應是迫使他們做無謂的犧牲，而是好好訓練，以便來日發揮更大的作用。延安的中共當局重視史明的建議，遂在華北所成立直屬中共中央的軍政大學裡組織一個「台灣隊」。由於這個組織的成立，許多台灣兵僥倖活存下來。

史明受命領導這個台灣隊，他第一次發現中共使用分而治之的手段，來對待台灣人，更發現中共領導人對台灣實際情況的無知。他深深體會到，台灣人只不過是中國政治鬥爭裡任人擺佈的棋子而已。就像歷史上所有的台灣先人一樣，在時代的悶局裡，史明開始遇到國家與民族的認同問題。什麼是台灣人？台灣人是誰？這樣的問題不斷困擾也纏繞著他。在這段期間，他也懷疑中共的社會主義立場。尤其他見證了延安當局引進蘇聯史達林的恐怖主義，進行流血式的土地改革。在國民黨統治下台灣人民遭到屠殺之際，中共也對中國人民展開毫無人性的政治肅清。如果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是受到美國政府的默許，那麼，中共的紅色恐怖則是直接獲得莫斯科當局的鼓勵。

就是在這樣的衝擊下，史明內心激起了強烈的台灣意識。中共在內戰節節勝利之際，也正是史明決心脫離中共游擊隊的時候。一九四九年他輾轉逃回台灣。就在那一年，國民黨被中共驅趕到台灣。史明處在那樣的變局，知道國民黨又會把在統治中國時期的貪污腐化風氣攜到島上，所以他堅持繼續反抗的立場。這次不再是為中共效勞了，而是為了台灣人的尊嚴與人格而戰鬥下去。他秘密組織小型的武裝隊伍，計畫行刺蔣介石。不久卻事機敗露，迫使他必須離開台灣。一九五二年他逃亡到日本，從此開始了他後半生的放逐生涯。

史明的台灣人意識，是從現實的政治經驗中獲得的，與一般知識份子最大的地方，便是史明完全擺脫了空想的、臆測的、推理的思考方式；他的政治信仰來自他深刻的觀察與體會，終而定位於台灣歷史與台灣社會。他與國民黨的鬥爭，他對中共的唾棄，以及他之回歸本土，可以說為後來台灣知識份子鋪下明確可辨的道路。

最初聽完他的半生故事時，對我的思考產生極大的衝擊。爲什麼他會以十餘年的時光來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爲什麼他始終不懈地宣揚社會主義的理念，爲什麼他持續不斷主張台灣民族的立場，這些問題只有印證他的生命過程才能找到答案。他個人的歷史，其實就是整個台灣歷史的具體而微；因此，在瞭解他的成長經驗之後，再捧讀他的歷史作品，我始領悟他所寫下一字一句的心情與意義。

沒有一種政治運動是爲了反抗而反抗的；在運動背後，必然沉澱著長期累積的原因。台灣內部之所以會誕生民族運動與民主運動，並不是由少數幾位「野心份子」或「叛亂份子」的主觀願望能夠促成，那是島上開拓者通過歷史教訓而凝結出來的集體意志。台灣社會的發展方向便是受到台灣歷史性格的制約。沒有客觀的歷史條件，沒有主觀的自主意願，就沒有現階段的民族民主運動。史明撰寫歷史時，就在於尋找台灣形成的特殊性格。從荷鄭時代，歷經滿清、日據時期，直到戰後歷史的開展，他清楚勾勒了外來殖民統治與本地住民反抗的雙軌演變過程；而這樣的過程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不可能發現的。正是基於如此不同的歷史背景，台灣的反抗運動與中國的政治運動，其實並沒有相通之處。

與他相識之後，我又重新讀過一次《台灣人四百年史》。書中對我的啓發遠勝從前，從來沒有一部歷史作品這樣接近我的。近人酷嗜談論結構主義，認爲作品乃是獨立於作者之外的文本，把作品的書寫系統視爲與作者無關的另一存在。在理論上，這種說法自是可以成立。然而，以我接觸史明的經驗來看，這樣的理論顯然並不適用。能夠進一步與他對話，我

反而更可揣摩他書中的微言大義。如果我後來的論述可以發現左翼觀點的話，那麼我不必隱藏一個事實，史明的思考模式誠然引導了我。

### 3

他是一位意志力旺盛的政治運動者。談到意志，似乎過於唯心；不過這確實是不能否認的，憑藉那股力量，他從未有過絲毫懈怠。每次與他談話，他總是精神奕奕，彷彿這個世界並沒有任何事物可以使他挫折。他沒有嘔嘆，沒有感傷，也沒有憑弔；他的思考毫不動搖地面對現實，面對未來。從一九八一年以來，我便與他保持密切的聯絡。在這十餘年中，我所看見的他，是一位憤怒的、放射強烈批判精神的老人。

雖然離開台灣有三、四十年之久，他所關心的仍然是台灣的政情變化。使我感到驚奇的，便是他對島上的一些內部流動瞭若指掌，尤其對民主運動陣營裡的構造轉移，更是知道得枝節分明。他常常重複這樣的語言：「敵人的力量大，我們的力量小，……。」在形勢懸殊的情況下，他說，必須化無形的力量爲有形的。他口中所稱的敵人，自然是泛指國民黨及民族民主運動的障礙。我漸漸可以瞭解他思考的內容，無形的力量，當然就是反抗的意志；有形的力量，則是指聯合陣線。一九八〇年初期，台灣才經歷過美麗島事件不久，海外政治運動籠罩在高昂、激情的氣氛之中。史明來到北美，顯然是爲了促成聯合陣線的建立。他後來會決定與許信良合作，無疑是基於這種戰略上的考慮。



不過，他最能影響我的，還是在台灣史研究方面，我對於左翼運動的注意，還是來到海外以後的事了。當時釣魚台運動仍然餘波蕩漾，在校園裡遇見不少左派與統派的人士。那是在七〇年代中期，毛語錄與毛派電影還很猖獗，歌頌中國文化大革命之類報刊雜誌也隨處可見。在那種環境裡，我不能不讀一些馬克思選集，以及普列哈諾夫之類作品。因為，如果不表現「左」的話，就顯得落伍了。這就像六〇年代台灣所流行的存在主義，與現階段蔚為風尚的結構主義那般，終要出一次麻疹的。只是，左翼視野的建立，確實協助我分析了台灣社會的性質以及台灣歷史的結構。在認識馬克思主義時，我已跨過為理論而理論的年齡了。西方左翼運動的發展，從十九世紀末葉經濟上階級鬥爭的階段開始，歷經二十世紀初期政治上的權力鬥爭階段，以至後來蛻化成為文化批判理論的崛起，誠然是有跡可循的。經過一個世紀以上的累積，左翼思潮絕對不是反共政策下使用「崩潰」、「破產」、「瓦解」等簡單的字眼就可遏止的。在七〇年代白色恐怖當道的時期，閱讀左翼作品是一大禁忌。我會讀那此書，自然寓有抗議的味道。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到要使用左翼的觀點來考察台灣歷史，直到我遇見了史明。

我撰寫的第一篇台灣史文章，是「永遠的望鄉人——蘇新的生平與思想初論」。促使我撰寫這篇文章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北京對台政策在八〇年代初期有了重大的變化，海峽兩岸的形勢出現了鬆動的現象。客觀條件的轉移，要求我必須具備台灣史視野來重估兩岸之間的關係。當時我正閱讀台灣總督府編纂的史料《台灣警察沿革誌》，對於台灣共產黨興亡的歷

史投以較多的注意力。在史料的記載中，我特別警覺台共成員之一蘇新所扮演的角色。他之所以吸引我，是因為有不少人提到他的名字。史明也在那時候告訴我，蘇新使用過「莊嘉農」的筆名，寫過一冊《憤怒的台灣》。我又聽說，陳若曦寫的一篇有關文革的短篇故事《老人》，便是在寫蘇新的晚年遭遇。從這些傳聞，我印證了史料紀錄，才發現蘇新是值得研究的政治人物。

現在回顧起來，那時蒐集的資料確實還很粗疏。蘇新在台共時期所編輯的《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幣大眾時報》，根本沒有機會閱讀；而他在戰後編輯的《政經報》、《人民導報》等，我更沒有窺探的可能。在史料極度缺乏的情況下，我仍然下筆撰寫，乃是因為心情相當急切；一方面是蘇新在北京去世的消息突然傳來，一方面則是北京對台的統戰逐步升高。我希望透過蘇新生平的探討，來觀察台灣人流落在中國境內的命運。蘇新是一位社會主義信仰者，尚且不能得到中共的寬容，則台灣知識份子若淪落在中共手中，結局之悲慘自是可以想像。撰寫那篇文字時，我獲得了史明的鼓勵。他曾經提醒過我，史家落筆必須謹慎，一旦寫成文字，對後世就會產生引導作用。我瞭解他的心意，以我蒐集資料的程度，恐怕會留下錯誤與漏洞。這樣的忠告，使我更加深入瞭解他的史家態度。從前他在早稻田大學主修的是政治經濟學，並未接受過任何的史學訓練。不過，每談到歷史撰寫時，他的要求就一定非常嚴格，完全不遜於科班出身的工作者。

史明主張聯合陣線的觀察，對我研究台灣史的思考可以說有頗多啟發。我在討論蘇新與



謝雪紅的生平時，其中的一個主題之所以圍繞在「決裂」與「團結」的問題上，乃是從聯合陣線的觀念延伸出來的。我所認識的日據時代台灣政治運動史，事實上就是一部台灣人的分裂史。辨認那些分合的過程時，我的胸臆總是充塞著巨大苦悶。分析史實的背后，當然可以發現許多分裂的原因。有絕大多數的理由可以歸咎於統治者及其鷹犬，他們善於分化離間，製造對立；不過，台灣人政治領導者也應該負起相當大的責任。幾乎所有的政治團體，在理念相互認同的情況下結合起來，然後是發生內部鬥爭，接著又引起嚴重分裂，最後完全宣告覆亡。團結、內訌、分裂，顯然不是台灣史的辯論發展，而毋寧是台灣反抗運動的一種悲劇宿命；因為，每經一次分裂之後，客觀現實並未再給台灣人另一次團結的機會。政治團體的內鬥，往往不是基於意識之爭，而是出自意氣之爭；即使同志之間的理念是如何接近，最後也還是由於脾性的互不相容而分道揚鑣。面對這樣的史實，我就有無比的惆悵。

我的台灣史研究，事實上就是在探討政治運動的團結之道，希望從歷史上尋找能夠克服悲劇宿命的答案。這樣的研究，自然不是為了學術而學術。不過，我並不認為我的台灣史學是庸俗的「影射史學」，也不認為是為政治目的而服役的工具。在一個反常的時代，在一個畸形的社會裡，歷史研究不免會滲透個人的政治立場與價值觀念。我心情之緊張，終於顯現在史學研究裡，這只能視為階段性的現象。當時代的離奇體制還未改變之前，當台灣歷史還未擺脫政治干擾之前，當整個民主運動仍未凝聚之前，我的史觀表現大約就是現在這樣的狀態。

## 4

在追求知識的道路上，有過許多導師扶助我、提攜我。不過，對我整個思想歷程造成最大衝擊的，莫過於史明先生的歷史作品。在海外，常聽到這樣的傳說，指稱史明是一位倔強的、堅持家長式領導的運動者。言下之意，當然是對他的人格與風格有所貶抑。這種說法，自然而然就蒙蔽了對史明先生真正風貌的認識。

我承認他確實有家長式的領導，也承認他性格上非常倔強。如果有人看見他與年輕朋友激烈討論政治路線的情景時，更可體會他對自己的革命理論是堅定辯護的。然而，他之可敬也就在這點。他深信自己的信仰，更深信他的理想將有實現的一天。為了那樣的理想，他已經奮戰了一輩子。在商品社會裡，當正義與道德也變成知識份子可以輕易販賣的東西時，史明的風格就越加使我懷念。知識份子的搖擺性格，通常都以正義道德做為掩飾。這種現象，於今為烈，已到了使人毛骨悚然的地步。史明從不隨便談論如此清高的標籤，他寧可選擇實際的行動。

每次到東京訪問，我便停留在他的住處。在那狹窄的斗室裡，我見證了他苦行僧式的生活。幾乎每天早上起床，他就實行打坐，然後讀書寫稿。他的用功之深，從他堆在書桌上、地板上的手抄筆記，就可見一斑。他住處的樓下是一中華料理館，在最忙碌的時段，他有時還會下樓親自操鍋。餐館所有的收入，他悉數捐獻給政治運動中的青年朋友。然而，他自奉

甚儉，往往以稀飯與醬菜度過三餐。如果沒有與他一起生活，我是不敢相信他的家居日子與政治行動是如此一致的。

去年他曾一度病倒，鑑於他的年事日高，我曾建議要為他記錄個人的口述歷史。他婉拒了，並說他還有很多事情得完成，現在還不是回憶的時候。他狂熱的工作精神，由此可見。去夏，獨台會事件發生時，他曾被指控為幕後的主要人物。史明的名字，終於在島上傳開來。在此之前，他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曾經在學子之間普遍傳閱。當時，我受邀前往京都做一場文學演講。我計畫順道去東京探望他，但史明拒絕了。他說，獨台會事件發生之際，他不能不顧慮我的安全。事實上，我並沒有任何恐懼感，因為我知道那是被羅織出來的政治案件。不過，他堅持我必須直飛台灣，不得前往東京。我自是感到惆悵，但是他對我設想如此周到，我不能不心存感激。

直到我七月從台灣返美之後，他竟特別到聖荷西來我住處。因為，他要對我的《謝雪紅評傳》的出版表示祝賀之意。我把書籍交給他時，他一直領首稱讚。那種無言的鼓勵，使我體會到他另一面的「人間性」。在我撰寫期間，史明先生不時給我許多指導，解除我不少疑惑。這也是我在書的後記，對他特別表示感謝的原因。

在政治運動的陣營裡，史明至今仍然是一個被曲解的名字。在歷史研究的領域裡，他受到的曲解則更嚴重。我想，只要曲解的現象繼續存在，他的作品精神就很難發揮出來。然而，我深信，他的巨著所容納的史觀，有一天一定會得到認真的討論，在台灣史學史上必獲一席之地。

今年，他已屆七十五歲。在美國東岸的夏令營見到他時，我發現他的身體比去年還健碩。在營區裡，他仍然開班授課，精神奕奕。我坐在教室的角落，靜靜聽他向更為年輕的留學生講解。他根本不知道老之將至，他以行動與時間對決。看著留學生提出問題，我想起一九八一年與他初識的情景。有一天我也到達七十五歲時，我還能夠維持如此不懈的精神嗎？我不知道。授課結束時，我看他走出教室的門口，他的身影並不寂寞，還有兩三位學生追隨出去，一路向他提問題。他不會寂寞的，每個世代都有受他啓蒙的新人。他給我的烙印，只是較深而已。我使用過「施敏輝」的筆名，便是來自他的原名施朝暉。

一九九二年八月廿七日 台北



## 葉老

### 左營：一個文學重鎮

葉石濤先生是與台灣新文學一起同步發展的先驅者，也是戰後台灣鄉土文學的一位雄辯家。他的文學生涯，是台灣社會在歷史上經過數度轉折的具體反映。他畢生所追求的目標，在於建立台灣文學的尊嚴與信心。即使到了已經年老的今天，他仍然保持辛勤不懈的精神。在時間的琢磨下，他的文學信念益加堅定牢固；他的文學光澤，照亮了幽暗的社會，溫暖了荒涼的靈魂。如果要尋找台灣人格的標本，似乎可以在他的文學作品裡獲得印證。

回台灣拜訪葉老，一直是我的心願。葉老住在我的故鄉左營，幾乎是過著一種隱居的生活。我常想，如果他生活在一個重視人文精神的國度，必定受到國家的尊敬，他的地位絕對不在所謂總統府資政或中研院院士之下。很不幸的是，他竟然生活在粗魯無文的政治體制裡，其境遇是可想而知。然而，也正是由於接受了這種惡質環境的考驗，台灣社會才從他的

精神抵抗中顯現了一些文學尊嚴。

左營是台灣文學的一個重鎮。在台灣新詩史居有一席地位的創世紀詩社，便是從左營出發的。儘管我是多麼不贊同洛夫、張默的文學觀，他們對台灣現代詩的奉獻與貢獻，應該得到一些首肯。與他們一起出發的還有痲弦，他們的詩代表了台灣文學中的另一種流亡傳統。到今天，我仍然清楚記得鄭愁予寫了一首題為〈左營〉的小詩。我相信那是為他們那個時代的悲歡離合所留下來的記錄。對他而言，左營是整個動亂時代的一個「小小的驛站」，但是，這個驛站曾經為台灣文學啓開動人的篇章。我在台灣時，年少氣盛，對創世紀懷有強烈的偏見，拒絕接受他們的作品與詩觀。現在，人過中年，已經比較能夠平靜回望他們的業績。尤其最近在整理台灣文學史七〇年代的資料時，我反而能夠發現從前未曾理解的作品精神。文學傳統的累積與繼承，是錯綜複雜的，不是用簡單的理念或淺薄的情緒就可理清。反映台灣文學西化現象的創世紀詩社，確曾提升新詩創作的技巧，這方面的成績一度受到唐文標的全盤否定。從文學史的觀點來看，這樣的評價是不公平的。何況經過二、三十年在島上的苦心經營，事實上也已納入台灣本土文學的傳統。要檢討這段時期的功過，還需要更審慎更深刻的認識。

直到離開台灣以前，我把大部分的青春時光都投注在現代詩的咀嚼解析之中。我不僅蒐集台灣五〇年代至七〇年代的新詩作品，甚至用心去蒐集中國三〇、四〇年代的詩集。即使到現在，我對中國三〇年代一些特定詩人的作品仍存有一絲迷戀，例如：何其芳、卞之琳、



馮至、聞一多等。這是青年時代就已養成的脾性，至今已難以戒掉。如果這可以稱為「惡習」的話，那是因為這種脾性把我引開對台灣文學的注意，甚至引導我走向極為遙遠的地方，遙遠得使我遺忘了自己的土地。

我在異域流亡很久的一段時間之後，才獲悉左營也是台灣本土文學的一個據點，那就是葉石濤先生在那裡居住了二、三十年。我在左營長大，竟然不知道這位文學先驅的存在，可見我從前的遠遊是到達怎樣遺忘的境地。每思及此，內心就湧起一陣無可抵擋的羞愧。我不能否認，自己對台灣文學的覺悟，乃是由於一連串政治事件的衝擊。必須通過強烈的碰撞，才能搖醒一顆遊蕩的幽靈，這個事實正好可以揭露台灣書生的怯懦。

葉老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傳統，並不僅是受到書生的忽視，整個台灣社會其實很少正確看待自己內部所創造出來的文化。台灣歷史的發展，不是以人民的意志為文化的形成基礎，事實上，台灣住民與土地是相互異化的。長期的疏離感，使台灣人不斷逃避自己的歷史。

進入七〇年代以後，台灣社會似乎已經到了不能逃避命運的地步。甚至每個人的生命會出現新的出發點，一個民族或一個社會，也會在恰當的時代發生轉機，台灣社會開始進入本土運動的時期，我也正好接觸了葉老的文學評論。我訝然發現，遠在台灣鄉土文學運動崛起之前，葉老早就投入重建文學精神的工作了。

### 淡泊的文學生涯

我回到左營的第一晚，便與彭瑞金相約去拜訪葉老。彭瑞金執教於左營中學，是我的母校。瑞金之所以讓我感到親近，並不是因為他住在左營，也不是因為他在我的母校任教，而是因為他致力於台灣文學評論的建設；他辛勤耕耘，不求功名。在他身上，我看到典型的平民性格。

葉老的住處，離我故居不遠。我與瑞金到達時，他已沏好茶在等待。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葉老，他看來結實，精神奕奕。已經好幾次在雜誌上看過他的相片，那種隔著時空所培養出來的熟悉，似乎都是在為這次的見面做準備工作。他是親切的，肌膚散發出台灣南部的泥土味；確切一點來說，他有著左營人的氣質，拙樸、耿直、毫無偽裝。我想，他的文字魅力大約就是源自這一份性格吧。

葉老很健談，北京話與福佬語交雜使用，典雅與粗糙的詞句也間隔出現。他的窗口面臨勝利路與左營大路的叉口，車聲喧囂嘈雜，葉老則從容以處。在悶熱的夏夜，他自然很清楚我這幾年來的情況，在對話中一再勸勉我回到文學方面的工作。葉老的關切，我當可瞭解。像他這樣以全部的生命投入文學的開拓，在我這一輩的書生已經很難找到了。荒蕪的台灣文學，經過葉老及其前代人的努力播種，顯然已有足夠的果實可供收穫。然而，相對於漫長的台灣社會形成史，文學的繁衍畢竟仍是有限而渺小，葉老樂於看到更多年輕人投入文學工

作，想必是由於他長期忍受寂寞而有所期待吧。

文學於我，是很嚴肅的一個課題，十年來，我的心情一直停留在緊張的狀態中，這樣心情驅使我涉入了極其深遠的政治領域。不過，我從未有過放棄文學的念頭，我深深相信，文學最後一定會取代政治的，一定會在權力凋萎的時候綻放花朵。葉老的文學之所以會成爲我這十年來的信念，便是因爲我認識到，政治不是萬能的；政治只不過是歷史的一種過渡，能夠牽引時代精神走向永恆的，當屬文學無疑。葉老能夠安於淡泊的生活，應該是得力於他做慢的堅持。

他的客廳稍嫌侷促，三把藤椅坐在那裡，勉強使這樣的斗室呈現些微的莊嚴。他的書櫥已呈擁擠，重疊的書籍宣告了空間的狹隘。我難以想像，他是如何在這樣的環境裡寫出他的小說與文學評論。

在這次見面之前，葉老剛剛完成他的《紅鞋子》小說系列。這是他對白色恐怖年代提出內心抗議的聲音，也是他突破長期沉默的一種掙扎。葉老的評論與創作，原是平行的雙軌，二者很少有任何交會之處。他的文學理論，傾向於強調社會寫實的路線，他的主張多少有左翼思想的色彩。但是，他的文學創作則是耽美的，有時近乎犬儒，有時則過於超俗。這種雙元的文學思維，透露了葉老時代的矛盾。也正是由於他表現了衝突的性格，我益加能夠感知他不斷陷身於克服內心障礙的戰鬥，這種艱苦的過程綿延了三、四十年。台灣作家的苦悶，由此可見一斑。

葉老的文學理論與創作，開始合而爲一，表現於《紅鞋子》的時期，他終於提筆寫出蒼白的五〇年代，終於觸探長久以來的政治禁區。他的近期小說，頗有自傳的味道。廢墟年代的知識份子經驗，以及在紅色整肅下壓抑的台灣人意識，都具體呈現在他的小說之中。從《紅鞋子》衍生出來的另一冊小說《台灣男子簡阿淘》，已使葉老本人的成長經驗呼之欲出。這冊小說的副題是「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自傳小說」，明指這是他個人的回憶。這本作品的重要性，在於探討他青年時代對國家認同過程中的一些遭遇。做爲台灣人知識份子的痛苦是在何處？在時代轉折期，台灣青年如何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爲自己定位？留存在心靈深處的這些問題，必須等待到三、四十年之後，才重新拿出來檢閱，其心情之抑鬱，幾可想見。

在台灣社會裡，與葉老同一時代的知識份子，恐怕都是在自囚的情況下耗費一生。葉老早年投入的唯美的小說創作，想必是一種變相的自我放逐吧。然而，他又不甘於捨棄自己的文學信念，而不得不在評論文字中發抒些許心聲。與他的同輩比較起來，葉老畢竟還是幸運的。我的父舅那一輩，幾乎是與葉老一起受苦過來的。但是，到今天爲止，他們仍然停留在自我流亡的時代，從未有過要說出內心苦悶的欲望。戰後初期成長起來的台灣青年，可以說整個世代都完全被犧牲掉了。在那寂靜無聲的一代，葉老最後還是克服怯懦，從思想的瓦礫堆中，從夷平的時代曠野中，發出他們那一世代的抗議。

我在深夜裡回到故鄉，又在深夜離開。左營的燈光，不曾警覺一位遊子的來與去。這個

屬於我年輕時代的精神避難所，無論變得何等陌生，我依舊把它當做我認同的象徵。葉老在這裡坐鎮，我的父母在這裡留守，左營就是我望鄉的方向，他們維持了一份淡泊的心情，以及一份頑石般的意志，那就是台灣的寄託。

## 寒風裡過澳底

### ——雜記東方白

1

東方白自加拿大寄來我與他合攝的照片，那是去年十二月我們路過台灣北海岸時拍照的。照片裡的背景是「鹽寮抗日紀念碑」，遠處是霧氣迷濛、蒼茫遼闊的太平洋。雲翳黯淡，劃過海上長空，也劃過我們的胸口。

這裡是二十世紀台灣史的地點，也是東方白大河小說《浪淘沙》故事的起點。他以十年的時間，寫成這部一百五十萬言的小說，容納了百年來台灣先人分離與結合、挫折與振作的事蹟。在撰寫期間，東方白的精神世界，也隨著故事中的台灣命運一起受傷、一起治療。當我們站在澳底，並肩面對海洋時，他抑揚頓挫的心靈跋涉，想必也隨著小說的完成而宣告終止吧。默默的雲天，滔滔的海水，可能不曾感知一部可觀的文學作品是在這裡孕育誕生的。



以這樣平凡的一個漁村，拉開台灣現代史的序幕，似乎與台灣人波瀾壯闊的奮鬥事業不能匹配。東方白小說的第一章，也是如此平淡無奇開始的：「澳底是面對太平洋的一個小漁村，恰好在鼻頭角與三貂角的海灘中間，本來是個避風的漁港，但因為港內還有一大片平地；於是便有人在那土地上墾荒，並且蓋起了幾間茅屋，終於形成了幾十戶的小村。然而，歷史中的多少興亡盛衰，就是從這幾間茅屋營造起來的。」那座紀念碑，看來有幾分庸俗，幾分笨拙。倘然要從這裝飾性的石碑，去捕捉流動的時光，去揣摩悲歡的生命，當屬枉然。從碑石通往沙灘的石階，兩旁都是林投樹。這倔強的植物破石而出，也使禁錮的靈魂破牆而出。

經過漫長的時光之後，東方白終於啓開了鎖鍊，釋出了自我。在他的大河小說出版之際，他竟然有機會回到故事中的原點。站在澳底的海岸，他的心情絕對不會是平靜的。他的徘徊喟嘆，我是聽見也看見了的。為一件文學勞作耗盡心力，在歷史上有許多先例；但是，能夠像東方白那樣從廢墟中重建了自我，尚屬罕見。他不僅為個人拯救了可貴的生命，而且也為台灣人拯救了一部長篇小說，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蹟。

## 2

我這十年來的心路歷程，其實是與這部小說一起發展的。東方白開始下筆寫出《浪淘沙》的第一頁時，也正是我的生命價值全然粉碎而又重新營造的時候。台灣在八〇年代初期

發出的劇烈陣痛，深深刺激了他，也悍然催醒了我。不過，我以介入政治的方式來表達我對從前的背叛，東方白則選擇了撰寫歷史小說的途徑，來抒發他內心的憤懣之情。

他的作品連載於《台灣文藝》期間，我已在政治波濤裡浮沉了好幾回合。他的小說帶給我許多深沉的思考，尤其最初讀他寫台灣民主國始末那一段，我第一次訝然發現，原來一個動盪的時代也可以使用冷靜的文字來處理。

從前我總有一個偏見，認為台灣文學是緊張的、不修邊幅的。我舉吳濁流、鍾肇政等人的小說為例，他們應該適合生長在勁風的海邊。東方白在石階上徘徊，似乎想找出他小說裡的蛛絲馬跡。他時而駐足，時而瞭望，恐怕是在憑弔那些亡逝的悲壯人物，無論那是真實的，或是虛構的。

我憶起昨夜在宜蘭的演講盛況。充滿自信、熱情而又謙遜的他，站在台上講述他創作文學の旅程。那是他完成小說後第一次的公開表白。當他說出他的文學抱負、他的作品隱喻，以及他追求的生命目標，並沒有多少人知道，這十年來他的日子是如何度過的。面對擁擠的聽眾時，他揮汗講述他小說裡蘊藏著對台灣人的責備、期許與希望。但是，在漫長的歲月裡，他往往只是孤獨面對自己所設計出來的藝術。

如果說這部長篇小說是以生命換取的，並非是誇大的說法。當他落筆寫第一章時，他等於為自己寫下了有期徒刑的判決書。更正確一點來說，那其實是一種無期徒刑；因為，他並不能預測自己何時可以完成這份作品。他只知道只有在小說構築完成時，才有可能從囚禁中

自我釋放。

在自己營造起來的牢籠裡，東方白有幾度瀕於精神崩潰，他簡直走不出自我的監獄之外。他走到了生命的懸崖，往往在到達毀滅的邊緣，他又重新抬起自己的靈魂；在斗室裡重新組合自己的生命。倘然他的小說可以視為台灣命運的影射，則他的掙扎、搏鬥應該是台灣人的性格之最高隱喻吧。他終於沒有迷失在無情的歲月裡；他又執起筆桿，以他的信念克服了莫名的怯懦與脆弱。像一位憤怒的雕刻家，他使自己的迫切的心，急欲表達出他們的願望。即使是李喬的作品，我也覺得他是屬於緊張的文學。讀起東方白的小說後，我逐漸糾正自己的觀念，原來台灣文學也有從容不迫的一面。

初讀《浪淘沙》時，我以為小說的幅度，只不過是第一部《浪》的三倍長。後來進入第二部《淘》之後，我才知道這將不僅僅是二、三十萬言的小說；然而，我從來沒有預料到他會寫出一百五十萬言。從十年前的第一次捧讀，直到我掩卷闕畢，我的心靈旅途已經歷了幾次轉折。倘然我沒有介入政治運動，倘然我沒有改造自己的人格，倘然我沒有重建價值觀念，那麼我對這部小說的理解，恐怕仍停留在最初的純文學的階段，小說中的精神對我的衝擊恐怕沒有如此巨大。

從解釋學的觀點來看，我之接觸《浪淘沙》，其實是我的生命在與一個藝術品相互對話。當我自覺到必須重新塑造個人的歷史傳統時，東方白筆下的藝術生命也開始誕生成長。我緊密追蹤《浪淘沙》的成長軌跡，那並不是因為我認識東方白，而是因為我把這部小說視

為充滿生機、充滿活力的獨立藝術品。這部小說，不是「被鑑賞的對象」，它其實也在我最苦悶、低沉的時候對我說話，也在我最欣喜、開朗的時候為我歌頌。小說中的每一個人物，每一段情結，每一層結構，彷彿都在我的思考裡構築工事。

《浪淘沙》之從容，在此就清楚表現出來。他在故事中帶出另一段故事，在歷史裡隱藏另一段歷史；他的情緒、思想、欲望，在層層過濾中得到稀釋。例如說，周明德身在菲律賓時，就能夠透視美國「民主」的虛偽性，但是，他並不直接抨擊美國制度，東方白以聲東擊西的方式來處理這段故事，他以最大的篇幅去描寫菲律賓民族英雄雷沙，壯烈犧牲的經過。讀到那裡時，我忽然分不清楚究竟是在讀周明德的故事，還是在讀雷沙的故事。周明德的憤怒，都消融在雷沙的歷史事件裡；同樣的，雷沙的自我奉獻，又變成了周明德日後成長的一部分。這兩個故事重疊在一起，又昇華成爲我閱讀時的啓示。

我從來不以爲這是東方白與我對話；其實，在我投入小說的世界裡時，東方白並不會存在過。那些情節之所以會那樣發展，只不過是藉他的筆記錄下來而已。我面對的，是一個歷史的再現；那些人物不是被創造的，而是自始就以獨立存在的方式活在這個人間的。

正因爲如此，我總覺得小說中的三個家族，使我充滿了同情。在那挫折的十年裡，我從他們破碎的身世找到了希望。無論是丘雅信，或是江東蘭，或是周明德，在時代的波濤中，他們都能夠恰如其分地表現堅定的毅力。他們象徵分散了的台灣的歷史命運，在天涯，在海角；但是，他們又能夠適時拾回自己最初的生命力。穿越了兩個痛苦的時代，橫跨了四、五

個陌生的土地，他終於克服內在的恐懼與外在的壓力。

他們的遭遇，似乎在影射我流亡的經驗，似乎在映照這一個時代每位離鄉背井，每位埋名隱姓的台灣人。每讀《浪淘沙》之際，簡直就是我攬鏡自照的時刻。待到東方白真正定稿寫出這部作品時，我的人格自我改造也已經完成。接到這部厚實的書籍時，我的心情已全然改觀。想起當初的怔忡猶疑，到今天的豁然達觀，我始領悟這部小說對我實具有非凡的意義。

寒風凜凜吹過荒涼的澳底，我以深情去體會那潮濕的風拂過每一寸肌膚的感覺。從東方面面迎來的風，滲透我零落的髮絲，侵襲我做開的頸項，那份感覺真正把我帶回了故鄉。將近百年前，台灣的先人也曾經在這沙灘迎接海洋襲來的風，也迎來日本侵略的軍隊，二十世紀的歷史潮流從此改道。東方白決定從澳底出發，這裏成爲他文學生命的里程碑，相信他也是爲了掌握那一份迎風而來的感覺吧。

「鹽寮抗日紀念碑」冷冷矗立在海岸上，經歷了多少寒風，聽盡了多少濤聲，但它並不能抵擋時光的流逝。我與東方白前來此地，當不只是憑弔已經埋葬了的從前；我們毋寧是瞭望開闊的地平線，迎接改造了的生命。東方白端詳那一片逆風的林投，眺望那一塊黯淡的沙灘，瞻仰那一脈藹藹的青山。從歷史深處走出來的他，必然比我更能辨識生死的意義。他整襟轉身，迎風走向岸前，靜靜凝視著浪淘沙。

——《自立晚報》一九九一年二月

## 邊界外的怒潮

### ——我所難忘的郭倍宏

六〇年代以降的許多台灣知識份子，只要懷抱一個年輕而遙遠的夢，總會選擇離家出走的方式，到他鄉去追求實現。凡是到達異域的，他們的夢與理想都經不起現實巨輪的輾壓，幾乎沒有人能夠免疫於挫折與幻滅。

#### 揭開黨國的假面

郭倍宏遠赴北美留學以前，通往海外的道路上，早已發生過無數傷痕累累的故事。不過，郭倍宏的雄心壯志，使他充滿了自信，也使他克服了許多疑懼。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他終於踏上了離鄉背井的舊路。那時，台灣才經歷過美麗島事件的風暴；跌宕的政局，對他似



乎沒有產生多大的衝擊。他從學生時代就苦心經營起來的願望，仍然保持得完整無缺。

然而，他手捧的精緻的水晶夢盒，在抵達北美之初，立刻就碰撞得粉碎不堪。就像所有前行代的留學經驗那樣，他的憧憬與嚮往，最後都宣告凋萎。只是，郭倍宏所穿越的歷程，與其他留學生，稍有差異。他舊有的價值觀念之崩陷，不是漸進的，而是在一夜之間全然瓦解。當他發現所謂黨國尊嚴竟是一個假面時，他內心爆發出來的憤怒，猶如咆哮的火山。

台灣灌輸給他的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是一種玻璃迷宮，看似透明清澈，實則沒有出路。郭倍宏打開他自己的出路，便是以具體的行動擊碎這種虛幻的玻璃建築。他拋棄了偽裝的民族主義，也踐踏了空洞的國家認同，親自加入海外台灣人的政治運動。在走出校園後，他又成爲台獨聯盟的領導者。他的作爲，完全割捨了舊有的、腐朽的價值觀念。卸下枷鎖以後的郭倍宏，很快就朝著台灣歷史所要求的方向回歸。較諸其他留學生，他的行動還更充滿了希望與許諾。

他在政治信仰上所出現的劇烈起伏，原是戰後台灣知識份子難以逃避的共同經驗。只要對台灣社會性質稍有認識的話，終究會對體制教育所塑造的神話產生懷疑，並進而展開挑戰，最後必然會予以唾棄。這樣的精神對決，在郭倍宏身上進行得特別清楚而徹底。不過，他在思想上、行動上的宣戰，比起任何人還要明快俐落。他奮然投入台灣獨立運動的激流之中，而且在很短的期間內，就被公認爲運動中的領袖。

在這段轉折的過程中，他的內心想必也有一段慘烈的掙扎吧。至少，在他下決心「轉向」之際，應該會對過往的經驗進行痛苦的自我批判，也應該會對亡逝的時光懷有眷戀之情。然而，他對外所展現出來的格局，是果決的，是勇毅的，是義無反顧的。

### 投入最前線的新力量

我認識郭倍宏時，他在海外的政治運動中已是卓然成家了。當時，與他相遇於一九八四年美國中西部的夏令營。他留給我的最初印象，是熱情、豪爽、無懼。我想，他的樂觀性格，應該是參與政治運動的最佳資產吧。

對於參加政治組織的人士，我一向都抱持敬服之心。最主要的原因，我是那種不適合參加任何政治團體的書生，我的思考方式也很不適合組織的紀律與規範。正因爲如此，我總是艷羨於能夠度過組織生活、能夠分擔團體責任的朋友。郭倍宏在還未告別青春年華之前，就已經覺悟到要爲台灣命運尋找出路，甚至還參加了最前線的、最受當權者仇視的政治團體，這樣的抉擇不能不使我爲之折服。他的擔當還不止於此；當我獲悉他出任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時，就越加瞭解他是認真其事的，他比起我所想像的，還更果斷而堅定。

一九八五年初春，我蜷縮在北美的邊城自私地讀書。像極一位隱士，我已甚少談論政治。郭倍宏突然自東南海岸飛來看我，在友人的地下室，我見到風塵僕僕的他。我第一次知道，他是一位相當「惜情」的人。在他身上，我彷彿看到自己年輕時代的熱情；我想到自己當年留學之初，與統派人士、國民黨黨工激烈辯論的情景。郭倍宏在聚會裡的雄辯姿態，多

少也反映了台灣知識份子的焦慮。

在他與朋友討論之際，我靜靜觀察他活力充沛的言談。那時，我已感受到他身上所投射出來的領袖氣質；那種大將之風，在年輕人身上是很難找到的。對海外台灣人的政治運動來說，郭倍宏的投入確有不凡的意義。無可否認的，在他出現以前，台灣運動在香港、在日本、在北美已經發展二、三十年了。早期運動者離開台灣時，仍然深懷白色恐怖時代的陰影，他們對國民黨單元式、壟斷式的統治，持有原始反抗的決心；伴隨著這種統治而來的語言、教育、服飾和歌謠，都受到他們深惡痛絕的看待。那種抗拒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可以接受的。不過，他們所懷抱的故鄉之思，也隨著牢固的對抗立場而與台灣社會漸漸脫節。六〇年代與七〇年代的海外運動，其政治主張與戰略重心都是以海外社會的格局為主。要取向，很少是與島內政局有直接的、密切的關係。一個無可抵擋的趨勢是，海外政治運動者一方面與本土日益疏離，一方面其本身又逐漸老化，運動的前景遂開始出現瓶頸。

郭倍宏的適時加入，使這個慢慢凝滯的運動增加了新血；在戰略上與方向上，也注入了新的變數。郭倍宏應該是屬於後美麗島時期的留學生，他對台灣社會的體驗與認識，自然比起早期留學生還來得深刻而落實。當他進入海外運動的行列，就已經注定要改變運動的體質；就我所知，他參加台獨聯盟時，也有不少留學生跟著加入。他把學生運動的經驗，應用在政治運動之上，使得呈現老化的政治團體立即有了前所未有的生機。新的力量、新的視野、新的方向，終於又使海外台獨運動甦醒過來。這種翻滾的生命，在一九八五年以後，尤

能感覺出來。

### 雷霆萬鈞的回應

有一種庸俗的論調是，郭倍宏應該專注於他的學術研究，應該去尋求一份高薪的職位，應該等待機會回台奉獻，而無需在海外捲入政治的漩渦之中。這種學究式的書生之見，非常典型地反映了部分留學生的怯懦、逃避的心情。他們總是高估自己的學養與身分，總是珍惜自己的機會與地位，對於外在客觀現實的演變，可以冷冷的袖手以待。他們會理直氣壯的辯稱他們心也是朝向台灣的，他們有一天也會介入政治的，只是時機還未成熟罷了。這種「讓現實等一等」的心理，使他們成爲聰明的、冷靜的旁觀者。

但是，郭倍宏並沒有這樣的心情，他的危機意識比任何一位海外書生還來得迫切而深刻。他深知，客觀形式是不能等待的，而必須及時去迎接。一九八七年在華府，當他告訴我將學家遷往洛杉磯時，我可以瞭解到，他是有所爲而爲的。他不需要迎接新的形勢，他還有意要創造形勢。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那時候他的年齡不超過三十歲，正是生命裡處於顛峰的年華。

是什麼樣的因素使他對台灣時局體認得那麼透徹，這是我難以推測的。不過，台灣島內建黨的成功，他的許多朋友也都捲進民主運動的潮流，這些外在的條件自然而然而都在鞭策著他。然而，更重要的，他相信他受過國民黨欺騙後的幡然覺醒，才更是主要的動力吧。那種



心情，我是很能夠分享的，因為，我也曾經是那個龐大欺罔體制的受害者。我的思考方式與生命態度，會在三十歲以後發生劇烈的轉變，無疑是在根本幻滅後所產生的反彈吧。只是我覺得郭倍宏比我還執著，比我還更勇於行動。

他對當權者所進行的「報復」，誠然是雷霆萬鈞的。

### 反抗，可以使人心靈昇華，生命充實

他最執著的一面，可以從他主持的《台灣公論報》的工作看出來。這份報紙是台獨聯盟的機關報，每週出版兩期。在海外，辦報是一種拚命的事業；至少在台灣人的社區裡，沒有人是成功過的。郭倍宏當選聯盟主席，就毅然承擔起這份機關報的發行工作。在資源與人力的缺乏之下，他與他的妻子舜華都住進報社，夜以繼日使報紙能夠順利發行。那時，他的孩子還在稚齡，但也都與他們夫婦留宿在簡陋的報社裡。

我深深感動於他的苦撐。對於他的決心與堅持，我不能不給予我最誠摯的支持。在他主持報社的期間，我幾乎毫不間斷地為他每期的報紙撰寫政論。即使在我身心俱疲之餘，我也勉力趕在他截稿之前傳遞過去我的文字。原因無他，我只想讓他知道，他並不寂寞；在夜深人靜的異鄉，仍然還有一位朋友陪他度過漫長孤獨的時光。

我是這樣相信著：反抗，可以使一個人的心靈昇華，也可以使一個人的生命充實。當我對不義的體制進行批判時，那也是我的肉體開始淨化的一種過程。我的這種想法，郭倍宏應該也可能體會到的吧。這也是為什麼每次與他相見時，我總能夠感受到他的言行所放射出來的熱力。他的無畏無懼無邪，不就是迸發自內心的反抗力量所帶來的嗎？

### 返鄉，只是要證明他屬於台灣

在距離故鄉千里外的土地上，他表現出來的戰鬥意志，是無與倫比的。一九八九年初夏，我南下洛杉磯參加一個講習班。在一個夜裡，我與他有了一次長談。他靜靜地告訴我，他已決定在那年的選舉之前回到台灣。初聞之際，我多少是有些訝異的。然而，回想他幾年來的果敢行動，我反而不覺得是意外的。當他說了，他一定就做得到的。自認識他以來，我知道他的任何自我許諾都能夠付諸實現。他曾決定要競選聯盟主席，果然就成功了，他也曾承諾負起辦報的責任，他也真正接棒過來了。那麼，當他提起要闖關回台，我並未有多大的懷疑。

倘若我有任何憂慮的話，那就是擔心他的安全。事實證明，我的牽掛是多餘的。在情緒翻滾的選戰於島內展開時，忽然從海洋的另一邊傳來他安然回到台灣的消息。那份信息猶如驚雷，震撼著每一位海外台灣人的心。他的闖關成功，對於一個貌似莊嚴實則懦弱的政權，自是構成極大的諷刺。台灣的當權者，在國際社會毫無生存的餘地，卻仍然積極在台灣社會內部製造敵人。它把海外台灣人的返鄉運動，視為一種難以逼視的催命符。果然就在郭倍宏回鄉以後，權力人物賣命地遣送其鷹犬四處監視緝捕。他們看來是如此地勤奮工作，看來是



多麼具有辦事的效率，但是所有的忙碌卻只在顯示一切都是徒勞無功。

不久又傳來消息，郭倍宏在數千名鎮暴部隊與情報販子的窺伺之下，從容進出於政見發表會。他的沉著冷靜，再一次表現了無上的智慧。可以想像的，他所鼓起的風潮是無可抵擋的，他不但揭穿了統治者的虛偽面具，同時也高舉了台灣人的反抗旗幟。他的返鄉行動，為海外政治運動者帶來了無盡的想像。他只不過要證明，他是屬於台灣的，台灣也是屬於他的。沒有人能夠分割他與自己土地的結合，從而，也沒有人能夠阻撓他的來去自如。

### 再一次實踐諾言

在我認識的年輕朋友中，郭倍宏是一位言行一致的領導者。他多年來的努力，已明白宣告一個新的時期的到來。只是他要把全新的精神與視野攜回台灣，因為，他並不是自滿於在海外的活躍。台灣命運的解決，絕對不可能在異域可以獲致的。離開了自己的土地，對於台灣的出路問題就難以有發言權。郭倍宏對這問題的思考，想必比任何人都還清楚。

他這兩年來提出「遷盟回台」的主張，正是他深思後的另一次行動。如果這是他最新的、最大膽的許諾，那麼他要實踐這樣的諾言，絕對是可以完成的。他說到做到的性格，必然可以突破許多未知的困難。

自一九八〇年以來，我在台灣的邊界外已經見證了太多的怒潮，怒潮之跌宕，根源於台

灣社會之難安。只要不公不義的體制還繼續存在一天，衝撞的激流就一定不止不休。郭倍宏所帶起來的高潮就快要擊打台灣的海岸。擅長於推波助瀾的他，將會使時代的潮流出現新的方向。

——〈自立晚報〉一九九一年九月三日

## 無花的墓園

台灣北部的群山裡，深鎖著一座墓園。那與世隔絕的墓園，我曾經把它當做我自己生前死後的象徵。我的生，是由於那墓室裡埋葬了一齣悲劇；我的死，也正是那悲劇埋葬了我的從前。

從蘭陽平原到深山裡，僅是一小時的路程，但那彎曲而驚心的道路卻是我十年來心路歷程的投射。突現的斷崖、陡降的山溝、驟起的坡道，寫滿了我過去生命地圖的起伏。穿過絕望的幽谷、跨越希望的高峰，我的跋涉都朝向那迷霧中的墓園。那墓園，不是我漫長旅途的起點，也不是我的終點，而是改變我的意志與思考的一個轉捩點。

在前往的道路上，我分辨不清究竟是要祭拜墳中的靈魂，還是爲了追悼自己逝去的生命。我的記憶隨著盤旋的道路而顛簸浮沉，彷彿陷於迷宮，看不見出路。我的困惑，是十年來的困惑，爲什麼那冰涼匕首必須放逐兩顆小小的、等待成長的靈魂？我的苦悶尚不止於此，爲什麼這樣的困惑跟隨了我十年，卻從來找不到答案？

放逐者得到回歸，乃是一種幸福。對於永不得回歸者，則是一種永恆的懲罰。經過十五年的異域流浪，我終於踏上了自己的土地，是不是應該感到幸福？這是我難以回答的問題。我回到纏綿苦思的家鄉時，許多舊夢其實已都煙消雲散；我自己在他鄉已被徹底改造，而我的土地也完全改變了它的性格與風貌，回到台灣時，我反而變成了異鄉人。對於這樣的異化，我覺得痛楚，但不感到悲傷。歷史總是要改變一切的，我的回歸並不是爲了眷顧過去；我決心要回來，其實是爲了瞭望台灣的未來。只有看到現在台灣社會的脈動，我才能感知即將發生的變化。

然而，我有不能不感到悲傷者。歷史向前轉動時，竟然要以諸多無辜的性命做爲犧牲，那並不是魯迅所說的「淡淡的血痕」就能概括。倒在血泊中的，是純潔透明的靈魂，是崇高的時代良心，是掙扎的歷史命運。永不歸來的，又豈止是生命而已，人間的正義、理想、希望似乎也不再歸來。

淡淡七月的台灣，絲毫沒有使我感到溫暖。車子越接近墓園，越使我回到一九八〇年的寒冬。在大雪下降的日子裡，淒厲的呼喊，混合著冷酷的匕首寒光，越過海洋，襲擊我毫不設防的胸口。在消息傳來的刹那，暈眩的雪花，蕭瑟的北地，彷彿都在反射我內心的一片茫然。我第一次發現自己的脆弱無力，望著廣漠浩瀚的雪地，我被凍成最孤單、最絕望的冰柱。想到一對學生的女孩，在面對冷冷發光的刺刀時，她們那種無助、恐懼、顫慄的心情，

我內心釀造了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風暴。

那麼苦痛的記憶，使得車窗外的蒼翠林木變得虛幻無比。專注於駕駛的永興指著山下說：「看，蘭陽平原就在那裡。」我側首瞭望，遠處浮起一條迤邐的海岸線。翻滾的白浪，襯托出東海岸的蔚藍，溫柔的沙灘伸向最遠的南方。昨夜我們就在那裡投宿，聆聽了平原最寧靜的夜。就是那一片土地，容納了我一顆不安的心，也盤踞了我騷動的睡眠。

蘭陽平原對我一直具有特別的引力。當年要離開故鄉之前，我曾經來此向台灣投下最後的一瞥，猶記得這一片動人的平原，以裊裊的炊煙與楚楚的燈光為我送別。我懷抱著台灣的形象在異域流亡時，交疊浮現在我夢中的，往往是這平原上櫛比的屋頂與水田的光影。十五年後再來眺望這片土地，蘭陽的美，依舊令我心折。這是台灣的最後一塊淨土，台灣先人的血汗，在這裡也保存得最為完整。但是，我不能不問的是，為什麼要讓人間最殘酷的苦難降臨在這塊土地上？

望著逐漸遠逝的平原，永興說，就快到了。在公路旁看到一塊寫著「林家墓園」的木牌，車子右轉上坡，折進一條泥土的小路。憑著記憶，永興很快就找到進入墓園的路口。若是在雨天，這條路想必是泥濘不堪。穿過百草雜生的彎道，我立刻就看見一片豁然開朗的土地，然而我的心也跟著凝結。

那是一座莊嚴的墳墓，從來沒有像這樣的墓園足以震懾我。從入口到墓地，是一排石板鋪成的小路，高聳的墓碑朝向蘭陽平原。墓前是一片空曠的草地，錯落有致地種植一些小樹，石板路旁邊則種植了杜鵑。同行的永興、琰玉，還有我的兒女宜謙、宜群，都站在石板路上凝望墓碑。

看著墓上的字跡，我不能不想起苦主的身影。一九七九年冬天，第一次在西雅圖與他見面。在寒霜初降的北國，一群人圍在屋裡與他討論故鄉的近況。他謙卑、親切的氣質，感染了每一位在座的客人。那時，他剛結束了美國的訪問，西雅圖是他返台前的最後一站。他堅毅、誠摯的談吐，使人覺得好像看到台灣社會的希望。即使是觸及台灣的不公不義體制，他仍然能夠平靜、詳細地提出他的見解。在海外習慣於激烈吶喊的朋友，可能不容易接受他那種溫柔敦厚的主張。但是，他並不辯論，也不駁斥，而只是讓人知道他是一位堅定的和平改革者。那場聚會使我特別難忘，我的難忘並非只是因為他的氣質，而是他臨行前表現出的自信，他堅信他的改革理想是可以實踐的，而且也願意為這樣的信念去奉獻。

然而，就在他回台灣後未及二月，美麗島事件就發生了，緊接著就是全島性的大逮捕，然後我聽到他也在被捕的行列。那段時間，好像任何事情都發生得很快。為了蒐集消息，我剪貼了不少中英文報紙，只希望能拼湊出一個較完整的事件真相。我也蒐集許多熟識的、未識的被捕者名單；我與朋友忙著譯出他們的生平與經歷，並且與各人權組織聯繫。

我知道那樣做是於事無補的，一個知識份子的軟弱無力，由此可見。我會做人權工作，與其說是為了伸出援手，倒不如說是為了拯救自己；說穿了也不過是要解除當時的不安情緒，並且也洗刷充塞在心中的愧疚。我從來不會想到，大逮捕只是序曲而已。一九八〇年二



月廿八日，竟傳來他的母親與雙胞胎女兒在白天被刺殺於家裡的消息。到現在，我還是找不到適當的字眼來形容我當時的震驚。我的心往下沉，沉到深淵，再也沒有什麼可以拯救我了。我彷彿看到一把利刃劃開天空，鮮紅的雨水浸泡了我的全身，我無處可逃，唯一的選擇就是滅頂。

通過了那場冷血事件，我徹底發現自己的一無所有。往後十年，成了我克服自己怯懦的漫長歷程。那種克服的工作是痛苦的、鬱悶的，但是每當我想到他的改革理想，以及因那理想而換取的苦難，我知道自己是沒有理由悲觀的。倘然這種緩慢的克服，是一種振作的話，我想我不是唯一這樣做的人。與我同一時代的青年，在台灣、在海外、在不同的時空，都同樣因這個事件而努力在尋找出路。我的幸運是，我終於沒有滅頂。我更幸運的是，見證了許多同一世代的知識份子開始集結起來。

我所面臨的時代，是扭曲顛倒的時代，人性的崇高與卑賤其實是沒有界線的，理想的真實與幻滅也找不到確切的定義。我穿越過的，是一片廢墟，是殘破的曠野。所以，更溫和善良的人，必須受到最嚴酷的報復；邪惡的權欲，是支配一切的統治力量，在這種體制下，是非的辨認已經沒有意義。倘然跨越一九八〇年是克服工作的起點，那麼我其實是在廢墟上重新收拾我的生命。

一九八六年暮春，我在洛杉磯與他重逢時，竟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當我找不到任何語言與他對談時，他再次以誠摯親切的語言解除我的不安。面對他，我才知道這個世界並沒有絕望過。穿過廢墟的，並不是我，而是他，一位對自己的信仰從未動搖過的他。

因為我從來就不會經歷任何苦難，我根本不知道如何為悲觀、為絕望下定義。我以漫長的時間去尋找悲觀與絕望的出路，那是因為我本來就把自己監禁在精緻的閣樓裡。我依照被顛倒的價值去設計一個美好的世界，也根據一個被扭曲的思想去創造一個未曾存在的現實。我所看到的一個無懈可擊的社會，只不過是從我內心投射出去的。我的痛苦掙扎，完全是由於我前半生的自囚、自滿與自負。

再次看到他，我端詳他明朗的前額與寧靜的眼神。他流露出來的氣質，使我強烈想起蘭陽平原，安謐而無憂。在他身上，我看不到災難，我只感覺到一股熊熊的火在激勵我。他曾經有過的煎熬，他所遭受的凌辱，未嘗在他的衣袖留下痕跡。我想到自己多年來克服工作，無疑是卑微而可笑的了。當他浴火重生時，他已喚醒了不少自責的靈魂。

一九八八年冬，他驅車北上來聖荷西與我相聚。這時，我已比較能以著從容的心情與他對談。我第一次瞭解他這幾年來的思考，我也第一次真正體會他多年來常常說的一段話：「隱隱地看到一個充滿喜樂的世界，在那裡心靈得以擴展，希望無窮，任何高貴的行爲，都不會被曲解為企圖達成卑鄙目的的手段。」在那次相聚時，我並沒有告訴他，有一天我若能回到台灣，一定要到那墓園朝拜。我要超越死亡，去看一個充滿喜樂的世界。

站在墓園的石級上，我撫摸著粗礪的石牆，沉思十年來自己的浮沉。我終於覺悟到，墓室裡的靈魂其實不曾死亡的。她們所象徵的純潔與良心，不就引導我走過漫長的流亡道路

嗎？她們只是換了一種形式鼓勵我、鞭策我。她們可能是暗夜裡的星光，可能是窗外的一陣微風，也可能是偶爾飛過的鳴鳥，使我在苦悶時看到了希望。倘若這麼長久的時間，我全然沒有敗北頹廢，不就是由於她們冥冥之中的許諾嗎？果真如此，她們早已回到人間。

從石級俯視這一片墓園，陽光照耀得非常豐盈。我發現，滿園的綠樹青草並沒有一朵花。我多麼希望墓室裡的女孩，能夠暗示她們的歸來，即使是以一朵小小野菊的暗示。但是，尋遍墓園，我始終都沒有找到。我看見宜謙、宜群蹲在草地端詳，似乎是在辨別植物的種別。他們都是在異域出生的，我第一次攜他們還鄉。對於家鄉的一草一木，他們都帶著好奇。看到他們蹲在那裡，我錯覺地以為他們是在與墓室的靈魂對話。我的孩子，自然知道這個墓園的故事；但是，他們還不足以瞭解這個島嶼的悲劇命運。生為台灣的孩子，他們有一天會知道的。

從北宜公路，經過大坪林，回到台北盆地，回到一個不快樂的人間。在這裡，才是充滿了死亡，充滿了扭曲的人性，充滿了橫流的欲望。「隱隱地看到一個充滿喜樂的世界」，是在未來，而不是現在。因為是屬於未來，所以我必須振作，更必須使心靈擴展，使希望無窮。我投入了紅塵，十年來的苦痛、憤懣、挫折，都投宿在那群山裡無花的墓園。

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五日 聖荷西

——《噶瑪蘭》第一二六期、一二七期合刊，一九九〇年三月一日

## 島上最前線

### ——為陳婉真而寫

1

洛杉磯時期的美麗島戰友，曾經在週報出刊的第一天合攝了一張相片。那是在《美麗島週報》的編輯辦公室裡拍照的，時間是一九八〇年八月廿六日。盛夏的南加州谷地，在夜晚仍散發著沉悶的餘溫。相片裡的每位工作者，都穿得很簡單，看來不是很正式的一張相片。許信良、張維嘉、陳婉真、陳昭南、我，還有一些不願露名的年輕朋友。黑白照片已經泛黃，彷彿是遙遠的年代存留下來的，大家聚集在一張骨董的沙發椅前，後面是一個廢棄不用的火爐；每個人面帶微笑，充滿了信心。只因爲那天第一份報紙剛剛出版，興奮之情似乎在每個人身上傳染著。

辦公室坐落在洛杉磯東郊的墨西哥裔社區，是一幢陳舊斑駁的木屋；油漆已經脫落，露

出暗褐色板的顏色。那社區的膚色單純，放眼望去，都是操西班牙口音的墨西哥人。不過，往來的人卻很複雜，由於是類似貧民區，販毒、凶殺、色情、賭博的事件常有所聞。編輯室設在那裡卻最安全，只要有不同於墨裔的人種出現，立刻就可辨認。在那段時期，台灣處於風聲鶴唳的階段，遠在海外的《美麗島週報》信箱，常常可以收到恐嚇信件。揚言投擲炸彈者、聲稱阻街謀殺者、口出穢言髒話者，大有人在，那種氣氛，令人不寒而慄。正因為如此，編輯室設在那個複雜的地區，反而覆上了一層保護色。

陳婉真是創刊初期的總編輯，她前後約主持了八個月。我與她的共事經驗，就是在這段時期。婉真的工作效率高，行動力很強，果斷明快是她的辦事態度。在海外政治運動的女性同志中，她可以說表現得相當非凡。當時爲了躲避耳目，辦公室裡彼此都以化名稱呼；在發表文字時，也使用多種筆名。唯獨許信良與陳婉真撰文時，都是使用本名。對於剛剛離開校園的我而言，確實出自心底佩服她的勇氣。

我從留學之初，就已開始關心台灣的政治了。在北美西北的邊城，曾經遇見過各路派系的運動者。我也認識了頗爲不少的激烈批判者，他們總是以匿名與人交往，以理論抨擊運動得失，以偽裝方式吸收同路人。他們躲在暗處保護自己，從來沒有表現任何的行動力。直到與婉真工作之後，我才第一次瞭解到什麼叫做政治運動。我欽服她的熱誠、坦率。她是屬於這樣的人，幾乎不隱藏自己的任何想法。較諸我早期窺見的那些激進人物，婉真可以說是相當傑出的。以她的膽識、見解與視野來看，她原是可以成爲一流的新聞記者。她撰寫新聞稿

之快捷與精確，令我開了眼界。從來不曾接觸過新聞界的我，如果在那時學習到了一些掌握消息的訣竅，那麼我必須承認，婉真誠然啓蒙了我。《美麗島週報》從創刊開始就已陷入了困境，這樣的困境包括了財源的短缺、人力的缺乏，以及內部路線的分歧。然而，在人事擾攘的日子裡，婉真仍然能夠使報紙準時出刊。特別是迎接一九八〇年底台灣選戰的期間，她克服了許多訊息傳遞的困難，自島內源源獲得第一手資料。憑藉著那些消息，我們得以較爲準確地分析那次選戰的得失。

工作到深夜時分，洛杉磯谷地已沉浸在寒冷的大陸性氣候之中。我看見婉真在燈下揮汗剪貼畫線，那種專注的精神，表現她執著的一面。現在回想起來，那樣的工作不知爲整個運動帶來了什麼。然而，當台灣民主運動進入挫折的階段時，遠在海外的我們，只不過希望能夠爲台灣發出一些聲音。儘管聲音是如此微弱，但是在那最貧困的時候，我們已是盡了最大的努力。一九八〇年的選戰，是台灣選民對美麗島事件第一次以投票方式給予重審。猶記得連續好幾個星期，都是作業到深刻，在那次共事過程中，我深深體會到婉真在意志上的堅持。有一次跟她談話，問她爲什麼這麼堅持？她說，只要對國民黨的統治本質稍有認識，最後都一定會走上反抗的道路。

反抗，是爲了爭回公義，其他別無所求。在政治運動中，有人退卻了，有人轉向了，有人妥協了，也有人迷失了。婉真不但沒有改變她最初的反抗決心，相反的，她表現得越來越堅定。跨過一九八〇年以後，婉真開始與許信良有了摩擦；對於他們之間的決裂，我至今仍



然感到遺憾。其間的錯誤與矛盾，非簡單的語言所能交代，而且也不是在這個時候能夠解釋清楚的。外界總有許多傳言，甚至把他們之間的衝突，化約為政治之爭，這是我難以苟同的。許信良的政治路線確實有過數度更迭，但他沒有違背台灣人的立場，沒有出賣台灣人的利益，則是可以肯定的。婉真與他出現矛盾，絕對不是發生在立場的問題上。不過，也正是因為經過了那次決裂，婉真終於離開了《美麗島週報》。我是在她離開之後，接任了總編輯的職位。我要說的是，婉真雖然不再做報紙工作，但她並不因此而偏離了她當初反抗的決心。

在洛杉磯的許多政治場合，我還是常常看到她活躍的影子。一位鬥士，在什麼樣的時空條件下，都是可以進行戰鬥的。婉真不是那種輕言放棄的人，一旦她展開了戰鬥，就會不止不休。不久，她就與其他的政治運動者，組成了出版社，發行《台灣新社會》月刊，對國民黨體制繼續進行解剖批判。我雖然很少與她聯絡，但我可以瞭解，我們都是站在同一陣線的。

## 2

最初聽到她闖關回台時，我頗為訝異，那是一九八八年的事。當時，我與她已失去了聯絡。她被桃園機場情治人員暴力驅送時，那幕鏡頭深深刺激了我漸漸遲鈍的情感。統治者加諸於她身上的羞辱，並不是針對她個人而已；全體台灣人的尊嚴事實上也受到了粗暴的侵

犯。做為她的同志，我的內心自是憤怒無比。她再次回到美國之後，我與她重逢於平原區的夏令營上。她在那次公開演講，表示她還會以她的方式回到台灣。多年不見的婉真，看來更為勇敢而堅定。當她那樣自我許諾時，我幾乎可以斷定她的下次行動就在不久。

一九八九年鄭南榕自焚，為台灣獨立運動帶進了全新的階段。我沒有想到就在南榕出殯的日子，婉真竟然出現在送葬的行列。她神奇的出沒，使我第一次發現她的高深莫測。為了向南榕致敬最高敬意，為了對台灣獨立的信念表示最堅定的支持，她冒著旅途的風險回到台灣。她的行動立即戳穿了國民黨法律的虛偽性。當國民黨獲悉她回來之後，「依法偵辦」的聲音不絕於耳。如果沒有婉真的歸來，台灣的法律簡直是不存在的。婉真回來了，終於使國民黨有工作可做。對照於權力人物的忙碌，婉真反而表現了無比的從容。

就在那年，我第一次獲得返鄉的機會。在台北，與婉真相遇於陳永興的家裡時，我不免有做夢的感覺。想到八〇年代初期的共事，我從來沒有預知有一天將會在台灣重逢。在洛杉磯的困苦時期，對於回到台灣的期待，我總認為是一種奢望。當《美麗島週報》在創辦五年後終於解散時，所有的運動者都流落在天涯海角。沒有人敢於期待，有一天將會在台灣聚會。

在那次的重逢，婉真鼓勵我早日回到台灣。她的言外之意，我自然是能夠體會的。要反抗統治者，絕對不是停留在異域就可以做到的。她回到台灣的目的，就是直接要與國民黨對決。果然，在短短兩年內，她在台灣造成的風潮，早就已超過了許多運動者的格局。她的運

動方式，是沒有規矩可言的；只要能突出統治者的荒謬與悖理，婉真便會著手去做。

就在婉真成功回到台灣之後，《美麗島週報》的戰友也陸續回到自己的土地。許信良在海上遭到攔截，陳昭南則在機場無端被捕。回家的方式誠然都有不同，但是每個人所承擔的台灣曲折命運卻是同等分量的。我深深感受到，當年在洛杉磯會盟時，就已經確立了每個人的戰鬥目標。每位戰友到今天仍然固守在反抗運動的陣營之中，而未嘗稍有動搖。婉真是第一位登陸成功的；她的成功預告了一個可能，那就是運動重心終於轉移到台灣本土。台灣獨立運動不再是島外的了，而是成為台灣民主運動的主流。婉真的行動，就在於塑造這樣的象徵意義。

她不僅協助郭倍宏回到台灣，而且也協助整個遷盟回台的行動。她創造出來的格局是如此巨大，終於不能不成為國民黨的第一號假想敵。就像她以往的透明行動，婉真在建造台獨運動的架構時，全然不做任何掩飾或偽裝。她公開掛起招牌，公開招兵買馬，公開進行活動。她的行動，完全不把國民黨放在眼裡。

今年八月，婉真悍然抗拒國民黨情治人員的逮捕。在二十一天的對峙中，她不眠不休進行各種防禦工事。由於她的堅持，國民黨的法律矮化、醜化、異化了。我未曾見過如此堅強抵抗惡法的運動者；她行使的只不過是基本人權中的抵抗權，然而，國民黨動用的鎮暴部隊、消防車隊、便衣警察，卻顯得束手無策。遠在海外，知道她積極為人格尊嚴展開護衛戰爭時，我內心其實是驕傲無比的。

不過，我也不能隱藏我的憂慮。在她築起的堡壘裡，置放了許多汽油。這使我想起鄭南榕自焚的前夜，我確實擔心她會步上南榕的道路。我終於忍不住給了她越洋電話，告訴她必須尊重自己的生命。我不能像其他的運動者，鼓勵她走向壯烈的途徑。生命是她自己的，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慫恿她選擇犧牲的絕路。她在電話上平靜地告訴我，她不會自己引火的；如果室內的汽油燃起時，那一定是來自國民黨警察的槍彈。聽她那樣說時，我稍覺放心。只是放下電話後，我反而更加忐忑不安。

於是，我又寫了一封信傳真給她。我說：「做為台灣人是很難謙虛的，特別是面對國民黨的挑戰時。但是，在生命的尊嚴之前，有時我們是應該謙虛的。」說這樣的話，我只不過想讓她再思考生命的意義而已。我當然知道這段文字並不可能改變什麼，不過，我既然自認為是她的同志，就不能不說出我的忠告。我在信上又說：「你必須維持健康的體魄與旺盛的生命，才有可能繼續與國民黨對抗下去。在目前的情況下，只有你能做最佳的判斷與最佳的決定。尊重你自己的生命，才能尊重全體台灣人的生命。」我之所以要說這些多餘的話，為的是不願意見到她輕易犧牲。

一位運動參與者的孕育，是必須經過長期的試煉與考驗。對我而言，婉真是戰後以來台灣民主運動一位不可多得的鬥士。我並不因為是她的朋友，就特別推崇她。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婉真的運動氣質誠然有異於他人之處；這種氣質，正是運動中最需要的。我只期盼她能帶動更多的後來者，能夠繼續開發更多還未啟蒙的人。

## 3

洛杉磯時期拍攝下來的照片，已經泛黃了，恐怕婉真也已經遺忘了；那可能是美麗島戰友唯一留下的團體照。婉真也許不會珍惜那樣的記憶，因為她是勇往前的人，她很少在奔波的道路上回首的。我只想讓她知道，她的每一次戰鬥，對我都是一次警醒。

我越來越覺得，美麗島戰友之所以堅守反抗陣線，似乎在冥冥之中，彼此在相互比賽競爭，看看誰的表現最佳。經過這十年的長程比賽，婉真證明是站在島上的最前線，在保護人權的尊嚴上，她做得最為完美。她把消極的抵抗權，化為最積極的行動力量。她的二十一天抵抗行動，顯示了台灣人未曾屈服的品格，也顯示了她真正如何去愛惜自己的生命。整個運動的背後，暗示了她對台灣人民、土地的熱愛。這樣的意義，將會隨著時間的拉長而加深色澤。

婉真與我的生日相同，都是六月十日。但是，她小我整整三歲。她開創的局面，鋪陳的行動，卻超越我十年以上。她站在島上的最前線時，我才正要急起直追。

——《自立晚報》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 屬於台灣的驕傲

聽到沈富雄在台灣被捕的消息，我第一個立即的反應是，台灣政治的和平改革又進入了黯淡時期。如果像沈富雄這樣溫和、這樣堅持改良主義信念的知識份子，都無法躲過屈辱性的逮捕與監禁，那麼幾乎每位善良的百姓都有可能被羅織入罪。從斷續的越洋電話，從他家屬傳來的消息中，就可知道這是早經縝密設計的政治案件。這個事件的發生，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之外。

他當初回到台灣時，我給予了最大的祝福。在那之前，他已多次與我討論決定辭去華盛頓大學教授的職位，他願意把自己的專長與智慧奉獻給台灣。坐在他濱湖的住宅，我們一起遠眺華盛頓州的雷尼爾山。我總覺得，在這樣的山光水色裡，談論中的台灣是很虛無縹緲的。當時，我對他返鄉的意願不免帶有懷疑；我甚至在內心裡忖度，他只不過像其他所謂的歸國學人那樣，僅是回到台灣做短暫的停留。



在華大校園裡，他是一位頗受歡迎的醫學教授，醫學院的同事對他持有一份近乎敬畏的尊重。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具備了淵博的知識和敬業的精神。以他的勤奮、資歷與成就，沈富雄要在美國建立學術上的鞏固地位，原是輕而易舉的事。這也是為什麼他告訴我決定回台時，我抱著懷疑的態度。但是，他最後都割捨了世俗所艷羨的名利，毅然回到他慕戀的鄉土。

更使我訝異的是，他是隻身返台的。他的妻子與孩子仍然留在西雅圖。他說，等兩位小孩上大學之後，他的妻子也將一起回到台灣。這更可襯托出他返鄉心情之強烈。

他的行動，使我感到驕傲。這位激勵我、關心我的朋友，比我更早克服家庭親情，真正懷抱著他的理想，攜帶著過人的熱情，投向台灣的土地。

如果說沈富雄是我的親密戰友，這是言過其詞的說法。在我的內心，他毋寧是一位兄長般的誼友。我一九七四年到達西雅圖不久，就與他認識了。他之引起我的注意，乃是他對台灣歷史、文學、政治的瞭解，超乎常人之上。台灣教育體制塑造出來的書生模型，往往非常精確標準，一個醫生就是一個醫生，一個工程師就是一個工程師。在他們本行之外，很少知道什麼是人文修養。同樣的，當一個歷史學徒被訓練成歷史學徒時，也總是不知道什麼是科學精神，什麼是邏輯思考。

沈富雄的思考與行動，全然粉碎了台灣的教育模型。我在西雅圖認識的另一位學理工的鄭紹良，對於文學涉獵之深入，也是我朋友中少見的。鄭紹良至今仍被列為黑名單人物，已經在海外流亡了三十年。相形之下，沈富雄似乎還是「幸運」的。

我在海外讀了不少被台灣列為禁書的作品，其中有一部《金陵春夢》，便是從沈富雄處借閱的。他博學強記，聰明過人，只要是他讀過的文字，幾乎很少遺忘。我後來聽說，沈富雄在台南一中時代，就是成績頂尖的人物。後來他保送台大醫學院，更表現他的知識學養。英文裡有一個名詞是「照相記憶」(photographic memory)，大約等於中文裡的「過目不忘」，沈富雄便是具有這樣的能力。

在這樣的能力之外，沈富雄還有另一份魅力，便是他完全不是關在象牙塔裡的書生。對於家鄉的政情變化與社會起伏，他總是保持密切的觀察。我常常在課餘之暇與他相聚，那時他還住在西雅圖半山腰的兩層木屋。從落地窗，可以俯望整個華盛頓湖。在夏日、在雪夜，我們有過長談；每次話題必定離不開台灣。倘若西雅圖的求學時期，可以視為我生命中最為寂寥的階段，沈富雄應該是協助我克服孤獨的一股主要力量吧。

他的政治思想，其實相當簡單樸實。他追求的，便是使台灣成為尊重民權、尊重人權、尊重生命的地方。他的專長是在醫學方面，因此他常常提到如何把他理想中的醫療制度介紹到台灣。他始終認為，台灣之所以不能建立一個健康的制度，癥結就在於長期沒有解決政治問題。要解開台灣政治的死結，他深信，就有賴於台灣全體人民的共同意志來努力，來尋找出路。

在整個七〇年代，我們有不少時候一起度過苦悶的時光。從一九七五年《台灣政論》被

禁之後，我們就爲了關心言論自由與基本人權而提出一些可行的方法。他的住處，是台灣同鄉的集散地。在聚會中，有爭辯、有討論，沈富雄是當然的意見領袖。他的思考深沉，見解獨到，再加上他爽朗率直的性格，使得每一次聚會從來沒有冷卻過。

七〇年代誠然是苦澀的，一九七七年的中壢事件、一九七八年的台美斷交、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像極一波波洶湧的海浪擊打著我們的胸坎。爲了這些難以釋懷的政治事件，我們與西雅圖的朋友一起去遊行示威，一起去散發人權傳單。在距離台灣那麼遙遠的邊城，我們所做的也許不能使家鄉感到溫暖，但至少我們想要證明，台灣是不會沉默過的。

尤其是美麗島事件發生時，一場寒冽的政治肅清沉重擊打著島嶼。大部分的同鄉都投入了人權救援工作，那時荷籍朋友 Gerrit van der Wees 與他的妻子陳美津全心發行一份稱爲《台灣公報》的英文人權刊物。我協助蒐集有關事件的中文資料，沈富雄則默默在精神上、物質上給予強力的支持。在那翻滾的政治事件中，我第一次感受到所有的台灣人，無論是熟識的或未識的，無論是島內或海外，無論是遙遠或親近，是如此溫暖而緊密牽繫在一起。

美麗島事件對我個人的衝擊，至深且巨。一九八〇年春天，我決定南下創辦《美麗島週報》時，唯獨沈富雄私下給我許多鼓勵的語言。在那段淒厲的日子裡，大約只有他能夠理解我的心情。我們之間曾經發生過高亢的辯論，但相濡以沫的時光還是居多。沈富雄大我八歲，他對我的一些責備與批評，其實是一種期許，也是一種鼓舞。

離開西雅圖，我有一種無比的、無言的感傷。我很清楚，那是我向自己的少壯歲月的正

式告別，也是我價值觀念完全崩潰、完全重整的一次割裂，更是我學術生涯的一次終結。令我更感傷的，則是許多苦澀時光裡所醞釀出來的溫暖友情，都將只有在記憶裡去追索。

在西雅圖的朋友中，唯一與我繼續保持通信的，便是沈富雄。對於我主編的報紙，他的意見最多，指責也最強烈。但是，最支持我的，也是他。我第一次發現，友情並非只是用來取暖的。真正的友誼，必須通過辯難、砥礪、磨練、鍛鑄才會更加牢固。沈富雄給我的經驗正是如此，遠在洛杉磯那個陽光城市裡，這份友誼使我更加珍惜。

他第一次告訴我有意返台定居，是在一九八四年。我最初以爲，那只是他蠢蠢欲動的中年心情。我知道，他是所謂黑名單人物，即使他回去，至少他也不可能拿到簽證。然而，就是從那年開始，他就不斷爲返鄉而努力。他告訴我，他是如何與辦事處的人員爭吵；從他理直氣壯的語氣，我才知道他是認真其事的，他返鄉的意志是相當堅定的。

一九八六年，我搬到聖荷西定居時，他終於通知我，他將回長庚醫院服務。他並說，這不是短暫的居留，而是在台灣長久住下去。他的做法，許多人難以理解，因爲，台灣的醫生總是竭盡思慮離開台灣，沈富雄則是反其道而行。不過，從我認識他以來，他所表現出來的台灣情感，早已預告了他的抉擇。他重複說過，要回到台灣支持民主運動，要把他理想中的醫療制度帶回台灣。他說，如果他能經營醫院，則所有收入的利益要與護士、工作人員一起分享。他行有餘力，一定資助獻身於台灣社會民主運動的人士。

他回到台灣以後的所作所爲，我不甚了然。不過，從他的妻子洪螺每次給我的電話中，

我知道他確實是依照他對自己的承諾去實踐。每當他回西雅圖度假時，他總會給我電話，告知他經營醫院的情況，也與我討論台灣政治發展的情形。他熱情洋溢的談話，未嘗稍改。他返台的抉擇，顯然是正確的。他說，他這一生從來沒有那麼開朗愉快，因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還落實，還更有歸屬感。在談話中，他不忘告訴我，他也參加遊行，參加募款活動，參加一些政治性的集會。

當台灣的醫生大部分爲了攫取巨利而鑽營時，沈富雄看來好像是不務正業。他的性格，酷嗜伸出援手；對於弱小者，具有高度同情心。他的收入所得，大多捐給他認爲值得支持的政治團體。這樣一位熱心於政治活動的醫生，自然就引起特務的注意。台灣官方的辦事能力，一向令人詬病，只有在對人民的監視上特別具有效率，是足可引以爲豪的。

去年九月，他又返美與家人相聚，並南來探望他在史丹福大學就讀的兒子。他來我住處過了一夜，那是我離開西雅圖後，我們長談最久的一次。他鼓勵我回到台灣，並且希望我能辦一份高水準的刊物，他承諾願意負擔一切財務。他的建議，頗令我心動。我告訴他，我會好好考慮這件事。

在那次相聚中，他也提到，在台灣的朋友慫恿他出來競選公職。我隱隱感覺到，他最後一定會親身介入政治運動。他滾滾的血液，流回台灣以後仍然沸騰不已；那股衝勁，自然而然引導他走向更爲積極獻身的境界。

這次沈富雄在桃園機場被控以「走私闖關」的罪名而遭拘押，足證國民黨對他的注意是極爲密切的。他被監禁之後，就立即受到拷問，要他清楚交代在台灣的政治關係。可是，國民黨對外發佈消息，先是誣告他「攜帶禁藥」，然後又捏造他「私藏槍械」。一項精心設計出來的政治案件，竟然要用法律問題來包裝。

沈富雄被捕事件的背景，是很清楚的。今年年底，國民黨被迫要舉辦所謂「委任國代」的選舉。爲了防止民進黨徵召海外同鄉回台參加競選，國民黨已經制定好法律，不准「外籍僑胞」回台設籍。有這樣的法律，仍然還是不能放心。國民黨對已經在台設籍的海外同鄉，刻意給予扭曲騷擾。沈富雄當初返台之前，國民黨拒絕給他簽證。等到他回台以後，國民黨又不准他在台灣登記戶籍。這種種阻難，最後都被沈富雄克服了。如今，他是台灣的公民，結果國民黨更進一步予以羅織入罪。沈富雄被拿來做爲今年政治選舉的一個樣板，企圖使海外同鄉放棄回台競選。

我不知道沈富雄會被監禁多久，這可能有賴國民黨的政治需要而定。只要這項逮捕是不義的，則即使只是拘押一小時，都是違反基本人權的。國民黨有意要在「禁藥」與「槍枝」的問題上轉移人們的耳目；經過這種工於心計的誤導，國民黨就可以使一位關心民主前途的醫生陷於身敗名裂的境地。

這兩年來，我的朋友一一遭到逮捕與誣告。從陳婉真、許信良，一直到陳昭南，國民黨使用的罪名千奇百怪；唯一不變的，便是對基本人權予以高度的迫害。如今，國民黨更上層樓，對一位相信和平改革的醫生也保持無可告人的興致。台灣民主道路的漫長與艱難，由此



可以推知。

沈富雄遭到的羞辱，將喚醒更多知識份子對台灣黑暗政治的注意。台灣社會即將要進入廿一世紀，但統治者卻仍自甘於停留在十九世紀。時代的巨輪，是與求變的人民意願同步前進的。拒絕向前走的統治者，必被巨輪碾過。在鐵窗裡的沈富雄，不是坐牢，而是見證；他見證了統治者的墮落。歷史將證明，統治者，屬於冰涼的鐵窗；沈富雄，屬於驕傲的台灣。

一九九一年元月十五日 聖荷西

——《自由副刊》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九日

## 涉渡

——序林衡哲選集

1

我的遠行，發生在一九七四年秋天。離開台灣，猶如告別育我哺我的母親，內心充滿畏怯。我好像是一艘初度涉水的船隻，既擔心沉沒，又恐懼觸礁，也害怕迷航。就在收拾行囊之前不久，林衡哲寄自紐約的信，適時抵達。在紙幅有限的航空郵簡上，他的文字帶著溫暖與期許。在啓程前收到這樣一封信，彷彿獲得一份航海圖，驅除不少莫名的焦慮。雖然，我與衡哲未曾謀識。

衡哲寫信給我，主要是爲我出版第一冊詩論集，在那段時期，他與楊牧共同主編「新潮叢書」，決定收入我的《鏡子與影子》。楊牧在葉珊時期寫下的詩，曾經牽引我走過青色的年代。即使沒有機會見面，但是讀他的作品，如見其人，我倒不覺得有陌生之感。

對於衡哲，我所知甚少。最多只是讀過他翻譯的《羅素傳》與《羅素回憶錄》。後來，我才聽到楊牧提及，衡哲為志文出版社設計的「新潮文庫」，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沒有衡哲的建議，志文出版社的發行人，恐怕仍然停留在經營舊書店的階段。「新潮文庫」不僅提升了志文出版社的文化視野，而且也使台灣翻譯界對世界文化的接納，更為廣闊。今天，這套翻譯文庫，仍然源源不斷出版西方的重要著作，為台灣知識份子開啓一面寬闊的窗。衡哲的最初構想，可謂功勞不小。

但是，我到美國很久以後，才有機會與衡哲見面，這當然是值得紀念的一件事。在見面之前，他住在紐約，我則遠居美國的西北邊城西雅圖。幾乎每周他都會給我一次電話，討論我最近的所思所聞。他也常常寄一些有關台灣的書籍、報紙、影印等等，然後在電話中說出來讀後的心得。他的關切，毫不保留；使我在寂寥的日子裡，倍覺溫暖。

我初抵美國時，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中國沙文主義者。那幾年，中國文化大革命已近尾聲，四人幫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則臻於高潮。在校園裡常放映一些來自北京的電影。傳說中的《白毛女》、《紅色娘子軍》之類的影片，便是在那幾年中一一看過。在別人閱讀《毛澤東語錄》時，我也毫不例外購來閱讀。平時，我也會聽《一顆紅心向太陽》之類的官方民謠。那種對中國的盲目憧憬，應該是對台灣教育體制幻滅後而產生的一種反射吧。

我對台灣歷史的認識，對台灣政治的關心，從而促使我台灣意識的覺醒，有一部分是在與衡哲交談的過程中獲得的。在離開島嶼的千里之外，才開始望鄉，有時不免覺得命運在作弄人。但是，與台灣的先人比較起來，我還算是幸運的。我決定到美國讀書，是為了追求解開台灣的歷史之謎。有許多家鄉的前輩，在尋找台灣答案的過程中，最後都不能逃脫受辱受害的遭遇。相形之下，能夠在一個思想解放的環境去摸索，而且免於恐懼、免於監禁，我不能不感到慶幸。

離開台灣時，我內心早已預設了一個答案，那就是中國。然而，我瞭解中國愈深，就愈覺得那是一個陌生的國度。我終於領悟到，中國本身其實也是一個問題。近百年來的中國人民也是一直在向外尋找答案。一部現代中國思想史，西化派與俄化派系佔據了主要的地位。我赫然發現，在世界史的座標裡，中國似乎也難以為自己定位。這樣的體會加深時，我對中國的失望也逐步高升。我最後必須承認，直到快接近三十歲時，我經驗過的兩個中國，都帶給我無比的挫折。

苦悶，使我覺醒。在痛苦掙扎的時光中，衡哲分擔了我思考的焦慮。在言談中，他頗能理解我心情的轉折。每當電話來時，我總是急於告訴他一些自我囚禁與自我救贖的內在張力。我思想上纏鬥的艱辛，唯衡哲可以瞭解。

到了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我才第一次與他見面，那真是一次難忘的經驗。經過那麼多次的通話之後，我已預先塑好衡哲的一些形象。當他從機艙走出來時，我才發現他比我想像的還年輕、還瘦小。不過，我的錯愕瞬間就消失了，面對面聽到他的聲音和語氣，假想中的形象與實際的他，立刻就重疊起來了。爲了來看我，他特地從紐約飛越整個美洲大陸，

迢迢千里到西雅圖那個邊城。那是與他交往以來，我第一次被他的盛情所感動。經過那次見面，我更加能夠領會他的誠摯。

## 2

衡哲的興趣很廣，對文學、藝術、音樂、政治、醫學，都保持高度的好奇。對於他的從醫，我頗覺訝異。但是，瞭解他之後，我卻覺得他的脾氣，其實是台灣的醫學傳統薰陶出來的。最初認識他時，我就常常聽到他討論蔣渭水的歷史業績。衡哲來自宜蘭，他為囑瑪蘭的反抗運動感到自豪。他認為，宜蘭平原的政治運動有一貫的「道統」，那就是從蔣渭水、郭雨新，一直延續到林義雄這一代。由於他具備了這樣的歷史認識，所以在學醫之餘，也關心台灣社會各個層面的發展。

據說，衡哲在年輕時代是以做一個世界公民為期許；後來，他又沉迷於中國文化的傳統，特別是五四以降的中國文學。然而，就像許多戰後的台灣子弟，最後都對中國產生虛無之感。原因無他，只要稍具一些歷史意識的台灣份子，終究會得到一個共同的結論，那就是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是平行發展的。這兩個社會有各自的歷史命運，因此兩地的知識份子也各自負有不同的歷史使命。雖然兩地在血緣上是那樣接近，但是在歷史過程中追求的答案，卻全然不同。台灣知識份子之所以會產生痛苦、惆悵的情緒，便是因為往往把中國當做台灣出路的唯一答案。這種錯覺，是台灣歷史上發生過多次悲劇的主要原因之一。衡哲比我早離

開台灣，所以他在這方面的覺悟自然也就較為早熟。

在他的心路歷程上，吳濁流文學對他是一重要啓蒙。一九八三年，台灣文學研究會在芝加哥召開時，衡哲談到自己早年對台灣的鄙視而懺悔、而自責、而潸然淚下。他說，啓發他台灣意識的思考，是吳濁流的自傳體回憶錄《無花果》。然而，他當年看到吳濁流創辦的《台灣文藝》，卻完全不予重視。為此，他至今仍內疚萬分。日後，他創辦「台灣文庫」時，就把遭到查禁的《無花果》，列入優先出版的叢書之中，想必抱著一絲贖罪的心情吧。

「台灣文庫」是在一九八四年，於加州正式發行問世。他邀約張良澤擔任文庫的編輯顧問；真正執行選書與編輯，則由張富美、衡哲與我共同負責。在荒涼的異域出版台灣叢書，猶如在北極跋涉一般，充滿了孤寂與苦楚。但是，衡哲抱著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心情。每當想到家鄉作家的作品，遭到檢查、沒收、禁止，他就痛心無比。他認為，成立一個「台灣文庫」是必要的。在政治氣候陰晴不定的時代，更應該為島內的作家打開一條出路。他建立「台灣文庫」迄今，已有五年，投下的心血與資本，一直都是赤字；但是他卻甘之若飴，毫不疲倦。

衡哲在一九七九年搬到加州，從此我與他見面的次數就增多了。也只有接觸他更久之後，我更可發現他胸襟之開闊。十餘年來，友情之所以如此牢固，無非是他長期對我的容忍。衡哲與我之間，並不是沒有過不快的事；但是，他總是淡然處之。他以兄長之對待我，隨著歲月的累積而加深，這份情誼，我寸心了然。



從收到他的第一封信開始，到今天已超過十四年。在這樣漫長的時光裡，他從未斷絕與我聯絡。正因為如此，每當在我徬徨、挫折之際，他的鼓勵就會適時到達，就像十四年前我初次遠航時，收到他的信箋一般。在曲折的人生道路上，總有一些援手在扶助、糾正與引導。衡哲在我生命的幾個關口，正好扮演了這樣的角色。

這次他決定出版一冊文集，相信是總結他心路歷程的一段追求吧。他的從醫，佔用了不少他的時間。然而，他往往能夠保持超乎常人的熱心，對台灣種種文化的問題密切注意。由於這幾篇文字中，有一些是發表在我編輯過的報刊雜誌。因此，捧讀這些文字，我彷彿又看到我走過的生命，也想到十餘年來他與我的交往因緣。思友情之日增，思故鄉之日遠，這場生命的涉渡，有衡哲與我同行，便不覺寂寞了。

一九八八年五月廿四日 聖荷西

——《台灣文藝》，一九八八年七月

第3輯  
悱惻

## 內山書店

1

行走萬里路，彷彿只是爲了探訪這家書店。內山書店，看來擺設極其簡單樸素，令人可以想像它從前在上海時代的模樣。這家書店，雖是三層建築，但置身於神田區的高聳書林裏，門楣顯得黯淡了些。熙攘的街頭，佇立無數過客，大概沒有多少人知道這家書店的傳統吧。上海時代，何其遙遠。戰後日本人忙著改寫歷史已惟恐不及，他們更不可能記取這家小小的書店。我的前來探訪，也只是基於年少時期對魯迅作品著迷的那份情感而已。不過，仔細解析這一份情感的話，卻又覺得那麼模糊，那麼平淡。

五月五日到達東京時，正逢日本的男孩節。以鯉魚來期許成長中的男孩，是日本人固有的習俗。我看到，彩染的鯉魚旗幟，懸掛在商家的門口招展。日本人喜歡以櫻花自喻，也許

是酷愛花瓣怒放時的淡麗，或是花瓣凋落時的那份淒美吧。我倒覺得，日本人較近鯉魚的精神。他們發動大東亞戰爭與珍珠港偷襲，大抵是這種性格的延伸。錦鯉成羣結隊泅泳時流露的傲慢，看來像極東京街頭穿越馬路的人羣。在擁擠錯身時，他們仍保持著從容的表情，這不能不使我聯想到池中爭奪食物的鯉魚。在櫻花與鯉魚之間，我寧取後者來象徵這個島國，方覺恰當。

十三年前，當我飛往西方時，曾經在這個地方有過短暫的停留，那時是在羽田機場過境。現今，經過十三年之後，我第一次回到東方，入境處則在成田機場。這個曾經被農民與學生的激烈示威所嚇壞的機場，四處佈滿了鎮暴的崗哨。回到東方，首先使我感到印象深刻的，竟是武裝的制服與甲車，內心不免泛起一陣寒顫。戰後在廢墟中重建起來的日本，竭盡心力在其國境內扶植西方民主自由的體制。在一定的程度上，日本人確實又站起來了。在亞洲國際社會中，日本是唯一擺脫東方專制陰影的國家。日本人在維護它目前成就的工作上，也比其他東亞國家更加不惜工本了。

年輕的日本青年，恐怕已不甚了然他們先人在外地侵略殖民的史實，甚至也不清楚現在的政治體制是建立在怎樣的經濟掠奪之上。在這個繁榮得令人難以置信的社會裡，對年輕一代來說，鎮暴警察毋寧是近於日本歌舞伎中的侖舞者，裝飾的意味顯然是大於恫嚇的吧。然而，對我而言，望見車窗外的鎮暴警察，卻代表了更為深刻的意義。那似乎在提醒我，已經回到亞洲了，已回到我島鄉的門限了。

做為日本讀書界心臟的神田區，可能也是扶桑列嶼的精神堡壘地。從御茶之水車站，經過明治大學的校園短牆，步行到書肆的中心，約需十五分鐘。街的兩旁，次第羅列著新舊雜陳的書店。那種氣息，特別能呈現日本典雅的另一面。他們對書的敬崇，可以在這條街上觀察出來。即使是風漬陳舊的古書，都整齊而莊嚴供奉在與牆面等高的書架上。每一冊書，已都拭去灰塵。每走進一家舊書店，空間雖小，卻都維持了潔淨的氣質。

走在人行道上，可以看到右翼的激烈青年，坐在黑色的、漆有日本軍旗的宣傳車上，高聲疾呼著擁護天皇制的口號。飽食的日本青年，在優閒的生活中似已忘記了去翻閱史書。在新舊書店錯落的街道上，他們激進式的保守，對日本社會應是一個諷刺吧。年輕的日本已失去反省的能力，只能在社會內部構築難以突破的思想的繭，並全心塑造一個與時代全然脫節的偶像崇拜。他們遺忘了歷史，有一天歷史也將遺忘他們。從廣播器傳出的聲音，聽來是多麼誇大，又多麼空虛。我彷彿看到未來的日本。

## 2

在聲浪的襲擊下，路旁的內山書店就更加落寞了。內山書店的創始人是內山完造。一九一三年，他以藥商的身分到達中國。一九一九年，正式在上海日本租界地經營內山書店。當時，在上海躲避白色恐怖的魯迅，暇時就前往書店購書，得識內山完造，從此成為莫逆之交。從一九二七年與內山訂交開始，到一九三六年去世為止，魯迅生命中的最後十年，內山



書店佔了一席重要位置。魯迅的許多對外通信，都是透過這個書店進出。他的會友、座談，以及他領導的新興木刻運動，也都受到內山書店的協助。這可能是魯迅在上海時期，獲得慰藉與庇護的唯一場所。

內山完造對自己能夠與魯迅結識，也認為是他「一生的幸福」。魯迅在最後病急時，內山伸出不少援手。他寫的〈魯迅先生〉與〈憶魯迅先生〉兩篇文章，已成為研究魯迅告別人間最後一刻的重要史料。因為這位中國文學巨人離去時，內山就留守在榻前。

東京的內山書店，是內山完造在一九三五年敦促他弟弟內山嘉吉創辦的。創辦的目的，便是要在日本境內經營一家「專售中國書籍」的書店。書店最初設於東京郊區的世田谷，一九六八年才遷到神田。店中排列的書籍，確實都以中文為主，其中也兼置中國研究與台灣研究的日文書籍。在一個加速遺忘歷史的社會裡，內山書店的存在，應該具有訓誨的、警醒的意義吧。

走上書店的二樓時，即可看見兩條巨幅的魯迅手跡：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這一聯句，出自魯迅在一九三一年所作的〈自嘲〉一詩。內山後來在回憶中提起，魯迅

曾經以著熱淚向他解釋這首詩的意義：「因為，先生抱著不治之症的病體，迎著來自四面八方的攻擊，使他不得不使用七十多個筆名。再放眼一看五億人民的未來，猶如他們在茫茫的大沙漠裡，站在稱為無形之敵的飢餓線上。先生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與世長辭，始終堅持與這種沙漠大敵進行搏鬥。」（小欄元正著《內山完造傳》，趙寶智等譯）

多少年來，我已在不同的地方，看到太多魯迅的這兩句詩。不過，像這麼大的條幅，還是在內山書店第一次看到的。魯迅的詩，幾乎都是用鮮血寫出來的，誠如他在另一首詩說的：「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在中國新文學的道路上，魯迅確實以身作則告訴後人什麼叫做傲骨。我不能不聯想到當前台灣的左翼文學導師，他們關在咖啡室裡討論勞工運動，在冷氣房裡評議第三世界。他們誤以為鋼筆流出的紅墨水就是鮮血。這樣的左翼文人，與左翼的魯迅比較之下，猥褻與莊嚴的意義，立刻分明。

站在四壁的漢文書籍之中，我幾乎忘記身在東京。遠處傳來廣播器的口號呼聲，才使我驚覺是可笑的了。魯迅，在日本讀書人眼裡，究竟具有何等的份量，我並不清楚。我只知道，魯迅全集已全部譯成日文。這可能是中國新文學作家中，第一位獲得如此的殊遇吧。然而，魯迅的聲音，在日本街頭畢竟是微弱、稀薄，以至全然無聲的了。

魯迅的一生，充滿了反省。他在左翼文藝聯盟時期，被指控是拿盧布的作家。不幸的，當時有人察覺到他與內山的過從甚密，竟也散佈他是「拿日幣的作家」的流言，要製造謊話，也是輕而易舉的。魯迅為內山完造的書《活中國的姿態》寫序時，就非議內山「有多說

中國的優點的傾向」。魯迅的意思，顯然是鼓勵這位日本書商，應該多說中國的「壞話」。在當年日本侵略東北之後，魯迅敢於說這種話，無疑是要冒著暗箭襲來的危險。

## 3

我是來自台灣的讀書人。對於魯迅與內山之間的交往，總覺得頗富傳奇。在他全部的文字裡，抨擊中國之處，較諸對日本的批評還多。因為，他知道中國的積弱與無聲，主要是缺乏了自省的能力。近年來，台灣讀書熱烈爭議「中國意識」的真偽。在林林總總議論中，有一種說法是：中國是不能批評的；若是批評的話，就是「反華」。這些迂腐的、蛋頭的書生，有的還據說讀過魯迅的作品。他們應該好好重讀魯迅，看看這位文學大家是如何進行「反華」的。

在肅殺的三〇年代，魯迅與內山的友誼，能夠超越國界，超越敵意，終而相濡以沫，這實是一大奇蹟。內山曾經向魯迅請教過有關中日關係的問題，魯迅是這樣簡潔回答的：「我認為強者和弱者很難好起來，而且碰到一起就會打架。只要弱者不變強打架就不會終止。」這樣的解釋，自然是承認當年的中國是弱者。他的見解，也可套用在今日的台灣形勢上。要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要對付外來強權的政治干預，台灣非得先強起來不可，否則「打架就不會休止」。

在二樓的書架上，最引我注意的，是一排研究魯迅的中、日文書籍。看到這排專著，我當然有些感嘆。台灣海峽兩岸，對待這位巨人的態度，形成兩極。在中國，北京領導人學習蘇聯推崇高爾基那樣，把魯迅供奉成爲至尊無上的文學導師。四十年來，有關魯迅的討論，已不計其數。但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墮落卻日益深化，使中國再度成爲魯迅筆下的「無聲的中國」。

在台灣，魯迅卻是一個政治禁忌。彷彿魯迅就是一個菌源，如果讓他出土，就會如傳染病一般禍害島嶼。中國三〇年代的文學，事實上並不如一般所說的那樣具有殺傷力。身處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已有太多文學與理論作品，其震撼力早就超越中國三〇年代的文學了。如果台灣的讀書人可以讀普希金與聶魯達的詩，我實在看不出三〇年代中國文學有其查禁的必要。

由於魯迅以降的左翼作品，都一一遭到禁絕，島上的知識份子遂對三〇年代文學抱持一份超乎崇拜的神秘心情。甚至有一種說法如此強調，三〇年代文學的禁絕，使得台灣文化的傳承發生了「斷層」。這種見解，其實是文化查禁政策厲行之後的奇怪提法。三〇年代文學的價值，大可不必如此膨脹。以香港地區爲例，在過去四十餘年來，所有中國新文學的作品都幾乎在香港重印並彙集。香港，可能是唯一的華人地區，能夠毫不受到阻撓地接受中國三〇年代文學。然而，香港文化不也發生了「斷層」嗎？不從政治學、經濟學的層面去探討文化的傳承，卻一味誇大三〇年代文學的地位，這只能解釋台灣知識份子的盲目與怠惰。

我接觸魯迅作品，是在研究所時期。第一次獲得傳說中的《阿Q正傳》，內心抑不住一

股激動。激動的原因，主要那是一冊禁書。當年我對魯迅的時代背景與創作動機，可以說一片茫然。真正自以為瞭解魯迅時，已是我流落他鄉以後的事了。以後，又陸續讀了他的日記與書信，才發現他與日本關係之密切。

這次路過日本，我便決心探訪內山書店。而我的探訪，也並不帶任何崇拜心情，只不過為了滿足年少以來對這位作家的一絲好奇。走出內山書店時，東京街頭右翼份子的吶喊，依舊甚囂塵上。然而使我耿耿於懷的，卻還是內山書店樓上的那一排魯迅研究專著。在三〇年代，中國是無聲的；到了八〇年代，中國仍然啞聲無聲。魯迅，恐怕躲在亞洲大陸的天邊嗤嗤冷笑吧。走向御茶之水車站時，我禁不住想起魯迅在〈無花的薔薇〉所說的話：「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爲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變成傀儡了。」

——〈太平洋時報〉一九八八年八月二日

## 魯迅故居

我讀魯迅，始於台大歷史研究所的時代，是從舊書攤購得的《阿Q正傳》讀起的。那冊小書，配有豐子愷的插畫，雖然顯得破舊，但我視之爲珍本，一直藏在我的書架背後。直到離開台灣之前，我所認識的魯迅，僅止於此。因爲，在那時候，魯迅的著作仍然被視爲禁書，得手不易。

真正細讀魯迅，是到海外以後的事了。一九七六年夏天，在舊金山唐人街購得二十冊《魯迅全集》之後，對於魯迅的精神與寫作技巧才有更清楚的瞭解。毛澤東曾經稱讚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又肯定他是「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所處的時代，確實對任何作家都是一個嚴酷的考驗。他生命中的最後十年，是在上海度過的，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魯迅在上海租界地寫下無數鏗鏘有力的雜文。這些文字後來都被收入《三閒集》以後的文集裡；他的最後一冊《且介亭雜文》，更



收錄了他最具戰鬥性的思想，「且介」一詞，是租界的影射，用來反映他寫作的處境。

在租界地時代，他目睹中國人的墮落，但也體會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奮鬥。到現在仍然被廣為傳誦的文字，包括〈爲了忘卻的記憶〉等等，都完成於這艱苦的十年。左聯五烈士的被害，瞿秋白的被殺，都足夠襯托出他環境的險惡。魯迅的文字，是白色恐怖下呼喊出來的沉痛聲音，也是黑暗時代裡迸發出來的燦爛火花。沒有魯迅的戰鬥與抵抗，中國三〇年代的新文學必然黯淡無比。

即使在他逝世後的四十年，仍然可以感覺到他的文字透露出來的熱力。中國共產黨到今天還是把他尊崇爲至高無上的革命思想家，自然是因爲魯迅的精神確實領導過中國知識份子。不過，中共對魯迅的強調，政治性遠遠大於文學性。魯迅被過分偶像崇拜的結果，早已淪爲不折不扣的政治工具。魯迅地下有知，一定拒絕接受這種傀儡式的尊崇。

我到達上海時，是在炎炎夏日的七月、八月之交。從高樓俯望這個擁有一千三百萬人口的都市，我不免懷有一種奇異的心情。在魯迅的時代，上海被稱爲是冒險家樂園的國際都會，也是被日本人稱爲「魔都」的一個城市。這些稱呼當然是具有正負兩面的涵義，一方面暗示了上海充滿了魅力與機會，另一方面則在形容這個大城是淫蕩、邪惡的集散地。對當年的魯迅來說，上海則是一個避難的庇護所；因爲，在中國的大地上，唯上海租界地能夠容納他。倘若他生活在國民黨統治下的轄區，想必是遭遇與左聯五烈士或瞿秋白一樣的命運。

我看到的上海，是距離魯迅時代長達半世紀以上的上海。這個地方，再也不會有冒險，

當然也不再會有戰鬥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寧靜得近乎慵懶的都市。我投宿的賓館位在虹口區，正是從前日本人盤踞的租界地。賓館距離魯迅公園甚近，這個公園從前稱爲虹口公園，魯迅墳墓與魯迅紀念館就建在公園裡。從公園的東口走出去，朝山陰路方向，就可到達坐落在大陸新邨的魯迅故居。

到達上海之前，我剛讀過日本岩波書店出版的尾崎秀樹所寫的《上海一九三〇年》。這冊小書是作者記錄他的哥哥尾崎秀實在上海擔任記者的始末。尾崎秀實是日本左翼作家，出生於台灣淡水，在台北完成了大學教育。一九二八年他以《朝日新聞》特派員的身分到達上海。當輪船初抵揚子江口時，尾崎秀實在後來的信箋上如此描寫他的心情：「我初到上海時的那種感激，是一生中最大的一次。」他說，他那種喜極而泣的情緒，與當年協助中國革命的宮崎滔天是一樣的，宮崎也曾經說過同樣的話，「彷彿是回到第二故鄉一般」。日本知識份子對上海的憧憬是可以理解的，因爲上海是一個世界性的都市，與一九三〇年的東京相較之下，上海的神秘面紗，足以使外國人眩惑。

尾崎秀實停留在上海期間，認識了魯迅，後來過從甚密，這是透過內山書店主人內山完造的介紹而訂交的。他對魯迅在上海的活動事跡瞭若指掌。魯迅在上海與創造社的論爭，以及參加左翼作家聯盟的活動，都在尾崎秀實的日記、信箋、筆記裡留下記錄。尾崎秀樹撰寫這本書時，特別對魯迅著墨較多，這完全是由於他哥哥的緣故。要瞭解魯迅生前與日本知識份子交往的情形，尾崎秀樹的這本小冊子提供了一些新的史料。

上海之於我，全然沒有引起絲毫的感動。在傳說中，在史書裡，我已熟悉這個城市了，但是一旦投入上海，我反而覺得疏遠，甚至於覺得陌生得可怕。即使在離開上海時，這份陌生的情感也仍然刻骨銘心。尾崎秀樹那樣熱切描述他哥哥的興奮與喜悅，與我是無法聯繫起來的。然而，這畢竟是魯迅纏綿過、戰鬥過也挫折過的城市，如果我對上海還可以尋出一些親切的眷戀，也許是因為我青年時期以來對魯迅的熱愛而產生的移情作用吧。

在尾崎秀樹的書裡，附有一份租界地時代的上海簡圖，上面標明了魯迅故居與內山書店的位置圖。我訝然發現，這份屬於半世紀以前的地圖，到現在還是實用的。除了施高塔路改名為山陰路外，北四川路仍然沿用舊名，只要能把握這兩條路，魯迅的住居活動大約也就可以窺見一些。

領我前往魯迅故居的，是一位在二二八事件後逃往中國的台灣人。他後來加入中國共產黨，卻因政治鬥爭而被打成右派份子，並被開除黨籍。他是被壓在中國社會底層的小人物，是被歷史遺忘的畸零人；在上海的人潮裡，他是邊緣人。看到我來自台灣，又知道我要尋訪魯迅，他顯得分外熱心。

在山陰路上，可以看到許多整齊但已陳舊的宿舍，那是日本租界地時期遺留下來的建築，從格局與氣勢來看，當可想像從前的風光。上海街道到處都植有梧桐樹，綠蔭湧路；這裡也不例外，想必也是在租界地時代種植的。踏在闊葉的樹影上，我想，魯迅也曾經走過這些道路吧。從他避難的房子走到內山書店，必須要經過這條路的。只是，在他的雜文裡，很

少看見他對上海市景的描述，對於他的居處附近，他更是隻字不提。躲避白色恐怖的經驗，已使他養成了慣性的警覺，他不會輕易在文字中自動提供情報給劊子手的吧。

從馬路折進一條巷道，到了盡頭便是魯迅的住家。到達時，我內心不禁起了一陣悸動。在書裡接觸了千百次的魯迅，這次叩訪彷彿能夠讓我感受到他真正的生命。

公寓的圍牆上嵌有一塊大理石製成的招牌，寫著「魯迅故居」四字，是屬於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這是中共建國後第一個由官方認定的歷史古蹟。魯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見。穿過牆門，裡面是一小小的前庭，植有一株綠樹。踏進正門是客廳，牆上掛有一幅陳舊的油畫，顯然是後人添加裝飾的。

走上二樓，就是魯迅的臥室與工作場所。一張小小的方桌貼臨前窗，左牆是書架，旁邊則是他的睡床。我很懷疑當年是不是這樣擺設，不過，這些都不重要，至少這裡確定是魯迅戰鬥的據點。一九八九年夏天，我曾到日本仙台去探訪魯迅留學時的宿舍，就在東北大學（從前是仙台醫學院）的校外不遠。那裡有一幢斑駁的木屋，屋外僅立有一柱石碑，標明是魯迅住過的地方而已，未得窺見堂奧，甚覺悵然。

魯迅寫作的時間，大多是在夜晚，他的文字往往充滿生與死的問題，那是因為他見證太多青年的血。他的多少朋友與子弟，由於思想的緣故而遭到「暗暗的死」。他的憤怒與抗議，總是在生與死的討論中呈露出來。在夜色裡，他能感受到「寂靜濃到如酒，令人微醺」。然則，他畢竟是孤獨而寂寞的了。在一篇〈怎麼寫——夜記之一〉的雜文裡，他以委

婉動人的文字刻劃深夜裡的心境：

我靠了石欄遠眺，聽得自己的心音，四遠還彷彿有無量悲哀、苦惱、零落、死滅，都雜入這寂靜中，使它變成藥酒，加色、加味、加香。這時，我曾經想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這也就是我所謂「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這是在廈門的時候所留下來的文字，但我相信也可以用來形容他在上海時期的生涯吧。他寫作時所面對的深夜，其實就是他身處的時代的黑暗。魯迅在〈悼柔石〉一詩中，就提到他是「慣於長夜過春時」的；只有在黑夜裡，他才更接近那些追求人性解放的勇敢鬥士的精神。一九三四年魯迅以「游光」的筆名寫了一篇散文〈夜頌〉，坦誠表示他鄙夷白天而擁抱黑夜：

現在的光天化日，照來攘往，就是這黑暗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鬼臉上的雪花膏。只有夜還算是誠實的。我愛夜，在夜間作〈夜頌〉。

寫這些字句時，魯迅已經五十四歲了。再過兩年，魯迅就因肺病惡化，遽然去世。他的

生命裡，從來沒有看見光明的到來。即使經過了半世紀以後的今天，他所批判的中國封建文化，以及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並沒有獲得提升。戰爭了一輩子的魯迅，留下來的文字，仍然可以繼續讓後人當做彈藥作戰下去，因為魯迅期盼的日子，從未降臨。

我環顧他的臥室，實難以想像在如此狹小的空間，竟然為中國新文化打開了廣闊的領土。從他桌前的窗口看出去，可以望見對面宿舍的紅瓦屋頂，靜靜的陽光投射在上面，非常耀眼。這樣的光天化日，難道就是魯迅所說的「黑暗的裝飾」嗎？

魯迅在上海的十年，正是蔣介石背叛革命後奪得政權的全盛時期，同時也是國民黨與帝國主義密切合作臻於頂峰的時期。上海成為列強反共與思想檢查最嚴厲的地帶。然而，這也是魯迅從事文化鬥爭的最恰當場合。站在這間斗室裡，我仔細思索記憶中魯迅的一些詩句與一些雜文，以他的文字來對照房間裡的寒暄，他靈魂的悲壯與堅強，更加可以體會出來。

走出魯迅故居時，我的心情不是悲悼，而是尊敬。但是，我也不能不為中國人民感到悲哀。魯迅當年抵抗的是一個背叛革命的政權，如今，中共建國成功以後，也是背叛革命了。許多魯迅文字所描繪的現象，至今仍然存在，並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然則今日中國的魯迅又在何處？

魯迅逝世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的這個寓所，享年五十六歲。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與蘇維埃中央政府，向中國人民及全世界人士發佈一份悼文，其中提到：「魯迅先生一生的



光榮戰鬥事業，做了中華民族一切忠實兒女的模範，做了一個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為世界和平而奮鬥的文人的模範。他的筆是對於帝國主義、漢奸賣國賊、軍閥官僚土豪劣紳、法西斯蒂，以及一切無恥之徒的大砲和照妖鏡，他沒有一個時候不和被壓迫的大眾站在一起，與那些敵人作戰。」這些諛詞是正確的，問題是中央在崇敬魯迅之餘，也漸漸淪為魯迅當年所要批判的對象。除了「漢奸賣國賊」之外，中共不是早就變成土豪劣紳的法西斯蒂嗎？

一個時代的拯救，一個民族的改造，自然不是依賴作家單獨的力量就可獲救的。魯迅死後，許多作者都以與這位文化巨人有所過從而攀附關係，藉此向中共官方邀功爭寵，真正能發揮魯迅精神、保持魯迅風骨的，幾乎是鳳毛麟角。魯迅的弟子胡風、他的摯友瞿秋白，反而遭到中共無情的批鬥與貶抑。倘然魯迅還活著的話，他能受到無與倫比的尊崇嗎？毛澤東尚且容忍不了胡風的文藝觀點，甚至不惜親自點名批判，那麼作為胡風老師的魯迅，恐怕就更難逃災難了。中國共產黨的背叛革命、背叛人性、背叛理想，是古老民族孕育出來的一個結果。魯迅以一生的力量，對中國民族性推行徹底的揭露與批判，在他去世前，他似乎在中共革命運動上看到了希望。不幸的是，在他去世以後，中共反而以具體的行動捻熄了魯迅的希望。時代的拯救，民族的改造，看來是更為遙遠而艱難了。

告別了魯迅故居，我知道這是重新認識他的時代的另一個出發點。我從太平洋的一個島上前來這裡，只不過為了滿足年少時期所懷有的好奇。親眼看見他簡樸的居處，似乎符合我從前對他的想像。他生活中唯一的享受，大約就是喝茶、抽菸、不吃隔夜菜；除此之外，他

始終都是粗食度過他一輩子。他死後所得的聲名，都是後人用來裝飾用的，魯迅絕對不會接受這種虛偽的地位，倘然他知道中國社會仍然還在沉淪、墮落，魯迅一定親手毀掉他被塑起的偶像。

——〈自由時報〉一九九〇年九月

## 異鄉夜談

天空暗下來了，整座城市漸漸隱逝在夜色裡。上海的夜，是幽暗的，燈光稀疏，寥若星辰。許多高樓矮簷只剩下黯淡的稜線，然後化成模糊的影像，終至全部消失無蹤。無邊的寂靜，從海洋，從黃浦江口，從亞細亞的內陸，悄悄侵入，不久就佔領了這個廣漠的都會。黑暗與寧靜既已齊備，上海便提早入睡了。

我與這位台灣人坐在宿舍裡，靜靜談論他這一生的遭遇。他已接近老年，但這可能是他生命裡最平靜的一段時光。雖然留在內心的創傷從未痊癒，雖然早期的罪名至今仍使他抬不起頭，但至少在法律上，在名義上，在黨的記錄上，他已獲得平反了。窗外昏黃無力的燈光，彷彿是他心靈世界的反映，蒼茫的黑夜只剩這一絲光芒，是他生命裡僅有的餘暉。

他雖然很珍惜這從來也不敢企望的寧靜；在談話中，隱隱透露出一份不安，他還是擔心又會有運動再度來臨，擔心那久未觸痛的暗疾又會被揭發開來。帶著一顆靜止的，或甚至是

死寂的心，他要安穩地走向生命的終點，讓有過的羞辱、傷害、痛楚都一起埋葬。

在歷史的浪潮裡，他可能只是湧起而又消失的泡沫；但是，他的故事卻是他那一個世代的典型代表。這一切都必須回溯到一九四七年，緊跟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他那時代的知識青年，大概只有幾種命運可以選擇，有的無端被捕，然後無端失蹤；有的被公開槍殺，沒有任何理由；有的遠走高飛，逃往中國。滿懷悲憤的他，在時代風暴中倉皇抵達上海。當他得知在台灣的朋輩友伴受害受辱時，他以為自己選擇了幸運而正確的道路。他見到紅軍解放了上海，他毅然參加中國共產黨，他更準備好在最短時間內打回台灣。一位廿餘歲的台灣青年，能夠親身捲入歷史轉變時的波濤，內心毋寧是充滿感動的。他每次回想時，都覺得那是他門志最旺盛的一段時期。然而，生命中的意氣飛揚，也僅止於此。就在他熱切迎接中國的新生之際，一場風聲鶴唳的整風運動就緊接開始進行了。

社會主義祖國帶給他的第一個噩夢，便是有生以來他第一次發現自己竟然具有「台灣人原罪」。在那場運動裡，他目睹自己的許多台灣同志都被戴上「漢奸」、「私通日本人」、「勾結國民黨」、「與帝國主義者合作」的罪名。政治的漩渦，並沒有容許他冷眼旁觀，就在一些台灣知識青年與政治領導者受到指控株連時，他也被捲進更大的鬥爭裡。

他回憶三十年前這段驚心動魄的政治事件時，眼裡噙著若有若無的淚水。他說，日據統治時期受到的侮辱，那是可以承受的，因為那畢竟是異族控制的時代。在國民黨統治下，他受到的壓制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深知這個政權的本質，與貪污腐化是同義詞。然而，高

舉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旗幟的中國共產黨，在建國之後就開始發生權力鬥爭與整肅異己。在歷史夾縫中的台灣人，立刻被迫扮演代罪羔羊的角色。

他的罪名很快就成立了，只因爲他接受謝雪紅的領導。他說，他是逃往上海之後才認識謝雪紅的。謝雪紅奉命在香港組織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於一九五〇年把總部遷往上海。這位台灣老人，當年才只是二十餘歲的青年，也受到黨的指定參加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到今天，他仍然深深困惑著，因爲最初加入謝雪紅的組織，是由於黨中央的命令。等到謝雪紅被批鬥時，他也無可避免被波及。後來，他才漸漸覺悟，原來接受謝雪紅領導只是其中一個罪名，在整個政治案件背後的一個最大罪惡，便是因爲他是台灣人。這樣的醒悟，使他產生徹底的幻滅。

他沉入回憶的深淵說，那時他積極參加準備解放台灣的工作，向上級報告了台灣的實際情況，並爲之獻策、分析。他以自認爲是最恰當的方法，心甘情願爲祖國貢獻他的最佳智慧與最大勞力。但是，恰恰是因爲他的效勞，才使上級引以爲戒。因爲，身爲共產黨員的中國上級指導者，完全不知台灣社會的情形，如果解放工作一旦付諸實施，權力一定要旁落在台灣人的手上。於是一場組織內部的權力鬥爭，隨著共產黨整風運動的來臨而加速升高。

對台灣人落井下石，是輕而易舉的事。他說，台灣人經歷過殖民地的歷史，是一切罪名的根源。中共解放整個中國之後，只有台灣不能順利解決，這更使黨對台灣有一種莫名的敵視。他深深感受到，在黨性之前，人性是卑微的；在中華民族主義之前，台灣意識是可恥的；在權力鬥爭的漩渦裡，人格是受到扭曲的。他不得不發出一聲喟嘆，在罪名成立之後，黨才開始尋找證據；年少時期的教育與經歷，最後都成爲罪名的一部分。

那是無需經過任何審判的，黨的決議就是最高的命令。一位投靠社會主義祖國的台灣人，至此變成了「右派份子」，甚至成了「反革命份子」。從停止黨權，到剝奪職務，到開除黨籍，時間非常短促。從此以後，在社會主義的中國，他失去了一切可以活下去的權利與尊嚴。那時，他還不到三十歲，還有一段漫長的人生等待著他。從此，他以三十多年的餘生向黨方爭取平反；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爲了恢復名譽。

在燈影下，他說，不應該哭的，這一輩子已不知流過多少眼淚。他的淚水，終於還是不斷湧出。我望向窗外，上海的黑夜一片死寂。在不知道的許多城市角落，恐怕還存在著多少沒有聲音的飲泣吧。面對這位來自家鄉的老人，我仍可從他的表情辨識五〇年代的驚怖，以及卅餘年來的挫折與絕望。

如果當年他繼續留在台灣的話，我想，是不是命運會有所不同？我總是納悶於這樣的問題。這位老人在台灣的許多朋友，其實已無法思考這個問題，因爲他們不是失蹤，就是被槍斃；有的則出獄後，絕口不提當年的遭遇；至於沒有入獄的人，早已被白色恐怖驚嚇得不能言語，也不知如何思考。相較之下，這位老人的意志算是堅強的。

他向黨方寫過無數申訴，請求平反，請求恢復黨籍。他說，黨籍是一種保護網，平反則是使自己能夠在社會上抬起頭來。然而，他從來沒有想到，平反的申訴竟然耗費了他二十餘



年的光陰。

在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社會裡，當權者是很少承認錯誤的；即使是勇於認錯，他們也死不悔改。基層黨員的受害與犧牲，只不過是用來合理化黨中央的錯誤路線。中共建國以來的三大政治冤案，尚且必須經過半世紀或二十餘年的時間才能澄清真相、恢復名譽；那麼，像這位台灣老人的遭遇顯然是微不足道的。

三大冤案，包括了瞿秋白、潘漢年與劉少奇的政治案件。瞿秋白在一九三五年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由於他在獄中寫了一篇「多餘的話」，敘述他是如何從一位文學家變成革命者，這份文字使他在中共黨史上戴上「自首叛變」的罪名。將近五十年之後，經過中共「平反錯案假案」的調查，瞿秋白才在一九八二年恢復名譽。劉少奇則是由毛澤東親自指揮下，被打為「叛徒」、「內奸」、「工賊」，在一九六八年被黨中央永遠開除黨籍。直到一九八〇年，劉少奇才得到平反，重獲「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潘漢年是在一九五五年被密告指控為國民黨內奸，他也被開除黨籍。一九八二年，才獲得雪冤。夏衍在《回憶潘漢年》書中說：「經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歷時一年五個月的認真複審，詳細研究了原始資料，核對了中央檔案館和有關部門的歷史記載，往來電報和大量的人證物證，得出的結果表明：原來認定潘漢年同志是內奸的結論，完全是誣陷不實之詞。」

這些事實說明了，一個黨犯錯時，足可犧牲多少人權、人格、人命，而且必須在派系鬥爭塵埃落定之後，經過曠日持久的調查，才有可能產生結論。這種錯案、假案、冤案，卻不但是發生在三個人身上而已，數千萬人蒙冤之後，能夠獲得平反的，也只不過少數的幸運者。根據一九八二年的統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協助中共「改正錯劃右派五十四萬多人；從劃為資產階級份子的八十五萬人中區分出七十萬人為小商、小販、手工業者；認定了近五十萬起義投誠人員身分，並為其中的十五萬人做了政治上平反。」這份統計，見於俞雲波等著的《中國民主黨派史略》。在這些數字背後，可以想見，一定還隱藏看不見的、沒有聲音的無數扭曲故事。

坐在我對面的台灣老人，是在世紀災難裡浮沉的一顆卑微生命。他平靜的晚年，只剩下死水一片。在許多黑夜的夢裡；他彷彿聽到故鄉召喚的聲音；幾乎就是那一絲微弱的、遙遠的呼喚，才使他在黯淡的日子裡看到了光，看到了希望。但是，那也只是光與希望罷了。他長長吁嘆了一聲，又輕輕搖首；那輕微的動作，讓我看到了最寂寥的人生。

我以為他結束了故事，不願繼續談下去。過了很長的沉默之後，他又啓口說：「其實我並沒有得到平反。」他看著我錯愕的表情說：「我的平反只是表面而已。」他說，當年謝雪紅主張的台灣高度自治，強調的台灣人意識，到今天仍然受到黨中央的扭曲矮化。他提高了音量說，謝雪紅被打下去，當然牽涉到權力問題，不過她的政治主張也是受到迫害的重要原因之一。說到這裡，他的情緒似乎有些激動。謝雪紅如果應該平反，她的思想也應該同時平反。因為，她的人格與她的思想是無可分割的。即使她的人格受到維護，而思想還是未獲尊重，則恢復名譽也還是虛偽的。他說，他是受到株連的人；在接受謝雪紅領導時，支持過她

的政治主張。在平反過程中，黨中央從來沒有提及他的政治主張。

他說：「如果我的思想是有罪的，為什麼還會得到平反？」這完全是爲了配合黨中央的統戰工作。在現階段，北京對台政策需要推廣，台灣人的地位突然受到尊重。這種轉變還是最近十年的事，在政策還未改變以前，他從來沒有想過會有平反的一天。他爲此感到十分沮喪，當年是因爲政治需要而被貶損，如今也是因爲政治需要而被提升。他近乎自問自審地說：「我真的獲得平反了嗎？」

生命如果可以重新出發的話，他說，他絕對不會選擇走這條漫長痛苦的道路。他寧可留在台灣，無論是否會經歷同樣的迫害，至少可以確定是葬在自己的土地上。這一把骨頭，這輩子已注定要埋在陌生的異鄉土地上。他再次說，「這是異鄉，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的感覺。如果中國人就是奴隸，我拒絕做這樣的人種。」

天翻地覆的歷史，使一個人的生命看來是如許微弱而無助。在通往刀光血影的祖國道路上，他顯得更爲渺小。翻滾的時代潮流，沉沒他的理想壯志，衝垮他的返鄉願望，切斷他的家庭親情，在上海昏黃的燈光下，他好像守住洪荒以來從未有過的孤寂。

倘然一個人跨過了六十歲，眼淚仍還未流盡，那就意味他的人生還有一些悲痛的事情不斷發生。初見面時，從他寧靜的表情，完全感覺不出他內心錯綜複雜的情緒。聽完他的故事，才知道他的人生已全然龜裂，根本不可能復合。沒有什麼再可以治療他，除非他回到自己的家鄉，那可能是這輩子裡他僅存的希望。

我飛過大洋、飛過海峽，來到這塊曾經稱爲「祖國」的土地，原是為了尋訪謝雪紅的故居。上海，是謝雪紅變成左翼革命家的轉捩點，一九二五年她從這裡出發到莫斯科去留學。上海，也是她革命事業的埋葬處，一九五二年謝雪紅在這裡被打成右派份子，被剝奪一切職務。我走過她會居住的舊居，那是兩層的紅磚樓房，玻璃門框都顯得朽舊，但那卻是她寄望解放台灣的辦公室。謝雪紅的故事，在中國大地上仍是一個禁忌，雖然她在死後被平反，很少有人願意提到她的名字。

這位追隨過她的台灣人，就是由於謝雪紅的平反而得到平反。只是謝雪紅曾經允諾過他回到解放後的台灣，允諾把台灣變成一片樂土，如今回顧起來，那樣的承諾已經變得可憐、可悲、可笑。無盡追求的終點，僅剩下一場冰涼的夢。從他的經歷，我不能不想起瞿秋白當年遠赴俄國時，在《赤都心史》散文集裡感嘆家的沒落與知識份子的淪亡，他期盼著中國革命能夠解除一切壓迫的枷鎖。他以著熱望的字句寫出了他的憧憬：「總有一天，所有的『士』無產階級化了，那時我們做我們所能做的。總有一天啊……」

瞿秋白的「總有一天」，果然在中國的土地上降臨，所有的人民，包括知識份子在內，都無產階級化了，只是他們不可能再做他們所能做的了。謝雪紅與所有跟她一起投奔中國的台灣人，也曾帶著「總有一天」的嚮往做爲他們一生的期許。他們的命運與瞿秋白何其相似；瞿秋白死後遭到中共鞭屍；謝雪紅則是生前受辱，死後也受辱。與我夜談的這位台灣老人，從少年走到老年，他的心靈也從未脫離過煎熬的煉獄。

上海的黑夜變得深邃、淒清、淡漠。我陪他走下陰暗的樓梯，送他走出樓前。看他顛蹶搖晃的身影，彷彿再也承受不起任何風吹草動。我如果啓口說話，抑制在眼底的淚水一定猝然湧出。他回過頭向我揮手，低語說聲再見。我只是揮別，靜默不語，目送他的影子遠去，直到與黑夜融成一片。在他消失的那一刻，我似乎感受到人間最大的寂寞；那份寂寞，從海洋，從黃浦江口，從亞細亞內陸，四方八面圍攏過來，迅速淹沒了我。

一九九〇年十月八日 聖荷西

——《自由時報》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五日

## 望向田野另一端

1

同樣驚懼的神情，呈現在不同的臉上；同樣悲愴的淚水，也濡濕不同的眼睛。曾經有過這樣的時代，一排排槍聲劃過大地長空；曾經有過戰慄的生命，選擇在同一時間放聲慟哭。荒蕪的時代消逝過久，幾乎已全然遭到遺忘，只是那浸淫過鮮血的故事，到現在還未嘗拭淨。每當回首瞭望，我仍然可以感受到一排排槍聲呼嘯而來。

親自去查訪那幾乎湮滅的事件，是我第一次回到台灣之後。那時，我已跨過了中年。我的年齡有多老，事件的歷史就有多長；就像這塊島嶼有多寬，容納的悲劇就有多大，只因爲事件發生那年，我正好出生。我必然屬於故事無可分割的一部分，並且緊密地與故事一起成長。我總是這樣相信著，在生命的每個階段、每個關口，都不可避免與許多冤屈的靈魂擦肩



而過。我更是如此深信著，在每一飛揚或挫折的時刻，也不時受到冥冥中不明靈魂的庇蔭與祝福。這一份迷信，應該是發源於我誕生的一九四七年吧。

但是，從來沒有人告訴我關於我的任何情節與姓氏。走過漫漫的田野，一切安然無恙。要使一樁歷史事件消失無蹤，是何等不容易的事。那不僅僅是需要進行有計畫的滅口，而且還需要所有的未亡人一致保持沉默。在噩夢屢現的日子裡，凡屬哀傷的、痛苦的，都必須壓抑下去。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事，是什麼力量能夠使創人們的生活過得如行雲流水？是什麼力量創造了安詳而寧靜的歷史？日子果真能如此幸福地周而復始，是沒有人願意舉首回望的。

我只是不幸回首瞭望了，望向了田野的另一端。曾經以為歷史是沒有聲音的，時光隧道是空洞沉寂的。直到有一天，在零落泛黃的書籍裡，我偶然窺見歷史的窗口；透過窗口，我赫然發現了騷動的事件。彷彿有一片血色長空，彷彿有一片咆哮大地，殘存在文字記錄裡，我始了然出生的年代竟是滿幅煉獄的景象。我聽見時代漩渦裡的生命吶喊，那是歷史傳來的回聲，在一夜之間化為驚雷，震耳欲聾。我成長的道路。從來就不會平靜過。

我更加確信，自己曾經與許多不知姓名的靈魂相遇；在什麼時候的什麼地方，我受過那些幽魂的眷顧。在獲知歷史的秘密後，我甚至覺得，自己竟是亡靈的化身。如果事件所灑下的血到今天仍在流淌，我的血脈想必是他們的延伸吧。

## 2

當我決定在島上進行田野工作時，就好像動身要前往去尋找我的前生。翻閱過那麼多的書籍，都只停留在平面文字認識的階段，都只是片面依賴想像去推測。

在高雄，我與一位受難牧師的女兒見面。同時前往的，還有兩位歷史系的學生。坐在一間寬大的教室裡，外面強烈的陽光使得室內看來特別幽暗。我已忘記是如何開始對談的，只覺得她細碎的聲音在引導著我。市聲喧囂，卻沒有淹沒她的記憶，我跟隨著聲音，在想像中的幽徑裡暗暗摸索。她說，父親是一位侍奉上帝的牧師，在安詳的小鎮主持一個教會。那時她還很小，對父親的印象極其模糊，但是還可以記得曾經有一雙溫暖的手臂擁抱過她。

我沉入她的回憶，好像走進了那個小鎮，也走上通往教堂的台階。啊，我終於見到了那位可親的牧師。他站在台上，穿著整齊的牧袍，為善良的鎮民祝福。他使用淺顯的語言，清楚闡釋神的故事。他溫厚低沉的聲音，使每顆心靈都覺得上帝非常接近。每位鎮民都覺得他是上天派來人間的使者。那是多麼充滿生命力的靈魂啊，因為他的存在，小鎮到處散發著樂觀、愉快的氣息。

事件發生時，他憂慮著鎮民的生命，啓開教堂的門，暫時做為庇護所。不久，持槍的士兵來了，無需任何理由就逮捕了他。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直到家人與他重逢時，牧師已經喪生於亂槍之下，他死在偏遠的荒郊，躺在他身邊的，是一位同鎮的學生。

我從記憶深淵翻醒過來，看見她帶著蒼涼的淚。她說，沒有人能夠解釋這一切。在稍長之後，她聽到與父親坐牢的一位倖存者說，父親在被行刑之前，仍然為其他落難者祈禱。她牢記著這樣的故事，而且要懷著父親的這種形象活下去。她說完故事時，淒然帶著微笑，看來是那麼堅強。只是，我的手腳卻完全冰冷，彷彿從另外一個世界回到人間。望著窗外的夏日，我不免有陰陽相隔的感覺。我看到的，其實是一片血色長空。

在嘉義，我終於見到了畫家的兒子，與我前住的，是我的孩子宜謙。我要讓謙兒知道，這塊島嶼在航行時，是穿過了怎樣的命運與海洋。畫家的作品，受到後人的肯定與盛讚；只是，他的故事卻在戰後歷史中寫滿了蒼白的一頁，以著鮮紅的血。

他的兒子請我坐在客廳，四牆都是畫家留下來的遺作。時間沉澱在油畫的顏色裡，憂鬱的、愁情的，卻又凝聚著生之欲望。他談起父親立志成為畫家的奮鬥經過；從他的神情，我可以揣摩畫家當年帶著謙卑而又具備信心的容顏。那些作品，畫出了一個家庭的幸福，畫出了一個時代的憧憬，也畫出了無數與世無爭的心靈。即使未曾在那時代活過，我也被畫中的情境深深吸引著。

在那次事件裡，只因為他父親曾經在杭州美專教過書，會說中國話，所以就出面為鄉人溝通說項。父親出去後，便不再回來。說到這裡，他的眼神覆上一層陰翳。他的聲音特別寧靜，靜得彷彿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後來街上傳話回來，他父親被網綁在卡車上，正在遊街示眾。

他那時是高中學生，獲悉消息，便立刻跑去街上。軍方的卡車開過，他望見父親站在車上。經過人群時，父親看見了他。車子開得那樣快，父親只能回首向他凝視。那是最後的一瞥，許多語言都在瞬間表達。他飛奔追隨著卡車，朝著嘉義車站的方向。他拚命奔跑，不斷向前衝。遠處卻傳來槍聲，高亢得無可置信。他到達車站廣場時，從人群背後，看到躺在血泊中的父親。

父親的回望，以及他淌下的血跡，在他生命裡烙下了最深的傷痕。他的一生，都在細細反芻著父親的死的滋味。然而，比他更痛苦的，應該是他的母親。數十年的戰慄，到今天仍然不止不息。如果死是一種折磨，那麼對他母親而言，活著才是更具腐蝕性的折磨。

我永遠不能忘懷那一幕，當畫家的兒子在回憶父親時，坐在輪椅上的母親也在客廳出現了，是媳婦推她出來的。她今年已九十歲了，銀髮閃閃發亮。就像牆上的油畫，時間沉澱在她的容顏裡，憂鬱的、愁情的。當她知道我是來瞭解畫家的生涯時，她的神情顯現著慌亂。她以著無力的聲音，緩慢說出：「請不要再提那件事……。」那聲音是那麼悠遠，悠遠得像來自一個空幻的世界，但擊在我胸口上卻是那麼有力。

家庭的幸福，時代的憧憬，無爭的心靈，都毀在那次浴血事件之中。所有的未亡人，無告地接受時光的凌遲。他們不能說出任何一句話，任憑那故事在內心翻滾、燒灼、撕裂。倘然一個久遠的歷史事件，都不能放過一位九十歲的老人，可以想像的，島上多少未知的角落裡，必然還隱藏著許多未曾舔拭的傷口。

在台中的夜裡，我與一群受難家屬團聚。到今天，他們仍然還在尋找失去的父兄，還在追求命運的答案。在台北，我與一對兄弟見面，他們仍然含恨懷想父親的失蹤故事。在宜蘭，在基隆，在新竹，在台南，我遇到了不計其數的謎團。從北到南，不同的生命都一起承擔相同的命運；不同的家庭，都一起接納相同的悲劇。

## 3

我只是偶然拉開了歷史的窗口，卻不幸讓我窺見人間的騷動。拾起行囊，我去尋訪我的前生。還未走完島上的全程，蒐集而來的故事，就已足夠使我心神迸裂。我不再與不知名姓的幽靈錯肩而過，那些亡魂已經與我一起走向天涯海角。

曾經有過這樣的時代，一排排在槍聲呼嘯而過，不曾留下任何理由。如今，我走過漫漫田野，為的是找出合理的解釋。許多暗暗死去的故事，還在許多人的內心流轉；那些故事，是不可能死去的。我不再因為聽到那事件而恐慌，長期累積下來的巫魅，畢竟已經讓我驅除了。

我還要繼續採訪下去，繼續瞭望田野的另一端。保留生動的記憶，是爲了下一代不再受到矇騙、欺侮，是爲了使歷史悲劇不再回到人間。在滾滾紅塵的都市，在荒涼僻遠的田野，如果有人聽到我發出冷笑，那不是來自我的內心，而是來自有名有姓的幽靈。

——〈民衆日報〉一九九二年二月廿八日

## 死

## 1

年來，死的意象溢滿了我的黑夜。在午夜時分，燈下一片孤寂，那往往是我面對死亡的時刻。我未曾有過自殺的念頭，死的陰影卻如此貼近。許多幽靈來到桌前，與我低低碎語。他們來去無蹤，我竟能感受他們的體溫。我找不到燈光以外的夜色，溫暖的鬼魂使我全身冰涼。直到我一一辨識了他們的容顏，死亡不再是死亡，我彷彿迎接一些全新的生命。我發現，他們竟然都是我昔日熟識與未識的朋友。他們並不微笑，或甚至是沒有表情的，我寧可他們發出聲音，但他們終於都黯然離去，留下一些低語讓我細細思量，留下孤寂的我，獨對自己的燈影。

那麼多的生命，從完整到破碎，從出現到消失，像極一首詩、一篇散文、一個故事、一



齣戲劇。我認識無數陌生的生命，在艱難的旅途上，如偶然邂逅的篇章。讀過又闔上，置於床頭，希望在夢裡又遇見一回。然而，真正使我難以忘卻的，往往是生命的一些段落、一些句子、一些對白。

我翻閱那一張張逝去的臉，有充滿淒苦的、傷痕的，也有充滿平靜的、幸福的。這些曾經在旅途上相聚又揮別的魂靈，豈非也是我生命裡無可割捨的一部分？那些死者，曾給過我一些鼓勵、一些智慧、一些啓發，而這正是銜接長篇故事的重要段落、重要句子、重要對白。然則，我對死者的眷戀，也恰是我對自我生命的珍惜吧。

人過中年，對生命的體驗，越覺得像是一首詩、一篇散文的成長，行其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在適當的時候，就必須寫下最後一行，加上最後一個句點。然而，有時又不盡如此，蘊藏奧義的生命之書，並不因為譜上句點而告休止，還有一些斜光、微音、顏色，從終止的生命溢瀉出來。那聲，那光，那色，在深夜寂靜處，無端浮現。在燈下與我相聚的幽靈，無非就是這些吧。

許多徹夜不眠的怔忡張望，為的是追尋逝去的聲、光、色。在幻影與真實交織的錯覺中，因感傷而泣，因興奮而笑，只是失落與惆悵時居多。死者的離去，並不單單帶走他們個人的經驗，我生命的一部分也隨之淪亡喪失。我為死者而哭，不也就是為自己而哭？鬼魂來到燈下桌前，許多記憶又回到人間；苦澀的、甜美的，一時匯集胸臆，讓我重新反芻、咀嚼、回味。當幽靈撤退隱逝，僅剩下我與自己的呼吸共存，彷彿我的生命僅在證明夜的死寂，無非就是這些吧。

但是，我並不會發過自殺的念頭，我只是對死思考得更多。我要分辨清楚，死亡究竟屬於恐懼、空虛，還是屬於親切、落實？

## 2

我捧著我的魂魄，回到久別的故鄉。我獻上我的靈魂，祭拜鄭南榕的遺像。我與南榕默默相對，時間就凝滯在那裡。死，畢竟是有力的、雄辯的。這顆我所眷戀的、緬懷的生命，經歷過戰鬥的道路之後，終於也不能戰勝死亡。在他身上，曾經有過我崇敬的與卑微的寄託。對於他走過的彎曲旅程，以及他頓挫又奮起的經驗，我不能掩飾我強烈的認同。在他靈前，南榕應該知道，我的激情與冷酷，曾經投射在他浮沉升降的一生。

行走千萬里，拾回我離散流亡的生命，只為歸來向他的靈位祭拜。沒有人知道我懷著這樣的秘密，這個秘密使我內心發生騷動與不安。因為，我向他許過諾言，有一天必定在家鄉的土地相聚。直到我走進他曾經自囚的狹窄房間，我內心世界的風暴才靜止下來；而我的秘密，也不再是秘密。

一個人離開自己的土地，就等於在那塊土地宣告死亡了。我離開家鄉長達十五年，這也

意味著，我已經死了那麼長久。在南榕生前，我從來沒有機會在島上與他見面。就在我幾近死滅的那段期間，正是他為自己的政治理想展開戰鬥的時刻。我與他在海外相遇時，他已經在台灣開拓了全新的言論境界。到現在回想起來，我那時彷彿是與他的靈魂在對話。我們在加州的一個小小旅店，他徹夜傾談著懷抱中的理想，咀嚼著情感中的愛與恨。他的冷靜，近乎寒涼；但是從他的眼神，我觸及一顆炙燙的心。

這樣火熱的靈魂，確實是屬於台灣，屬於一片在黑暗與黎明之間掙扎的土地。他的苦戰與苦戀，其實就是台灣歷史命運的延伸。內心折磨與現實折磨，使他的人格凝成一塊頑石。當他向我揮別時，我帶著期望，也深深相信，總有一天要在家鄉迎接得勝的日子。因為，他的奮鬥，已超過他的年齡所負載的，而且也超過他的時代所能期盼的。他已在台灣的歷史上，留下一塊豐碑。

然而，不久之後，就傳來他自焚的消息。他的死，使我立刻想起他的臉龐。他有時以冷笑來裝飾內心的鄙夷，有時以溫暖的微笑來表達多重的關切。那麼，這次他離去時，帶著的又是怎樣的容顏？從二月開始，就聽說他監禁在自己的辦公室，決心抵抗一個不義體制的不義指控。在那鐵絲網圍起來的小小空間裡，他度過六十餘天。

那是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巨大象徵。重重的網羅裡，遭到囚禁的並不只是他一個人，而是整個島嶼的命運。在樊籠裡反抗的，不只是他一個人的思想，而是整個民族的意志。我幾乎可以想像，他穩定坐在那裡，思索著解放的道路——不僅是個人肉體的舒放，並且也是所有精神枷鎖的卸除。他坐在生死交戰的門檻，為的是要對自己的生命下最精確的定義，也要對他身處的邪惡時代做最佳的詮釋。最後，他決心選擇火焚的方式。他下定決心時，生命的意義立即獲得定位。

細讀他的一生，似乎找不到淒涼的階段。但是，他的世代，也就是我的。我們都出生在一九四七年的悲慘事件之後，我與他的心靈，是在陰影下成長的。冥冥中，我們都心存莫名的恐懼，非常擔心歷史會再度重演。在社會的各個角落，時常可以拾到傷痕，可以感受創痛，也可以招引仇恨。這些暗疾，如果有歷史根源的話，應該要追溯到我們出生那年的屠殺事件。他不只一次告訴朋友，二二八事件是他的夢魘。他的心情，我能夠充分理解。也正是帶著那份心情，我們產生了共同的信念。基於相似的信念，他與我採取同樣的行動，那就是努力克服與生俱來的恐懼。克服的工作，引導我們走上精神流亡的旅程。

他一邊流亡，一邊應戰。流亡，是消極的抵抗；應戰，則是積極的反抗。這兩件工作，他同時做到了，甚至做得比任何人完美。然而，最大的反抗，竟完成於他的死亡。我推想著最後的時刻，他關門反鎖，點火引燃，從容坐在他熟悉的椅上，雙手平舉，拳頭緊握，恰似他往常演講的身姿。就是那姿勢，塑造了人間無可辯駁的抗議。倘然要刻劃一個腐朽的權力如何造成傷害，那麼在他肌膚上舔過的每一寸火舌就是最好的佐證。如果他的死有多痛楚，則不公不義的體制就有多邪惡。

他的生命，行其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他隨著火焰昇華而

去，告別不潔不德的人間。他是我這一世代裡，最勇敢也最充滿智慧的行動家，再也沒有人能超越他。

## 3

我的魂魄，曾經散落在四方。當我決定返鄉時，我收拾飄泊在天涯海角的生命，直到飛越海洋，踏到久別的故土，我才尋回我的完整。長久忍住的淚水，終於淌在南榕的靈前。我追悼的是，一顆時代心靈的遽逝，而我也悲泣自己往昔的怯懦與沉淪。面對他的遺像，我毫無緣由聯想到艾略特的〈荒原〉：

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

自死亡的土地滋長著紫丁香

並揉雜著記憶與欲望

喚起枯萎的根鬚，以春天的雨水

我很清楚，他並未宣告結束；他赴火時，沒有留下遺言。他的自焚，是花開，是記憶，是欲望，是復活的根鬚，在這充滿死亡的土地。我迢迢千里歸來，為的是我與他的信約。我向他答應，一定要在台灣的土地上相聚。我終於回來，終於走進他戰鬥的地點。他選擇死，

是那樣不拘形式；那麼，我與他的重逢，就不必遵循俗世的儀式。在市聲喧囂的長巷裡，我們進行了一場靈魂與靈魂的精神對話。這樣實踐我的諾言，南榕當會接受。

我的黑夜，出現許多死的意象，南榕走後，這樣的意象更加分明。我發現自己常常與他對話，在燈下、在桌前，促膝長談，不知黎明之將至。他幽幽而來，悠悠而去，分擔並攜走我的孤獨。死亡，不再是恐懼，而是溫暖與再生。離開台灣後，我懷著他的靈魂，因為我珍惜這一次的相聚，我將帶著他旅行，到最遙遠的山谷，也到陌生的、沉睡中的聖荷西。

——〈自立晚報〉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七日



## 失去的山水亭 ——紀念吾友王古勳

在王古勳的記憶裡，「山水亭」是他生命裡重要的一部分。凡是活動於四〇年代、五〇年代的台灣作家、藝術家，幾乎沒有人不知道山水亭的存在。這家以台灣料理出名的餐飲店，是太平洋戰爭前後台北文人活動的聚散地。他的父親王井泉，便是山水亭的店主。在日據時期，王井泉對台灣文化活動的支持，並不遜於早期台灣文化協會的會員。戰後初期的重要知識份子，包括林茂生、徐坤泉、楊雲萍、吳天賞、巫永福、黃得時、張文環、吳新榮、陳逸松、呂赫若、陳逢源、楊三郎……等，都與王井泉過從甚密。

如果以山水亭為中心，以王井泉為主軸，也許能刻劃出戰後台灣文化發展的一個側面。這個工作，王古勳原是計畫要進行的。只是他寫成一篇將近兩萬字的〈山水亭：大稻埕的梁山泊〉之後，就沒有繼續完成。他總以為，有朝一日必定能夠寫出來；他等待著有一個從容的時間與一份從容的心情。然而，王古勳為生活所迫於先，又為惡疾所困於後，終於無法再

了結他的一樁心願。

王古勳的離去，不是他個人生命的喪失，不是親情、友情的消逝而已，並且也是台灣歷史記憶的淪亡。這一個缺口，再也不會有第二個人能夠填補。

我生也晚，未能知道台灣早期文人活動的故事。直到我與古勳認識之後，才獲知山水亭周邊的歷史與人物。古勳是王井泉的養子，在血統上沒有任何的淵源；但是，在性格上，我頗能感知古勳強烈帶有王井泉的風格。傳統中的王井泉，待人處事非常寬宏大量，好施援手，對於一切文化活動都能不計利害予以支持。與王井泉有所過從的台灣窮困文人，幾乎都得到他的接濟。如果在台灣文化發展史上拭去王井泉的名字，恐怕台北的藝文活動會失去精采的一頁。

身為王井泉的兒子，古勳默默支持台灣文化工作的精神，絕不稍讓於他的父親。我與古勳的認識，是在一九八六年春天，那時我正主編海外《台灣文化》雙月刊。他主動給我電話，提供許多相片與資料給我，也在編輯的內容上給我意見與鼓勵；然而，我並沒有機會與他見面，當時他住在德州休斯頓，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會接到他熱情的電話。在多次的交談中，我次第獲得許多山水亭的軼事。

他很坦白告訴我有關他的家世，他是被王井泉抱養的，他的兩個姊姊也是認養的。但是，他從童年以來就得到豐饒的父母之愛與天倫之樂。他成長於山水亭的文化環境裡，幾乎戰後傑出的知識份子都逗過他、抱過他。因此，他對台灣文人的認識，完全不是來自書本文

字，而是來自他親身的體驗。在談話中，古勳就是一部活字典，對於這些傳聞中的人物瞭若指掌。

我要求他把記憶裡的人與事寫下來，因為軼事、掌故以筆記小說方式記錄下來，往往可以成爲文學史的重要資料。我說，我們這一代必須留下一些線索，使後來者可以追蹤。那時古勳正忙著準備從德州遷往加州，他的生意必須處理了斷。在他最忙碌的日子裡，古勳還是允諾了我的請求，那就是〈山水亭：大稻埕的梁山泊〉那篇長文。古勳的文筆流暢，讀他的文字，就好像與他促膝長談。他刻劃人物性格，總是能夠畫龍點睛，許多文人的姿態都被他精確鏤雕出來。他的文章刊出後，頗受讀者歡迎。

我與古勳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八六年冬天洛杉磯許信良遷黨回台的歡送會上。他主動走過來與我招呼時，我竟然不知道他是誰。當他自我介紹，給我很大的驚喜。過去，我以爲他是一位上了年紀的人，沒想到他只是四十六、七歲而已。他的談話舉止，使我很快就把他當做「同路人」。

他搬到加州以後，就常常保持聯絡。我發現，他對台灣先人的評價，都能夠以最寬大的尺度予以包容。他曾經說過，每個時代的政治環境都是不同的；在不同的條件下，就有不同的求生方式。後人在看待前輩時，應該要考慮他們的處境。這種見解，與我非常接近。

他生前常常要介紹我與陳逸松先生見面，陳逸松是他的父執輩，是王井泉的好友。由於陳逸松有過中國之行，並且又擔任過中國人民政協的委員，大多數海外同鄉都拒絕與他來

往。但是，古勳告訴我，即使不贊成他走過這種曲折的道路，至少也應該去瞭解他爲什麼做了這樣的抉擇，至少也應該認識陳逸松的時代與成長的過程。

在這個擾攘的政局裡，像古勳保持這種寬宏氣度的人，幾乎已絕跡了。我自己對台灣抗日左翼的研究，很早就得知「內爭」與「分裂」已是台灣人的宿命。每個時期、每條路線，都常常出現勇於鬥爭、勇於決裂的政治人物，彷彿只要把政治運動的力量劈開、沖淡、稀釋，台灣人的命運就可得到解放。在我長期流浪於異域的生活裡，已經遇見這樣自命不凡的決裂人物。他們的決裂，往往是絕情的。所以，認識了古勳這樣的溫情主義者，反而使我覺得稀罕。

他在一九八七年發現自己的疾病後，就不能全力做自己的工作。後來林衡哲就請他協助台灣出版社的發行工作，並且也請他處理每年一次的台灣文化之夜。古勳常常不辭辛勞，抱病全力以赴。我自己身爲《台灣文庫》的編輯之一，對於他這樣奉獻，總是感到內疚。有一次他打來電話，說要編一冊《呂赫若選集》，希望我代他蒐集一些資料。呂赫若也是山水亭的常客之一，古勳對他的許多傳說頗能掌握，由他來編一冊選集是很恰當的。

但是在惡疾纏身之際，他似乎已力不從心。我寄給他數份資料之後，便不見有進一步的動靜。每當見面，他都爲自己未能及早編出而感內疚。這份未完成的工作，最後也成爲他身後的一個遺憾。

我在海外認識不少台灣早年的知識份子，編輯《台灣文化》以後，我更在天涯海角找到

自我流放的人士。他們的父輩、親友都在變動的時局中被捕、被殺；倖存下來者，也自我埋葬自己的歷史。即使生活在白色恐怖的統治圈外，也沒有多少人敢於說出他們的經歷。他們的家族史都隨著流亡而流逝，待我遇到他們時，許多珍貴的歷史已經難以重整。能夠說出史實的，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古勳能夠清楚記憶山水亭的軼事，是海外少見的。

在他生病惡化的後期，我總以為能夠隨時南下洛杉磯去探望他。十二月初，我終於訂好機票；但是，十二月五日晚上他在痛苦中去世。林衡哲在六日清晨告訴我時，我手握電話，不斷顫慄。在寒氣襲人的早上，我可以聽到窗外的葉落聲音；那聲音顯得空洞而巨大。我知道，我失了一個朋友，一位使人溫暖，使人不知什麼叫做寒冷的朋友。我更知道，台灣又失去了一段記憶；歷史中一段失去的鏈鎖，再也銜接不起來。王古勳，又名鵬勳，離去時，未滿五十。

——《自立早報》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 一位精神盟友的復活 ——紀念陳文成博士殉難十週年

生前死後的陳文成，於我是陌生的，陌生得使我難以描繪他的曖曖容貌，也難以追尋他生命的隱晦道路。要我界定自己與他之間的情分，幾乎是羚羊掛角，無跡可循。他在世時，我從未有機會與他認識；他離去時，我也未能參加他的葬禮。然而，我卻常常有一個感覺，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曾經與他錯肩而過。縱然那是無語的、看不見的相遇，他留在我胸臆的，是一個熱情的、壯碩的形象。我甚至還有一個錯覺，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會與他再度重逢；而這樣的重逢，可能會發生在最近的將來。經過這十年的繫繞縈懷，我終於不能不承認，他畢竟是我又遙遠又接近的一位精神盟友。

陳文成死後，才在我的靈魂裡復活，並且是復活得那麼真切，這於我是一次奇異的經驗。我從來沒有埋葬過他，也從來沒有為他舉行過祭典；由於他的死，我得以結識他的舊友，得以接續他一度期許過的文化工作。我的生命，等於獲得一次前所未有的擴張。他的肉



體是早夭的，他的思想則是早熟的。他的意志與理想，堅持不滅。我與他的許多舊識，能夠在這十年來凝聚不散，豈非就是他的心靈在冥冥中引導、叮嚀與鼓舞？

### 靈魂裡的復活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是在一九八一年七月的報紙上。傳自台灣的消息說，他的遺體在台北校園的圖書館後面被人發現；報導裡提到，他是一位傑出的數學教授，正回台省親。不久，又聽說他在死前曾經受到警總約談。又過不久，也聽說他在海外積極參加同鄉會活動。那時，我在洛杉磯主編《美麗島週報》，政治分析的文字工作使我養成一種敏銳的嗅覺；我隱然感知，這又是一次冷血的政治謀殺。

我開始聯絡陳文成執教學校的同事，也聯絡他旅居匹茲堡的一些朋友。他們對於陳文成的死，大多表示震驚、訝異與不解。細讀過來自外電與台灣的報導之後，我已可確定這是美麗島事件的延續。如果在暴力的統轄下，劊子手敢於製造林家血案，那麼伸出長臂來干涉海外的政治活動，也無足為奇了。

在週報上，我逐期譯載有關事件的英文報紙評論，並以最大篇幅刊登來自美國各地的紀念文字。我一字一句翻譯那些報導時，才發現他懷有一顆炙熱的心。細讀許多遠方來稿，我從零散的、片段的追憶文字，逐步拼成陳文成的圖像。縱然那圖像是如此殘缺，我卻能夠揣摩出他的心路歷程。一位從事數學思考的知識份子，竟然也與我的文學思考那樣，充滿了想

像，充滿了浪漫，也充滿了性情。後來那些譯稿與文字，都收入了海外出版的《陳文成教授紀念專集》。在那本書後，我更加完整地印證了我對他的形象塑造。

陳文成是屬於文學的，從他給友人的書信中，就可知道他對台灣文學瞭若指掌，他生前給友人的一封信簡，非常典型地表現他特有的性格。在信中，他表達了留在異鄉的心情：「那種飄萍無寄的感覺，又像無情的風雨凶猛的湧來。」對於文學的嚮往，他也如此提及：「我也曾經想鑽進文學的象牙塔裡，想想一個唸理工的人，又有文學當 hobby（嗜好），這不是最美好的人生嗎？」在信後，他又表示正在讀《魯迅全集》第五冊。這封信，我為他發表在《美麗島週報》上。後來，我特地去翻閱我書架上的《魯迅全集》，第五冊收集了《南腔北調集》、《淮風月談》與《花邊文學》。這是一九三〇年代國民黨白色恐怖的統治臻於高潮的時代，也是魯迅從文學投向政治最積極的時期。

### 無罪可畏，無國可叛

我相信，陳文成一定讀過那篇〈爲了忘卻的紀念〉，那是描述左聯五烈士犧牲在國民黨劊子手槍桿之下的故事。魯迅以悲慟的文字寫下他的心情：「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裡，他們卻是走向刑場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聲中逃往英租界，他們則早已埋在不知那裡的地下；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舊寓裡，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沉靜中拉起頭來，寫下了以上的那些文字。」我在想，魯迅文中提到的「中國」，

如果以「台灣」取而代之，不是也同樣精確地描述了台灣青年淌下鮮血的事蹟。我不知道陳文成是以怎樣的情緒讀這篇文章。他從來沒有想到，他自己有一天會如中國三〇年代的青年一樣，毫無緣由地走向刑場，走向墳地，走向生命的終點。

歷史的進步，是多麼緩慢。只因爲他說出了故土之愛，只因爲他表達了鄉情之思，就必須去承受左聯五烈士曾經承受過的悽苦命運。然而，在他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之後，居然還必須忍受來自權力者的指控。他們說他「畏罪自殺」，說他有「叛國思想」，彷彿不加上這些罪名，就不足以洗刷他們的血手。

陳文成於我雖屬未識，但我可以確信，他根本無罪可畏，也無國可叛。我們這一代在戰後才出生的台灣青年，在思想上早就被教育機器清洗得一塵不染。我們被灌輸的國家觀念，只不過是統治者爲了維護既得利益而炮製出來的虛構意識。這種落後的、近乎封建時代的帝王思想，都是我們在離開台灣之後才醒悟過來的。這種糟粕，並不值得我們背叛，我們只是唾棄而已。

果敢的陳文成，在密室裡面對情報販子時，想必是表達了他的氣憤。原來這些製造國家觀念的統治者，是如此邪惡地監視他們所教育出來的學子。他一定報之以冷笑與輕視，因爲他終於發現，這樣一個龐大的統治機器，竟然是如此畏懼於人民。對那些劊子手來說，站在陳文成的形象之前，他們簡直就是侏儒。所以，他們必須使用最古老也最原始的方式，來維持他們的尊嚴。拳頭與刑具，便是支撐他們統治人格的秘密武器。

來自台灣的消息說，陳文成的遺體被人發現於台大圖書館的背後。他被安排這樣的結局，爲的是要讓那群冷血者找到出路。儘管這樣的安排是多麼笨拙，但至少可以使他們有從容的時間畏罪潛逃。這些畏罪潛逃者，反而誣稱受害者「畏罪自殺」。罪孽深重的台灣青年啊，還未走向法庭，就已經有罪可判；罪名還未成立，就已經莫名被處死。倘然我也是陳文成，命運豈非與他沒有兩樣？

我坐在投射著溢滿的加州陽光的窗前，望著一排排盛放的玫瑰，頗爲納悶於陳文成的離奇死亡。如果他活下去，應該可以成爲台灣最佳心靈的典範吧。這可以從他無數友人的評語，也可以從他學校同事對他學術成就的肯定得到旁證。

### 不讓他輕易離去

對於他的不死，我是深信不疑的。讀了那些文字對他所表現的深沉懷念，我就知道有許多人不會讓他輕易離去，他們決定以實際行動來完成他對台灣的擁抱。一九八五年初春，我到達紐約，與他的一些朋友聚會、商談如何創辦一份命名爲《台灣文化》的刊物。在春雪未融的紐約郊區，我看見了陳文成的舊識。在此之前，我與他們從未謀面。但是，圍坐在屋內討論構想中的刊物時，彼此之間並沒有任何距離。他們都是專攻理工學科的，在議論中，我可以體會到他們對台灣人文的誠摯關懷。在離開台灣那麼遙遠的地方，由於一位親愛朋友的死，由於爲了使這位已逝的朋友不死，他們謙卑相聚，希望能實現死者曾經懷抱過的理想。

對於這樣的安排，我不能不有所感動。

這不就是陳文成在牽引的嗎？無言的結局，並沒有使他失蹤、沉默。我感覺到他參加在我們中間，感覺到我們說出的某一句話就是他的聲音，感覺到他使許多未曾浮現的意志終於凝結在一起。當《台灣文化》這份刊物出版時，我不僅認識了流散在各地熱愛台灣的朋友，更認識在台灣久別的許多作家。因為，我們決定讓這份刊物成爲島內外作家的橋樑。在我被迫長期流浪異域之際，在我被權力人物劃爲異議份子之際，只因為有這份刊物的存在，我在主編期間，陸續與天涯海角的望鄉者銜接起來。

如果接辦這份刊物是爲了要證明什麼，我想，我要證明台灣這個島嶼具有豐碩的文化遺產；我更要證明，陳文成這位精神上的盟友又宣告復活了。

### 七月的蕃薯田

一九八五年夏天，我在美東夏令營遇見了陳文成的妻子素貞，她是事件後承受最大苦難的未亡人。面對她時，我不知道應該以怎樣的語言與她交談。看到她安詳、稍帶微笑的臉龐，我似乎能夠揣測她已克服了許多痛苦的試煉。我並沒有告訴她，她在美國記者招待會發表的聲明書，她在美國國會上提出的證詞，是我譯成中文的。我想向她說，我會繼續堅持在台灣文化方面的工作，就像陳文成會一度憧憬過的。不過，我最後還是沒有說出來。那時，我曾寫過祭陳文成的詩，我也沒交給她。當她能夠在內心拭乾淚痕，能夠自我療傷，任何的

語言對她都是多餘的吧。我寫的那首詩，題爲〈七月的蕃薯田〉，全詩如下：

我的拳頭

是一顆憤怒的蕃薯

我漲紅著臉

只因見證了這一幕

他們原是躡手躡腳的一群

匆匆的來，慌亂的去

在七月的深夜裡把你遺棄

竟然還忘記擦乾血跡

我的手掌

是一張悲痛的蕃薯葉

我鐵青著臉

只因見證了這一幕



他們並不從容

在冷笑中

我讀出他們的罪

一條鞭痕烙在他們的額前

我用我的拳頭擊掌

驚醒七月的清晨

我是青青的蕃薯田

向世人宣告這醜陋的一幕

他們在樓影下比手畫腳

認真進行一場科學分析

他們顫抖的雙手

掩飾不了顫抖的心

我用我的掌包住拳頭

忍住發酸的憤怒

我是正在蔓延的蕃薯田

為歷史留下這悲劇的一幕

他們洗刷不掉雙手的罪

那是與生俱來的印記

有一天我要他們懺悔

跪在我粗糙的泥土上

我是繁殖滋長的蕃薯田

只因你的靈魂榮養了我

你我終於要站起來

用我們的手掌我們的拳

陳文成遺體被棄放的地方，是一片蕃薯田；而蕃薯本來就是台灣人的隱喻。在歷史上，台灣人見證過太多殘酷的死亡事件，陳文成的悲劇正是台灣命運的一個縮影。然而，我要表達的是，血泊的島嶼從來就沒有屈服過。就像那一片蕃薯田那樣，在任何艱困的條件下從來沒有停止過生長。如果陳素貞曾經讀過此詩，她應該可以瞭解我的心情。縱然這首詩，呈現

不出陳文成那種豐沛的、堅強的生命力。

### 他們的生命版圖繼續擴張

每次想到他的死，想到他死後所遭到的扭曲，我就不能平靜。於我而言，八〇年代的台灣，是充滿死亡的十年。一九八〇年，台北發生的林家血案；一九八九年鄭南榕、詹益樺的自焚事件，正好與這驚濤的十年相始終。這些事件一再鞭笞著我，苦籐一般揮打在我的靈魂上。在這樣不平靜的年代，我是不可能安然無事的。每一次死亡，對我都是一次激勵。當我的意志出現脆弱、沉淪的時刻，我就不能不以他們的死喚醒我的生命。

一九八九年七月，我被監禁在海外長達十五年後，第一次獲得返鄉的機會。陳文成逝世八週年紀念會，正好在那時候於台北義光教會舉行追悼。我告訴自己必須去參加，不僅是因為我要看林家命案的血地如何變成聖地，而且我也想讓陳文成知道，我終於在故鄉與他會盟。我到達紀念會會場時，台北剛下過一場微雨，空氣裡蒸發著一股若有若無的泥土味。這種又陌生又熟悉的氣息，似乎在暗示陳文成的靈魂也回來了。

我走進教會時，正有牧師在證道。我靜靜走到人群後面，細細觀察每一位祭悼者。鄭南榕的弟弟在那裡，許多政治犯也在那裡。在肅穆的氣氛中，我強烈感受到台灣發生過的苦難都匯集在一起。那些伴我走過八〇年代的亡靈幽魂，原來都回到人間，隨歌聲迴盪流連。我閉上眼睛，任那些魂魄穿過我的軀體；如果我的淚水難以拭乾，那裡面一定揉雜了林家姊

妹、陳文成、鄭南榕、詹益樺的血液吧。其實，我也是死亡了十五年又回到家鄉的幽靈。比起陳文成，我只是多出一具身軀宣告復活而已。

我參加了陳文成紀念會，但我並沒有埋葬他。就像我到鄭南榕靈前拈香，我也未曾向他揮別。我穿越了生命裡最淒厲的十年，那些可敬的逝者，一定不同意我沉溺在哀傷裡。我以行動與鬥爭，來證明他們活在我的裡面。我會傲慢地、自負地活下去，以我的拳頭與我的手掌。陳文成在天上，當可看見他還活著。他不會沉沒，他的生命版圖仍繼續擴張。

——〈自立早報〉一九九一年六月三十日

## 微雨松江路

祖母詩人陳秀喜之逝，加深了我對嗜詩時代的懷念，也使我對當年曾經有過的徬徨、迷失感到惆悵。二月廿五日清晨，鄭炯明、林文義分別自高雄、台北給我越洋電話，告知陳秀喜去世的消息時，我坐在燈下，分外覺得茫然。閉目追索她的影像，記憶最深刻的，不是去年十二月我與她的最後相聚，而是台北松江路的深巷裡，她揮手向我告別的身影。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事了，我正準備離開台灣。我去向她辭行後，走出巷口，她站在門前凝望。我回首兩次，只見她不停揮手，微雨最後濡濕了、模糊了她的影子。她樓下的前門關上，我知道，少年時代至此告一段落。

望著寂寥的空巷，我內心不免是疑懼的。我所怔忡者，不只是因為要與這個城市、這塊土地別離；更因為是生命裡一段豪情揚眉的時期從此就要喪失。那時，我並未預知自己的思想閣樓也即將瓦解傾塌；但我確知，再回來時，心情絕對不會是原來那般。通往松江路陳秀喜住處的長巷，也是銜接我愁情感傷時代的一條通道。有一天再回到此地，我會不會再與她論詩，她會不會再對我耳提面命；這些問題，都成了我離鄉前的未知。

對於她的時代，我不會深究過。只是她常常告訴我有關早年的上海經驗，我稍稍得知她年輕時候的曲折生涯。從她的故事，我窺見了台灣先人的明與暗。然而，我也只是聆聽而已，對她經歷過的殖民地與租界地時代，我沒有給予太大的關切。那時，我正全心沉浸在龍族詩社的寫詩活動之中。我癡迷地堅信，一首詩的完成，就是一次生命的完成；寫詩，是崇高心靈的最佳表現。因此對於她個人歷史的意義，我並不去深思；並且還覺得那些故事，對詩而言，都只是旁枝末節而已。倘然她曾經使我產生一些感動，那麼，那絕對不是她的歷史經驗，而是她對詩的執著，以及她克服語言障礙所做的努力。

她的語言思考，是切割的，不連續的；這反而構成了她寫詩的風格。我從來沒有想到，她的時代也是切割的，不連續的。她的詩風，其實就是她的歷史的倒影。這是過了很久以後，我在海外瞭望台灣時，才深深體會到的。她的詩，是語言的囚房，是禁錮心靈的一個窗口，是一段受害歷史的具體經驗。

當我能夠以這樣的心情去理解她時，從前在松江路對我說過的許多話，才逐漸呈現了意義。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她會說過自己是由養母扶持長大的。她度過的養女時代，並沒有嚐過苦楚；相反的，她的少女時期是一生最幸福的了。婚後，她隨丈夫到上海去工作，因為當時日本在上海有租借地。從殖民地的台灣，到租界地的上海，使她有過奇異的中國經



驗。那樣的經驗是不愉快的，尤其是經歷過中國土匪的搶劫、綁架、勒索，對她簡直是一場噩夢。我記得極為刻骨銘心的一段話，就是她提到的，「同樣都是帝國主義的受害人，中國土匪不敢對日本人下手，卻只對手無寸鐵的台灣人施以暴行」。

太平洋戰爭結束後，她歸心似箭。當她乘坐的輪船接近北台灣時，她遙見了台灣的青色山脈；在那時刻，她喜極而泣，遂情不自禁對附近的台灣漁船高呼：「鄉親啊，我們回來了。」她告訴我這個返鄉故事時，距離戰後初期已將近三十年；但是，我仍可感受到，她的心情猶是激動的。

我去向她辭行時，她只囑咐我兩句話：「只有離開台灣，你才知道做台灣人的滋味。」然後她又補上一句：「不要忘記，你是台灣人。」她的叮嚀，我並不是那麼在意；不過，我卻表現得很專注，因為那畢竟是我離台前的最後相聚。在朝向大中國主義的那段時期，「台灣」與「台灣人」於我是寓有貶損的意味。現在回想起來，我是多麼無知於她期許的心情。我感到奇怪的是，她並不是唯一那樣對我說話的人；我的父母，我的師長，都在我割捨自己鄉土的前夜，重複了類似的交代。離開台灣後，我才重新反省。

什麼是台灣人的滋味？這個問題先是在思考中盤桓，然後像一隻蛀蟲停留在我心房裡的角落蟄伏。直到我的國家認同在政治風潮中崩壞時，我從前構築的象牙塔裡的柱樑，也開始受到啃蝕。台灣人的滋味，竟是如此苦澀而痛楚。她對我的告別語言，原來是潛藏在她內心欲言又止的聲音。

在松江路，我曾經與笠詩社的同仁相聚過，也與龍族詩社諸君子一起造訪過。不過，有很多時候我是單獨前往的。七〇年代初期，台北的空氣漸漸摻雜了一些改革的氣息。校園裡的清談，雜誌上的議論，次第出現了要求改變的願望。我驚惶地面對這些景象，惟恐被任何的動盪波及。

我的恐懼，是我美好的教養無可割捨的一部分，也是我圍築知識世界的一條延長線。在官方調教下的書生特色，都可以在我身上發現。因了恐懼而開始逃避，那正是我求知與求生的本能；我唯一擔憂的，恰恰就是求變。我害怕曾經擁有的精緻的幸福，會遭到損壞。松江路，是我遁逃的地方之一。我總以為，在浸浴於古典學問之後，再分出一部分關切投注在詩作方面，那就是最大的入世行動。我不會察覺，詩的本身就是最好的城池，早已把我與台灣社會隔絕起來。

通常我坐在客廳，聽她敘述最近的作品。她在那段時期寫出的詩作，大多已收在《樹的哀樂》那冊詩集裡。除了詩之外，她就告訴我台灣的歷史，以及她個人的經驗。她的談話，完全不觸及窗外剛剛發生的政治，這使我感到很安全。她提到的幾個人的名字，對當時的我都是陌生的。有一次她說，彭明敏已經成功脫逃到國外。我還不知道，誰是彭明敏。又有一次她說得很神秘，台北一位知名律師陳逸松已經在北京，並且還在廣播中對台喊話。她說的這些人物，都是我後來涉入政治之後，才逐漸認識了他們的背景與生涯。

她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為什麼不去討論當時的釣魚台事件或退出聯合國的事？這些疑

惑，我後來當然找到答案了。她關心的，是另外一種政治，是一種與體制無關的政治。她那近乎啞啞的故事，原就是被統治者所遺棄、封鎖的歷史，她拒絕討論當時的政局，因為她拒絕認同那樣的體制。這種精神上的抵抗，不也見諸於她那時代的台灣知識份子之中？

只是她的精神流亡，並沒有逃離台灣歷史；在恰當時候，她會以影射的、隱喻的方法，表達她的鬱悶。相形之下，我在那時候的逃避，就顯得怯懦、自私，無可理喻。想起在離台之前，我為她的詩集所寫的序言，就有不少強作解人之處；把那份從自己的學養所孕育出來的輕浮與跋扈，強加於一位受害的長輩作品之上，這件事到現在我是無法原諒自己的。

每位戰後成長的台灣青年，都走過一段枉費的彎路。距離台灣歷史軌跡越遙遠，就越難發現自己的面貌。我的可恥，並非只是不知羞愧而已，我甚至還回頭蔑視、鄙棄台灣先人的事蹟。她可能是最清楚我當時的心態；不過她並不責備，卻反而以曲折的語言引導我。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與她失去了聯絡。但是，斷斷續續在詩刊上看到她的新作，我便可以想像她安然無恙。我知道她的家庭生活是不快樂的；我沒有想到的是，在垂暮之年她竟發生了婚變。後來，又聽說她曾一度自殺。遠在海外，我為自己不能給予任何的關懷頗覺不安。我總覺得，她可能從此會挫折無比吧。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一九七九年有一支民歌流傳到海外，歌名就叫做〈美麗島〉。那時候，台灣黨外雜誌《美麗島》月刊都還未發行。我聽見有人輕吟著：「祖先正視著我們的腳步，他們一再重複的叮嚀，不要忘記，不要忘記，筆路藍縷，以啓山林，水牛、稻米、香蕉、玉蘭花……。」那種悠緩、寫意的頌讚，令人心動。後來，我才知道歌詞竟是出自她的手筆。細讀詩歌中的一字一句，我突然驚覺，那不就是當年離國時她對我的交代嗎？「不要忘記，你是台灣人。」她把這樣的交代，昇華為歌，成為對全體台灣子弟的期許。我很自私地這樣設想，這首歌是她為我而寫的。

破碎的家庭，沒有使她喪志。她的歌，不就代表了她的堅強與振作？在重複聆聽〈美麗島〉那首歌之際，我終於忍不住寫信給她。令我驚奇的，不是她立刻覆信給我的速度，而是她在信封寫下住址時，註明是：「FROM REPUBLIC OF TAIWAN」。在那風聲鶴唳的年頭，這封信沒有在關卡被攔截，不能不說是奇蹟的了。她的心情，她的語言，她的隱喻，都在那期間間明朗化了。從前她對我說話，是依賴默契，至此她已轉為明言，正式結束了她政治信仰的「象徵主義」。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我投入了海外的政治運動，但仍然與她保持若即若離的通信。有一次她來信說，〈美麗島〉那首歌，引起了有關單位的注意，她說，「常常有坐吉普車的人來拜訪」。讀了她的信，我不禁喟嘆，歷史的喉嚨原是這樣被割斷的。她在信尾補了一段：「請放心，他們嚇不到我。」在松江路時期，她留給我的形象，是和藹近人的；如今，我覺得那形象，又添加了一份戰鬥的性格。

我在文學與歷史方面重新出發，是在一九八一年的事。這位我喜歡稱呼為「姑媽」的祖母詩人，帶給我不少啓示。經過了一段隱遁的時期之後，我決定開始寄文字回台發表。一九

八三年，我寫了一篇〈給秀喜姑媽的一封信〉，鄭重表示：「我要向你宣告我就要復活，我要以我的詩，證明我活得勇敢無比。」因為，她應該比任何人還清楚我所說「復活」的意義。從前在松江路那位狂傲的文藝青年，畢竟被我埋葬了。她當然也知道，與我一起陪葬的，不止於我的個性而已；年少以來，教育體制所加諸於我的價值觀念與國家認同，也都跟隨我進入了墳場。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得以回到闊別的台灣。在笠詩社的二十五週年社慶上，我終於與她重逢。站在台上致詞時，我看見她近在咫尺。她坐在那裡，不住地擦拭淚水，使我久久說不出話來。我在信上曾經問過她：「如果是妳自己的孩子離開這麼久，妳原諒他嗎？」從她哽咽的微笑與激動的神情，我知道，她已接納了我，也原諒了我。

去年冬天，我第三度返台，在台灣筆會主辦的文學討論會上又與她相聚。她的健康情況，看來衰弱許多。會後，她牽著我的手走到基督教青年會的餐館。她一路邀我去她關仔嶺的住處度假，我答應她，下次返台時一定會去。

在台北街頭陪她走路，使我想起松江路的長巷。年輕的時候，從來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麼；等到確立目標時，人已過了中年。如果早年能夠領悟到我對我說過的許多語言，我不會對自己的土地命運這般渾然不覺，也不會對虛擲的許多時光如此毫不在意吧。做為台灣人的屈辱與苦悶，她自是比我來得深刻。然而，她並沒有自甘留守在統治者所設計出來的囚房。她的掙扎，她的困鬥，我是清楚見證了的。

她驟逝的消息傳來，我無以自處。到關仔嶺去投宿的信約，終成徒然。我曾答應要送她今夏將出版的《謝雪紅評傳》，那是我個人嘗試建立台灣史觀的一個企圖。這樣的諾言，如今也歸於惘然。

生命的構造，是長年累積的，也是隨時調整的。我走到這麼長遠的路，定位於這樣的方向，當是受到許多啓示與扶助。通過那樣多的叉路，為什麼有的被選擇，有的被遺棄，那往往決定於時空人事的影響。我深深相信，我跋涉過的旅途，必然有一條是通往松江路的長巷。站在記憶的巷口，我不能不回首。微雨初降，落在我的少年，落在我的中年。我看見她樓下的門轟然關上，門後傳來叮嚀的聲音：不要忘記，不要忘記。

一九九一年三月廿日 聖荷西

——《自立晚報》一九九一年三月廿三日



## 尋找謝雪紅的蹤跡

傳說中的謝雪紅，散落在天涯海角。一顆破碎的靈魂，誕生在一個破碎的時代；最後遺留下來的，也僅是一段破碎的歷史。在散亂的文字紀錄裡尋找她的事蹟，猶如在一一片割裂的鏡面尋找她的容貌，每一個形象都不免扭曲而殘缺。直到今天，似乎還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她的一生。然而，如此不完整的謝雪紅故事，在台灣仍然還有一定的魅力。即使是對台灣史感到陌生的子弟，也多少風聞過她的名字。

謝雪紅之於我，亦復如此。她從一個空洞的歷史名詞轉化成爲一位具體的政治人物，其間的過程自然是冗長而緩慢。她的名字真正對我產生意義，還必須去等到我開始摸索台灣史之後。在荒蕪的台灣史領域上，謝雪紅始終被放置在最偏遠的角落。這是因爲謝雪紅一生都在扮演叛逆的角色，對於握有歷史撰寫權的統治者來說，這樣的人物必須擦拭淨盡。

一位歷史人物的名字，會變成政治上的一個禁忌，這就使我有足夠的理由去探索背後的

原因。我決心爲謝雪紅立傳時，已經耗費十年的時光蒐集她的資料。那些資料自然也是支離破碎的，把散佚的史實拼湊起來，也難以重組出一幅完整的圖像。不過，也恰恰是由於資料的殘缺不全，我才更加痛切感到謝雪紅命運之曲折。

在台灣史上，承擔這種坎坷命運的，又豈止謝雪紅一人。我嘗試爲她造像，心裡並不只是懷有謝雪紅的形象而已，我看到的是全體台灣人的命運。在歷史激流中沉沒了多少台灣英雄豪傑；謝雪紅能夠使她的名字擱淺，使她的故事令人難忘，乃是由於她不碎的意志，堅持不被激流沖走。

### 朝向台灣歷史的荒野

觸發我去尋找謝雪紅的最初原因，完全是偶然的。做爲一個歷史學徒，我是從中國史開始我的學術旅程。在四年歷史系學生的生活裡，我從未感知台灣史的存在。直到大學快畢業那年，一位專攻西洋史的台籍同學邀我去他的書房，當他出示一份《台灣暴動事件紀實》的小冊子時，他的神色帶些慌亂，卻又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自得；因爲，那是一冊罕有的禁書。從小冊子，我第一次瞭解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也第一次發現謝雪紅與那次事件的關係。

我第二次再看到《台灣暴動事件紀實》，是一九七四年我到華大東亞圖書館之後的事了。那時，我對台灣開始懷抱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眷戀，並且也開始蒐集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書籍。在我接觸的資料中，最使我感到心悸的，就是柯喬治的《被出賣的台灣》，莊嘉農的

《憤怒的台灣》，以及林木順的《台灣二月革命》。書中的文字，生動而深刻描繪了二二八事件的始末，我以挫折的心情去面對台灣歷史上殘酷的一頁。

根據這些書中的線索，我決定從舊日的報刊雜誌去尋找有關事件的蛛絲馬跡。在許多泛黃的資料裡，我一再看見謝雪紅的名字。台北、香港、上海、北京的報紙，都偶然提及謝雪紅的活動概況。經過這樣的探訪，謝雪紅的歷史意義對我漸漸清晰起來。

然而，我在最初幾年，從未有過為謝雪紅寫傳的念頭。主要原因是，我仍然把較多的精神放在中國歷史的研究上，甚至我對中國三十年代新詩史料的蒐集，也抱持高度的興趣。在北美的幾個大圖書館中，我總是一面訪詩，一面探書。幾年下來所累積的成績，可謂豐碩。尤其是在哈佛大學的燕京圖書館找到一九三三年黃師樵編的《台灣共產黨秘史》，算是第一次為我在台灣史上的領域上開了眼界。

黃師樵的書之所以有史料的重要性，便是他根據當時的報刊，把日本警察所逮捕的台共黨員簡歷記錄下來，這本書，也把當時有關台共活動的市井傳聞蒐羅下來。讀過那書，我始了然謝雪紅惹人議論的一些背景因素。

在黃師樵筆下，謝雪紅是一位水性楊花，人盡可夫的女性。以後數年，我對謝雪紅一直保持如此的印象；並且也與一些對台灣歷史有興趣的人士相互印證，我才知道一般人對她也有類似的看法，當然，黃師樵也寫出謝雪紅的另一面，使後人認識這位台共創建者的政治見解與組織能力。我終於領悟到，謝雪紅之所以成為政治上的禁忌，是因為她領導了日據時

期的台灣左翼運動。她的紅色思想，使一般具有恐共症的人士對她產生偏見。

謝雪紅在後半生的逃亡北京，仍然也是人們對她懷有畏懼的原因。但是，我最初所理解的謝雪紅，一直停留在模糊的狀態。我不會知道她與中共有許多錯綜複雜的恩仇，更不知道她最後在北京病逝。能夠理解這些過程，必須到一九八〇年代我開始專注於台灣史研究之後了。

### 超越狹隘的格局

我認識到謝雪紅在抗日運動中的重要性，是從《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一書獲得的。這冊厚達千餘頁的史料，是瞭解日據時期台灣政治運動的一把鑰匙。熟讀全書的章節，大約就可理清台灣抗日陣營內部的政治路線與意識形態。在台灣有些自認為台灣史專家的人士，全然不必參考這份史料，就可以侃侃而談台灣抗日運動的「祖國派」與「台灣派」，甚至可以宣稱台灣抗日運動是中國民族運動的支流。這種無知的勇氣，恰如其分暴露了台灣知識份子的墮落性格，在現階段，台灣史研究可能難以擺脫政治宣傳的陰影；然而，無論做何種程度的宣傳，既然是牽涉到歷史研究，就不能夠忽視一些基礎知識。離開基礎而構築浮華的歷史解釋，正好反映中國意識論者的落空。

一九八一年春天，初識《台灣人四百年史》作者史明先生。他對台灣歷史瞭若指掌。他督促我必須常閱讀《警察沿革志》，然後再根據書中的資料觸類旁通。他知道我有意鑽研左

翼政治運動史時，便提醒我應該注意謝雪紅的歷史。

史明一再告訴我，要探討台共發展的歷史，不能忽略當年台共與蘇聯第三國際的聯繫。他說，第三國際不僅提供革命理論給其他國家的共黨組織，甚至也提供資金給予支援。如果不注意第三國際的背景，就難以理解為什麼台共要建黨，而且也難以解釋台共最後會分裂的原因。史明對我的啓發，勝過多年盲目的摸索。歷來一般的台灣歷史解釋，往往把台灣左翼陣營的分歧，歸因於一九二七年中國的國共分裂，或者是過於強調日本山川均主義與福本和夫主義的對峙。這些客觀因素，對台灣左翼運動固然有程度不等的影響，但畢竟不是主要因素。如果沒有把重點放在第三國際與台共之間的關係，許多問題就很難得到答案。

史明在《台灣人四百年史》中，已提綱挈領把謝雪紅參加政治運動的始末交代清楚，並且也分析了台共之所以失敗的原因。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人能夠像史明那樣，掌握到謝雪紅政治生涯的重點。

從第三國際歷史的發展來看，謝雪紅為什麼要到上海，以及台共內部會有日共路線與中共路線的爭執，都能夠根據史實來解釋。由於上海是亞洲各國左翼運動者的集散地，而第三國際東方局總部也設在這個大都市，所以台灣的左傾知識份子最後都要來到此地。因為只有上海才有列強的租界地，而租界地往往是反抗運動者的庇護場所。魯迅生命最後數年會留在上海，也正是由於有租界地的保護。

台灣左翼人士遠赴上海求學或參加運動的事實，往往被統派人士解釋成爲這是台灣眷戀「祖國」的具體證據。這種幼稚的見解，自屬可笑。更荒謬的是，他們也把台灣政治運動者提出「反對日本出兵中國」與「中台人民攜手合作」的主張，視爲中國民族運動的一部份。如果瞭解第三國際戰略的話，就會知道這是弱小民族對另一弱小民族的支援。因爲，台灣反抗者並非只支援中國的政治運動者，他們也與朝鮮、日本的左翼人士互通聲息。僅用狹狹的中華民族主義來解釋這段歷史，反而窄化了台灣抗日運動的格局。

謝雪紅是當年台灣領導者中，少數能夠突破這種格局的女性。《警察沿革志》顯示的史實，使後人清楚看見謝雪紅與其他政治運動者不同的地方。她較其他反抗者還傑出之處，便是她認清了台灣社會的性質，也辨明了政治運動的方向，能夠釐清謝雪紅政治主張的背景之後，我才知道自己已經具備信心爲她撰寫傳記。那是一九八二年的事，我已涉入海外台灣人的政治潮流裡。

在一幢木屋裡，我開始做一些寫傳的準備工作。最初，我並不是先寫謝雪紅傳，而是寫她的對立者蘇新的傳記。我的看法是，謝雪紅的周邊人物不能不予以注意，否則就難以區別她與其他台共黨員爭執的路線。蘇新，是台共內對抗謝雪紅的重要人物。他與謝雪紅的分歧，有意識之爭，也有意氣之爭。以最簡單的剖析，蘇新是主張極左的「單一階級」反抗路線，謝雪紅則是主張以左翼領導者「聯合各階級」之反抗路線。後來，我就寫成了一篇六萬字的〈永遠的望鄉人：蘇新的生平與思想初論〉。寫完這篇長文時，等於是爲日後的謝雪紅評傳打下了基礎。



## 凝滯的風雲

我頗深知，謝雪紅在二二八事件後逃往中國，並未結束她的政治生涯。相反的，她在那裡展開有生以來最艱苦的戰鬥。過去的台共黨員如蘇新、王萬得、潘欽信、楊克煌、蕭來福等人，也都在香港、北京重新相聚。昔日的恩怨，在重逢時又再度爆發。要瞭解早期謝雪紅的活動，以及她晚年的遭遇，都有必要與這些在政治鬥爭倖存下來的舊台共黨員聯絡。

一九八二年，我在海外華文報紙得知王萬得慶祝八十歲生日的消息。王萬得是謝雪紅一生的最大政敵，如果能夠從他那裡得到資料，或許能夠窺見謝雪紅的另一面。我嘗試與他通信，並且也收到他的回音。經過數次的書信往返，我才警覺到他似乎忌諱提及那段抗日的歷史。

就我所知，舊台共黨員赴中國以後，加入中共組織時，都必須寫下「自傳」，交代自己的經歷與思想。這些向黨交心的材料，可能是研究台灣左翼抗日史的最佳史料。然而，到目前為止，外界能夠獲得的這類自傳，只有蘇新部分而已。王萬得、楊克煌等人，都留下數萬言的自傳，卻深鎖中共的檔案裡。楊克煌是謝雪紅的丈夫，他的文字應該最能反映謝雪紅的生活。現在他的自傳，卻放在北京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除非中共能主動公佈這些資料，否則外界永難窺見。

一九八六年我開始動筆寫《謝雪紅評傳》時，讀到中國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陳碧笙的一篇論文，其中引用了楊克煌寫的《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在此之前，我只隱約知道楊克煌寫過一本書，並由於書中過於肯定謝雪紅的地位而曾受批判；不過，我並不知道書名。讀過陳碧笙的論文，我直覺上就認為這是長久以來我在找尋的一本書。於是我冒昧寫信給陳碧笙先生，請他伸出援手，能夠賜寄一份給我。這樣的要求，自然是一種奢望。我未料到，在兩個月之後，他竟然寄來一冊完整的影印本給我。這番盛情，使我感動。陳碧笙先生曾經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到過台灣，他與當年的台灣人團體飛抵台北準備考察二二八事件的實況，卻由於陳儀政府的恫嚇而未果。他後來寫過數篇短文，討論他的赴台觀感以及一些有關事件的印象。

收到楊克煌的書，更使我覺得必須趕快動筆寫謝雪紅傳。這本書大致是以中華民族主義的立場來解釋台灣歷史，有多處不免過於牽強附會。不過，寫到台共歷史，楊克煌提供了許多書籍未曾觸及的史實。這本書的可貴，在於清楚解釋台共與新文協的關係，也概略寫出日據時期台灣左翼運動的面貌。

就在我把《謝雪紅評傳》的章節結構安排妥當之際，我又獲得一個偶然的機會進一步瞭解謝雪紅的生活。一九八七的春天，在紐約創辦《台灣與世界》的葉芸芸自中國訪問歸來。她來信告知，曾在內蒙古遇到一位謝雪紅的甥女，並給了我地址。我依址寫信向這位謝雪紅的親戚詢問一些資料，她很快就回信了，而且還詳盡答覆我的每一個問題。這是我研究謝雪紅以來，第一次獲得較為直接的史實。她甚至還寄來謝雪紅與楊克煌的相片給我。端詳這張

攝於一九六〇年代的相片，只覺得這位歷史上的風雲人物已全然失去她的英氣。

在台灣的一般雜誌上所看到的謝雪紅相片，如果不是取自黃師樵的《台灣共產黨秘史》，就是得自國民黨國防戰部出版的《謝雪紅的悲劇》。前者是她二十餘歲時所攝，後者是她攝於一九四七年左右，是她四十餘歲的姿顏。那正是政治旗幟最為鮮明的年代，從相片我自我想像她介入政治運動時的模樣。她逃亡到中國之後，就立刻失去所有的發言權。在歷次的權力鬥爭中，謝雪紅早期的政治主張與她前半生的革命經驗，都被貼上奇異的標籤。一九六〇年她與楊克煌在北京北海公園拍攝相片時，她只是一位尋常的默默無名的老婦。面對那張相片，我的心陷於冷熱交織的情緒中。

### 復活的見證者

一九八七年，是二二八事件的第四十週年。這年，也是我蒐集謝雪紅資料最為豐碩的一年。當海外各地熱烈舉行紀念會之際，我在二月與三月之交分別遇見了兩位重要的謝雪紅歷史的見證者。一位是鍾逸人先生，他在二二八事件時領導過二七部隊；一位是周明先生，他是二七部隊的副官，後來也擔任過謝雪紅的秘書。他們獲悉我決定寫謝雪紅傳時，都表示鼓勵，並且也願意把他們所認識的謝雪紅告訴我。

鍾逸人基本上是站在謝雪紅的對立面，由於為了爭奪二七部隊的領導權，兩人曾經有過不快的交往。周明則是支持謝雪紅的人士，他不僅在二二八事件中擁護她，事後又跟隨她逃亡中國，對於一九六〇年代以前的謝雪紅，周明是少有的熟悉者。對照兩個人一正一反的說詞，當可勾勒出謝雪紅的部分形象。鍾逸人後來把他的成長故事寫成《辛酸六十年》，這部回憶錄把台灣知識份子從戰前過渡到戰後的苦悶心情，精確而深刻描繪出來。周明雖然沒有寫回憶錄，但是他在海外發表的訪談錄，以及一篇〈謝雪紅與二七部隊〉的短文，極其生動敘述了一九四七年左右謝雪紅的戰鬥事蹟。

除了周、鍾兩位見證者的口述歷史，我在不久之後又與王思翔先生聯繫；王思翔是戰後到台灣的左翼作家，二二八事件前與謝雪紅認識。他在台中《和平日報》擔任記者時，謝雪紅在背後支持他，企圖通過他的文筆來抨擊陳儀政府。二二八事件後，王思翔也逃回中國，卻於一九五七年因胡風案件被打成「右派份子」。目前，他在安徽合肥擔任文藝刊物《清明》的編輯。

王思翔在謝雪紅政治生涯中的重要性，不僅在於他早期與謝雪紅一起反對陳儀政府，而且也在於他事後寫了一本《台灣二月革命記》，書中對謝雪紅的反抗事蹟給予高度的評價。這本書以編年體方式，逐日交代事實，是其他史料未嘗提及的。不過，由於這本書是以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來解釋二二八事件，因此字裡行間充滿了教條式的政治宣傳，與史實有頗多相違之處。以理論來損害史實，使這本書很難說服讀者。

這種用「新民主主義」來解釋台灣史的現象，在現階段中國境內的台灣史研究已大多被揚棄了。奇怪的是，反而在台灣會出現這樣的歷史解釋。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的《人間》雜

誌，推出「讓歷史指引未來」的專輯，該刊敘述五〇年代的台灣政局時說：「隨著一九四九年以來大陸局勢的急轉直下，台灣人民的『新民主主義運動』也同時在社會各個階層中，廣泛而緊密地展開。」這絕對不是歷史，而是在「創造歷史」。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論」是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在日據統治下的台灣人民，絕對沒有人理解這是什麼理論。到一九五〇年，可能有人嚮往毛澤東的軍事行動，但也絕對沒有多少人知道什麼是「新民主主義」。今天，企圖以這種顛倒史實的說法來欺瞞，甚至還妄想以這種矯情、篡改的史實去「指引未來」，正好反映台灣讀書人的浮華與輕佻。

王思翔在給我的書信中，證實謝雪紅當年在台灣時，利用報紙來擴大對陳儀政府的打擊面。他盛讚謝雪紅的沉著與冷靜，他稱讚她的政治見解。他的說法，大異於多年來北京對謝雪紅的負面評價。

### 尋找台灣命運的答案

歷來對謝雪紅的評價有兩種。第一種是來自統治者，無論是中共或國民黨當權派，他們對她的政治經驗大多採取負面的態度。尤其是北京，他們雖然在一九八〇年為謝雪紅平反，摘掉她「右派份子」的帽子，但是，在私底下對她仍然有意貶低。今天在北京嚐到權力滋味的台灣人，有不少是謝雪紅垮台之後而受益的。為了本身的政治利益，他們很少能夠冷靜給予謝雪紅正確的看法。在台灣，國民黨的出版物就完全貶損謝雪紅的歷史地位。國民黨對二

二八事件總是以扭曲的方式來解釋，並且不惜以粗暴的手法蒙蔽、毀壞歷史真相，從而對於事件中的反抗領導者也予以矮化。謝雪紅在台灣得到的官方待遇，便是如此。

第二種是來自民間的評價。每當提起謝雪紅的名字時，幾乎沒有一位台灣人不知道的。稍微熟悉謝雪紅的事蹟者，無不肯定她的反抗精神。在日據時代，在國民黨時期，在中共時期，謝雪紅總是站在弱小者的立場發言。尤其是在面對中共的猛烈批鬥時，謝雪紅以「踏不死的野花」自況。那種不屈不撓的性格，與楊逵以「壓不扁的玫瑰」自我期許的精神相互輝映。

我在海外發表《謝雪紅評傳》的〈導論〉後，很快就得到來自中國、日本、美國與台灣各地的回應。我第一次深深感受到，謝雪紅雖然已於一九七〇年去世，但是她的生命其實還活在人間。使我感受更深的是，所有知道我在撰寫傳記的台灣人，無論是認識或未識，都主動提供資料與消息給我。收到來自不同地方的資料時，我才領悟到，並不是僅僅我一個人寫傳，而是眾多的台灣人共同在執筆。謝雪紅之不死，由此可知。

尋找謝雪紅的蹤跡，是我從少年跨向中年過程中的一個事業。我在天涯海角，點點滴滴匯集有關於謝雪紅的資料，只不過是為追求台灣命運的答案。在台灣歷史上的政治人物中，恐怕還沒有多少人像她那樣，把活動空間擴張到日本、俄國與中國。她畢生的志業，無非都在打開台灣的出路。觀照她生命的全部歷程，似乎只能以挫折與奮鬥的字眼來概括。然則，她的挫折，豈非就是全體台灣人的挫折？她的奮鬥，豈非也是全體台灣人的奮鬥？



感謝您購買本書，這一小張回函，是專為您、作者及本社搭建的橋樑，我們將參考您的意見，出版更多的好書，並提供您相關的書訊、活動以及優惠特價。

姓名：	_____
地址：	_____
電話：	_____ 職業：_____
出生：	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 性別：_____
學歷：	_____

## 您得知本書的方法

- 報紙、雜誌報導     報紙廣告     電台     傳單     聯合文學雜誌  
 逛書店     親友介紹     其它 \_\_\_\_\_

## 購買本書的方式

- \_\_\_\_\_ 市(縣) \_\_\_\_\_ 書局     劃撥     贈送  
 展覽、演講活動，名稱 \_\_\_\_\_ 其他 \_\_\_\_\_

## 對於本書的意見(請填代號 ● 滿意 ● 尚可 ● 再改進 請提供建議)

內容 \_\_\_\_\_ 封面 \_\_\_\_\_ 編排 \_\_\_\_\_ 其它 \_\_\_\_\_

綜合建議 \_\_\_\_\_  
 \_\_\_\_\_  
 \_\_\_\_\_

## 您對本社叢書

- 經常買     偶而選購     初次購買

## 您是聯合文學雜誌

- 訂戶     曾是訂戶     零售選購讀者     一般讀者     非讀者

購買時間    年    月    日



我以十年的時間蒐集她的資料，又以三年的光陰斷斷續續寫傳，其實也只能掌握謝雪紅一生的吉光片羽。從她的生命經驗，我更加堅定自己的信念，台灣的命運完全操在台灣人手中。要追求台灣前途的答案，絕對不是在海島以外地區去尋找。台灣命運的答案，早已存在自己的土地上。謝雪紅最後之所以挫敗，最主要的原因是她離開了自己所賴以生存的土地。然而，她的錯誤與失敗，並不影響她的歷史地位。在未來的史書上，謝雪紅必然會佔據重要位置；而那必須等待台灣人民的主體性完全建立時。

——《自立早報》，一九八九年二月廿四日、廿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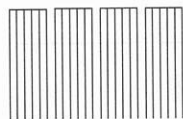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日 聖荷西



廣告回郵  
北區郵政管理局登  
記證北台字7476號  
免貼郵票

##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服務專線：(02)27666759



### 更方便的購書方式：

- (1) 信用卡訂閱 填妥「信用卡訂閱單」，傳真或直接郵寄回本社
- (2) 郵政劃撥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帳號：17623526

◎凡以上列方式郵購叢書，可享9折，雜誌訂戶85折優待  
◎服務專線：(02)27666759讀者服務組

聯合文叢 150

## 夢的終點

作者／陳芳明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初安民  
主編／江一鯉  
編輯／余淑宜  
美術編輯／戴榮芝  
校對／陳芳明 余淑宜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27666759 · 27634300轉5107  
郵撥帳號／17623526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印刷廠／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02)26422629

出版日期／1998年9月 初版  
定價／200元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調換》